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權力轉移中崛起國與既存強權的戰與和

**War and peace between rising powers and existing leading
powers in power transition period**

謝基業

Chi- Yeh Hsieh

指導教授：吳玉山 博士

共同指導教授：傅澤民 博士

Advisor : Yu-Shan Wu, Ph.D.

Co-Advisor : Ronan Tse-min Fu,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Aug, 2023



謝詞



本篇論文主要探討權力轉移過程中崛起國與既存強權戰略互動，透過以政治菁英偏好為核心的戰略框架，在不同情境中檢驗現有文獻的適用性。為了觀察不同權力轉移戰爭機制在不同理事案例中是否出現，不僅需要爬梳大量文獻，也必須了解國際關係學界中對於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理論的最新發展。這些都對於我的論文形成巨大的挑戰，但是在老師、學長、同學與家人的幫助下，我這個從研究所才正式踏入政治系研究大門的小白才得以順利完成這篇論文。

首先必須感謝吳玉山老師與傅澤民學長兩位指導老師，我在大學時期就曾旁聽過玉山老師的政治社會學，而在研究所期間選修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變遷與半總統制專題」、「兩岸關係專題」也開啟我對比較分析不同政治學理論的興趣。在擔任玉山老師的助教期間，不僅受老師諸多照顧，也讓我近距離學習一名政治學研究者應該以何種態度面對學術。澤民學長則完全重塑我對於學術研究的認識，我能成為澤民學長在中研院政治所的獎助生是我學術生涯中最幸運的一件事，在他手把手的教導下，我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政治學研究者，並得以完成這篇論文。如果未來走向學術之路，我也會以澤民學長為目標，立志成為同時精通質化、量化與問卷調查等多個方法論的學者。

除了兩位指導教授外，還有一些師長們需要感謝，首先是擔任本篇論文的口試委員的楊仕樂教授與唐欣偉教授，楊仕樂教授點出我在軍事知識與理論建構的不足，而唐欣偉教授則在仔細閱讀完論文後提供相當實用的意見，並提醒我可以透過更合理的章節安排來更有效的呈現論文觀點。另外還需要特別感謝明居正教授，雖然最終可惜沒有能成為明居正教授指導的學生，但是如果不是明居正教授的鼓勵與教導，我也不可能成為台大政治系的學生。

我還要感謝中研院政治所的兩位學長姐，崇易學長不僅在工作、論文寫作、各種行政程序上給予我許多幫助，還時常鼓勵我在論文寫作的道路上堅持下去，

心佩學姐也常常在工作與日本研究方面作為前輩提供我許多幫助與建議。與學長姐在同個辦公室共事，聽學長姐鬥嘴是我在中研院的美好回憶。

除了要感謝師長與學長姐的幫助外，朋友們的鼓勵與支持也是我能順利完成論文的關鍵，典穎跟我從高中就認識，他也是把我拉進政治學研究領域的元凶，與他一起在台大政治系互相激勵是我求學生涯的一大幸運。竣耀對於文獻的專研與重視則時時提醒我廣泛閱讀的重要性。煜翔則多次麻煩他幫我檢查論文中用詞用字是否精準。另外還要特別感謝台大政治系的辰元助教與小官助教在我就讀政治系期間提供許多行政上的幫助。

這篇論文的完成也離不開家人們的支持，感謝我的父母與奶奶在我求學生涯提供的種種支援，不僅時常關心我的論文進度，也為我提供最溫暖安全的避風港。另外還要感謝我弟弟在口試當天的支援與鼓勵，讓我可以以放鬆的心情面對挑戰。

最後我想將這篇論文獻給我的爺爺謝新棟先生，在這篇論文完成接近尾聲時，因為新冠疫情的肆虐，爺爺不幸未能挺過去，他是家人之中，最支持我變換跑道，選擇與大學科系完全無關的台大政治系研究所。這一篇論文完成時正好在爺爺公祭前夕，希望這篇論文能成為我對於爺爺的悼念，感謝他從小對我的培養與教導，願他可以放心的前往天堂。

謝基業

於台北林口街

民國 112 年 8 月

中文摘要



在國際關係領域中，探討權力轉移時崛起國與既存強權間的戰與和的文獻繁多。但各學說之間卻長久缺乏有效的整合平台，這使我們無法確定不同理論在各種情境下的適用性。同時，對於國內政治菁英在權力轉移過程中的角色，研究仍然不足。基於此，本文提出一套以政治菁英偏好為核心的策略框架，並將政治菁英的言行視作觀察機制運作的主要指標。

本論文為一篇理論檢驗型論文。本文的目的並非提出新的自變項以挑戰現有的理論，而是使用政治菁英政策偏好組合作為中介變項，來檢驗現行學說的適用性。通過這一理論框架，我們選取了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前期美英和平權力轉移，以及二十世紀前半至二十世紀中葉，日本作為挑戰者對美國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兩個案例。透過在這些案例中檢驗不同的理論，我們不僅可以理解現有文獻的優劣，還能指出學界未來的研究方向。此外，這一框架也可幫助我們判斷在不同的權力轉移情境中，應首選哪些理論工具來解釋和預測崛起國與既有強國之間的策略互動。

中文關鍵字：權力轉移、日美關係、英美關係

Abstract



In the real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tensive literature exists that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rising powers and existing leading powers during power transition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 persistent challenge in effectively amalgamating these diverse theorie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ir applicability across various scenarios. Moreover, the role of domestic political elites during these power transitions has often been overlooked. In response, this thesis presents a strategic framework anchored on the preferences of political elites. Their statements and actions are positioned as essential indicators of the functioning mechanisms within these transitions.

This study stands as a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Instead of introducing new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contest prevailing theories, it utilizes the policy preferences of political elites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to assess the relevance of existing doctrines. Employing this framework, two case studies are scrutinized: the peaceful power trans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the UK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the Pacific War initiated by Japan, a rising power, against the US, an existing leading power, spanning from the first half to the mid-20th century. By examining various theories within these case studies, we not only identify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current literature but also pinpoint potential research directions in the field. Importantly, this framework provides guidance on which theoretical tools should be prioritized when interpreting and forecasting the strategic dynamics between rising powers and existing leading powers in different power transition contexts.

keyword : power transition 、 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relations 、 Japan–United

States rel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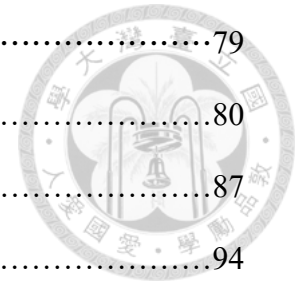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	1
第二節 文獻分析與探討	4
第三節 理論框架建構與案例選擇的邏輯	14
研究框架建構	14
案例選擇的邏輯	17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8
第五節 章節安排	19
第二章 日美關係	20
第一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日美關係簡介	20
第二節 友好相處的 20 年代(1919-1929)	22
1921 年華盛頓海軍會議	24
1924 年美國排日運動	33
第三節 從合作走向競爭的 30 年代(1929-1935).....	38
1930 年第一次倫敦海軍會議	39
1931 年九一八事件到日本退出國際聯盟	46
1936 年第二次倫敦海軍會議	55
第四節 走向全面競爭(1937-1941)	60
1937 年帕奈號事件	61
1941 年日軍南進與美國石油禁運	65
第五節 小結	75
第三章 美英關係	78
第一節 南北戰爭前美英關係簡介	78

第二節 南北戰爭與戰後索賠 (1861-1871)	79
1861 年特倫特號郵輪事件.....	80
1871 年阿拉巴馬號仲裁案	87
第三節 英美大和解 (1895-1903)	94
1895 年委內瑞拉邊界衝突	95
1898 年美西戰爭.....	104
1903 年阿拉斯加邊境劃界衝突.....	112
第四節 小結.....	119
第四章 結論	121
第一節 研究假設檢驗與案例中與不同理論變項出現次數.....	121
第二節 理論框架在中美(2008-2023)的適用性.....	126
第三節 理論與經驗意涵.....	134
參考文獻	
中文資料.....	135
英文資料.....	138
日文資料.....	144
網路資料.....	144



表目次



表一	目前學界對於權力轉移戰爭機制提出的競爭性理論	13
表二	理論框架	16
表三	本文理論因果機制	17
表四	日本全國和海軍預算（1917-1921）	28
表五	華盛頓海軍裁軍會議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33
表六	排日法案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	37
表七	第一次倫敦海軍會議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46
表八	九一八事件到日本退出國際聯盟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54
表九	第二次倫敦海軍會議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59
表十	帕奈號事件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65
表十一	新莊報告日美國力比較	72
表十二	日軍南進與美國石油禁運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75
表十三	特倫特號郵輪事件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86
表十四	阿拉巴馬號仲裁案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94
表十五	委內瑞拉邊界衝突中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104
表十六	美西戰爭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112
表十七	阿拉斯加邊境劃界爭議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118
表十八	兩個案例十二個事件中不同政治菁英偏好組合與結果	122
表十九	不同權力轉移戰爭機制變項在案例中出現頻率	123
表二十	不同權力轉移戰爭機制變項在三種情境的出現頻率	124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

「大國興衰」與「戰爭與和平」一直是國際關係歷久不衰的主題。綜觀歷史，對國際體系產生劇烈波動、強度極高且將體系內大部分成員捲入的「大戰」幾乎都發生在大國權力轉移之時。¹這也使探討大國之間的權力轉移與其間的戰與和之研究顯得極為重要，這也是本論文的核心關切。

目前學界對於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的討論最早可追溯回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薩戰爭史》，書中企圖為雅典與斯巴達兩大集團的戰爭起因與過程做出合理解釋。修昔底德認為斯巴達對雅典的恐懼，不可避免地使雙方在雅典介入伯羅奔尼薩同盟一事時只剩下戰爭一途。²修昔底德對於大國權力轉移兩強之間的宿命論悲劇式觀點為當代許多學者所承繼。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註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提出的十六個權力轉移的案例中只有四個成功規避戰爭的爆發，四個案例中又只有二十世紀初的英美與二十世紀末的英德沒有出現明顯的衝突，強調了權力轉移與戰爭的高度連結。³對於權力轉移論述最為完整的權力轉移理論也指出權力轉移過程中如果雙方國力差距在 20% 以內，則戰爭爆發的機率會顯著上升。⁴其他學者也指出在權力轉移過程中，若大國對於地位與權力的認知與自己期望存在差異時，會讓他們為此發動戰爭。⁵在這些學者的描述中，權力轉移總是難以擺脫戰爭的陰影，衝突是常

¹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² Thucydides 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雅典斯巴達戰爭史》（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頁 18–19。

³ Graham T.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241–86.

⁴ Jacek Kugler, Ronald L. Tammen, and Siddharth Swaminathan, "Power Transitions and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Asian Perspective* 25, no. 3 (January 2001): 21–22.

⁵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態性的，當國家在權力轉移途中陷入危機時，危機會難以管理進而將大國捲入衝突與戰爭，彷彿權力轉移對於大國而言，就如同艾利森所描述的如同「陷阱」一般。但事實是否真是如此呢？

近年對於權力轉移的新興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有學者發現，在過往歷史中，當既存強權相對國力衰退時，它們會優先實行戰略撤守（retrenchment），以卸責、綏靖等方式減少海外的軍事佈署與承諾，並優先透過國內改革恢復國力，而非對崛起國發動預防性戰爭。⁶也有學者研究發現，崛起國透過將自己政策與公開言論調整成符合既存強權偏好的形態，便可以規避既存強權發動預防性戰爭。⁷崛起國也可能會基於既存強權本身所帶來「戰略利益」而不會對它發起挑戰，反而可能選擇主動幫助既存強權恢復國力。⁸上述學說為我們展示了大國權力轉移的另一種可能：戰爭或許並非不可避免，衝突也未必是常態。⁹

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除了反映大國權力轉移的議題持續受到學界關注與深入研究外，也可以看出對於權力轉移中大國戰爭與和平的原因仍未存在定論。更甚者，理論上涇渭分明的學者往往都選擇不同的案例來檢驗自己提出之理論。例如主張戰爭非常態性的學者時常以 19 世紀後半普魯士的德意志統一戰爭中英國對普魯士的外交政策為例，說明既存強權不一定會對崛起國發動預防性戰爭。該事例常被學者用於證明戰爭與制衡並非既存強權的唯一選擇，既存強權也有可能選擇其他方式來面對相對國力衰退的局面。但是這一重要案例目前在持相反意見的學者論述中卻甚少被提及，這也顯示權力轉移戰爭與和平的競爭性理論在案例上存在選擇偏差（selection bias）的問題。其結果是，學者雖能對所選之案例提供完整解釋，但是我們卻不能確定，他們所提出之理論是否也能被用來剖析其

⁶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⁷ Stacie E. Goddard, *When Right Makes Might: Rising Powers and World Ord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110–42.

⁸ Joshua R. Itzkowitz Shiffrin, *Rising Titans, Falling Giants: How Great Powers Exploit Power Shif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⁹ 吳玉山、傅澤民，〈霸權與挑戰：國際關係理論的詮釋〉，《問題與研究》，第 62 卷，第 1 期（2023 年 3 月 1 日），頁 22。

他作品中所舉出之事例。

進一步來說，現有對於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的理論性討論已具有相當成果，但目前這一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缺乏對特定條件下各個競爭性理論的適用性進行分析與測試。基於此，我希望提出一個以既存強權與崛起國國內掌權政治菁英政策偏好為基礎的戰略互動框架整合這些理論，觀察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崛起國與既存強權內分別由何種政治菁英（強硬派或溫和派）掌握權力，並假設兩國戰略互動的結果是由不同的互動組合所決定。我將仔細觀察什麼因素影響使政治菁英在權力轉移過程中選擇不同的立場，透過對政治菁英言行的觀察，並搭配本文的理論框架，我們可以廓清各派理論的適用範圍（scope conditions）。

根據以上討論，本論文將研究問題設定為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崛起國與既存強權會對彼此採取競爭性或者合作性的政策，並如何影響雙邊互動之結果。我們將展示，崛起國與既存強權分別是由何種政策偏好的政治菁英掌握決策權，在極大程度上能夠有效解釋兩國間的戰與和。

本論文是一篇理論檢驗型論文（theory-testing thesis）。這類論文利用現有經驗證據評估理論的有效性，主要採用案例研究作為檢證理論的方式。¹⁰本文並沒有試圖創造新的自變項，而是試圖搭建一套檢驗現有理論的戰略框架。透過由本文理論框架篩選出的案例讓缺乏比較且存在選擇偏差的不同理論在同一平臺競爭，將不同理論在各類案例情境中進行檢驗，除了能廓清現有文獻的優缺點並點出學界未來的研究方向外，這一框架也可以指引我們在權力轉移不同情境下應該優先使用哪些理論工具進行解釋與預測崛起國與既存強權之間的戰略互動。

對於身處於中美作為崛起國與既存強權激烈競爭的臺灣而言，臺灣不僅位於中美競爭的最前線，甚至被視為最有可能讓中美爆發危機並導致熱戰的國際熱點。研究此一主題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臺灣在現今中美的權力轉移中扮演什麼角色，以及未來臺灣在中美日益競爭的未來中該如何自處。

¹⁰ 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97), 89–96.

第二節 文獻分析與探討



在討論本篇論文的理論框架建構以前，我們必須先針對現有文獻進行討論，為此需要對探討權力轉移過程中崛起國與既存強權戰爭與和平的文獻進行分析。本文會根據權力轉移中崛起國與既存強權戰爭與和平的自變項進行分類，並列出現有文獻具有哪些優缺點。透過文獻整理，本文將現有文獻再分成六大類，其中前四大類都是在權力轉移的框架內進行討論，而後兩類雖然在現有文獻中較少在權力轉移框架內提及，但是基於他們對大國和戰原因的探討，本文認為應該一併納入討論：第一類文獻聚焦在權力轉移過程中地位在大國的政策選擇中扮演什麼角色。第二類文獻強調國家對於權力轉移的評估如何影響它在權力轉移過程中的外交政策。第三類文獻強調國家對於現狀的滿意程度如何影響國家的外交決策。第四類文獻則認為崛起國對於既存強權戰略利益評估會決定崛起國選擇削弱還是扶持既存強權。第五類文獻強調多重威脅下既存強權的政策選擇。第六類探討崛起國如何將國內壓力轉換成修正主義式外交政策。本章節會依序檢驗以上六類文獻，並在最後統整這些文獻對戰爭原因的解釋與其優缺點。

一、地位

國際關係中權力關係恆常處於變動狀態，而國家地位也會隨權力的重組而產生變動，但是地位並非單純以物質權力組成，地位不會自動透過權力產生；它依賴於他人的認可，這意味著地位是一種涉及知覺與社會的現象。¹¹地位除了需要考慮相對實力的物質標準，還包含它在國際社會中取得的正式地位與它對於自己地位的自我聲稱。這也使國力與地位不匹配的情況相當普遍。雖然現實主義學者普遍認為地位與國力終究會達到一致，但可能需要數十年的歲月才能完成。¹²

¹¹ 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35–37.

¹² Barry Buzan 著，劉永濤譯，《美國和諸大國：21 世紀的世界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60–78。

延續上述討論，權力轉移過程中崛起國與既存強權彼此間國力的相對變化也使地位不匹配現象更加普遍，這也讓學者們開始探討地位對於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的影響，學者們的觀點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強調崛起國對於承認和尊重有著強烈的渴望¹³，強調比起傳統的遏制，讓崛起國參與那些可以提高地位的行動，例如正式峰會，戰略對話和戰略夥伴關係等等更能有效避免衝突，如果崛起國對於地位的需求可以透過在傳統現實主義議題以外的領域獲得滿足，他們就沒有直接挑戰現行制度的需求。¹⁴但是崛起國一旦無法在現行規範內追求大國地位，他們就會轉而選擇更具競爭性的政策，並可能使崛起國選擇以戰爭作為追求地位的手段。¹⁵

第二種觀點則進一步深入崛起國內部，分析崛起國對於地位的追求源自於何種國內機制，學者認為如果崛起國的地位在持續一段時間內都停留在固定位置無法上升，國內鷹派與鴿派對於地位天花板的認知差異會促使國內鴿派受到鷹派壓制，進而讓崛起國的外交政策走向非理性進而引發戰爭。¹⁶

第三種觀點則是以既存強權視角出發，並承繼國內團體影響國家地位政策的觀點，強調既存強權也會為國際地位採取行動，學者認為不論是崛起國或是既存強權都會在本國菁英認知的國家地位與預設不一致時產生不滿，並會為此採取行動甚至發動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羅斯的歐洲政策與冷戰時期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國有化事件的出兵都可作為例證，證明不是只有崛起國會基於地位發起衝突，既存強權也會為了維持地位而選擇風險成本更高的政策甚至為此發動戰爭。¹⁷

對於地位的相關文獻填補了國家在權力轉移中對非物質權力討論不足，並且對國家在權力轉移的非理性行為做出合理解釋，但是各派學者基於研究途徑的差

¹³ Thazha Varkey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urti Wohlforth,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¹⁴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 no. 4 (2010): 93–95.

¹⁵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ksei Shevchenko, *Quest for Status: Chinese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77–231.

¹⁶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¹⁷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異使地位的定義繁雜，缺乏明確公認可用於界定地位的定義，同時各派學者研究途徑的差異也使他們對於地位的側重角度都有所不同，以德國在二十世紀初期的外交政策為例，學者們大體都認同地位是德國採取修正主義的主要原因，但是學者對於威廉時期的德國為何會如此熱衷於追求地位卻有截然不同的解釋。¹⁸除此之外，地位涉及身分與承認的部分，也讓地位相對於物質權力難以進行量化研究。

二、對於權力轉移認知

認知在國際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戰爭與衝突的爆發不只源於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N. Waltz）提出的「人」、「國家」、「體系」三層次，認知與誤解也是導致戰爭爆發的根源，雖然學者在建構理論時常常預設國家是理性的行為者，但是實際上國家常常會出現誤判的情況，學者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就強調：「當對峙的兩國都誇大對方的敵意，誤解對方的意圖，衝突與戰爭就會不可避免」。¹⁹在權力轉移中如何認知周遭環境與對方對於國家的決策有重大的影響。

討論權力轉移中崛起國與既存強權戰爭與和平的文獻中，對於權力轉移認知的探討存在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以既存強權的認知切入，既存強權如果認知自己正在經歷衰退，該國的領導人會更有可能發動預防性戰爭，並且衰退越嚴重，採取這類行動的機率就越高，部分學者將國家相對實力即將衰退或是正在衰退的時期稱之為「視窗」，並且視窗可以進一步區分為機會、脆弱性、長期與短期四種，機會視窗與脆弱性視窗分別為既存強權進攻時機的時效性與既存強權自我保護能力的流失，而短期與長期視窗則以國家衰退的速度快慢區分。窗口的大小會影響既存強權是否選擇發動戰爭，而視窗的大小與數量則受到均勢變化的頻率與速度以及攻守平衡影響，當一國衰退速度劇烈且在主動攻擊方面具有優勢時，既存強權會因為窗口的擴大而誘使它發動預防性戰爭。²⁰同時不同的國際體系也

¹⁸ Elias Götz, "Status Matter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3, no. 1 (2021): 228–47.

¹⁹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th a New Preface by the Autho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102–26.

²⁰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73–104.

會影響既存強權的戰爭機制，既存強權如果身處多極體系，取得與體系中每個單獨國家的明顯軍事優勢，會提高他發動戰爭的機率。如果既存強權身處兩極體系且在軍事能力上具有優勢或至少勢均力敵時，既存強權會更有可能引發戰爭。另外也有學者以經濟資源的角度補充了既存強權發動預防性戰爭的動機²¹，既存強權在衰退過程中若是國際體系權力中心周圍的經濟資源幾乎都被瓜分完畢，會更容易與他國形成零和博弈，既存強權對於自己權力衰退的預期心態與事態發展的不可預料性，將導致既存強權更容易與他國發生戰爭，另外，既存強權對於戰爭的過度樂觀與戰爭本身的不確定性也可能會使小規模衝突演變成全面大戰。²²

第二種觀點則著重於崛起國與既存強權對於權力轉移的認知如何交互影響雙方的戰略互動，崛起國與既存強權對於現狀與未來的認知會影響雙方的政策並進而決定他們的戰略互動模式。如果崛起國與既存強權都認知既存強權與崛起國的相對權力不具備優勢的話則容易導致崛起國採取挑戰、既存強權採取抗衡政策，進而使雙方走向戰爭。²³而對於未來時間幅度的關注，也會影響雙方是否發動戰爭，若是崛起國關注短期合作的利得、既存強權關注崛起國未來的國力會超越自己，既存強權會搶先發動預防性戰爭，如果是崛起國與既存強權同時關注未來的權力變化，雙方也會為此發生戰爭。²⁴這種觀點同時整合了崛起國與既存強權的視角，並強調雙方對彼此的認知如何影響雙方的互動模式。

「對於權力轉移的認知」將認知做為變項，討論崛起國與既存強權的認知如何影響他們的決策，將認知納入討論也有助於分析錯誤估算與誤判在權力轉移中扮演的角色。但是這類文獻中的核心論述「既存強權對於權力轉移糟糕的未來認知使它發動預防性戰爭」這一觀點近期開始受到實證研究的挑戰，根據學者的研

²¹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²²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6–230.

²³ 陳欣之，〈歧異解讀霸權衰落的美中戰略互動—單極體系中權位轉換的認知因素〉，《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5卷，第1期（2014年1月1日），頁89–104。

²⁴ David M. Edelstein, *Over the Horizon: Time,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究，既存強權面對衰退時比起對崛起國發動預防性戰爭更常採取戰略撤守。²⁵既存強權會透過減少海外安全承諾、削減軍事支出等方式避免在權力下降時進一步透支國力並承擔被捲入戰爭的風險，既存強權在衰退時在大部分情況下是無意願與崛起國進行高強度的戰略競爭的，而是更偏好透過內部政治改革來恢復自己的國力。²⁶

三、對於現狀的滿意程度

這些學者將國家意圖視為變項進行討論，強調對於現狀的認知會決定崛起國與既存強權是否會主動向對方發起戰爭，也因此對於崛起國或既存強權而言，現狀是否主觀上讓國家感到滿意就成為國家是否對外採取強硬外交政策的關鍵。

相關文獻可以以行為者的不同區分為以下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以崛起國的認知出發，這類觀點主要以權力轉移理論的學者所組成，他們強調當國家間權力進入差距 20% 以內的區間時，戰爭爆發的機率也會隨之提升，第一代權力轉移學者並未對戰爭會在哪個時間點爆發做出進一步深入研究，直到第二、三代權力轉移學者引入了「對現狀滿意程度」作為崛起國是否發起挑戰的自變項，「對現狀滿意程度」的引入彌補了原有理論未能解釋的戰爭機制，當崛起國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對於現狀開始感到不滿，它會促使崛起國採取修正主義政策，如果不滿的程度持續上升，則修正主義政策就有可能升級成戰爭。²⁷

權力轉移理論作為研究權力轉移這一議題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提出與傳統現實主義的核心概念「權力平衡」完全對立的概念，強調兩國權力的失衡反而有助於和平，為之後權力轉移的研究奠基厚實的基礎，但是該理論仍然存在許多不足，首先是「滿意」是否能直接與行為掛勾，對於現狀的不滿會讓國家願意承擔

²⁵ 傅澤民，〈國際關係理論與美中的戰略互動〉，《全球政治評論》，第 73 期（2021 年 1 月），頁 25-30。

²⁶ MacDonald and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²⁷ 吳玉山，〈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收錄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2011，頁 389-415。

多大的成本與風險堅持修正主義政策？²⁸另外一點是對於既存強權是現狀滿意者的預設，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就曾強調由於無政府狀態的結構因素，所有國家都有改變現狀的意圖，即使是國際體系中的最強大的國家也一樣²⁹，而根據實證研究也可以發現既存強權在認知自己衰退時多數時刻會選擇戰略撤守，放棄自己的對外安全承諾與國際建制以降低不必要開銷。³⁰換言之，權力轉移的過程中既存強權可能不僅不會維護現行國際制度可能反而帶頭破壞，這不僅挑戰了權力平衡中對於「既存強權偏好現行制度」的假設，也代表權力轉移過程中崛起國與既存強權甚至可能會同時對現行制度進行破壞，川普時期的美國對於國際建制的態度也可視為這一現象的證據。

而另一觀點則是以既存強權的視角出發，強調既存強權對於現狀的滿意程度會決定它對崛起國採取的政策，而既存強權對現狀的認知能被崛起國的外交政策所塑造，崛起國可以通過訴諸既定的國際規範執行外交政策並以對外宣傳、公開發言等手段來將自己的外交政策正當化，進而延緩或避免遭受既存強權的制衡，既存強權會根據自己試圖維護的國際制度的脆弱程度與崛起國對於自己外交政策的正當性辯護是否說服既存強權決定自己的對崛起國政策，當崛起國的正當化策略無法說服既存強權，同時既存強權主持的制度正好處於脆弱狀態，對於現狀的不滿會讓既存強權進行制衡甚至進一步對崛起國發動戰爭。³¹

這一類文獻在肯定崛起國與既存強權互動所具備的能動性外，也以單元層次的視角補充了結構現實主義的體系論。但是制度脆弱性的概念缺乏明確定義與指標，使它容易被質疑案例中對於制度的描述僅為事後諸葛與過度解釋，而正當化策略在崛起國侵害到既存強權核心利益是否仍有效也有待學者進一步研究。

²⁸ 朱鋒，〈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2006），頁38-40。

²⁹ John J. Mearsheimer 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臺北，麥田出版，2021，頁296-299。

³⁰ MacDonald and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³¹ Goddard, *When Right Makes Might: Rising Powers and World Order*.

四、 戰略利益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不論是現實主義或是自由主義學者，都強調國家都會為了追求利益而行動，而探討其他行為者的存在構成國家利益的理論包含著名的三角戰略與攻勢現實主義的離岸平衡，上述理論都強調第三國的存在所具備的戰略利益。學者秉持這一觀點將它用於分析權力轉移的崛起國對既存強權外交政策，繼承攻勢現實主義的假定，他們認為處於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在無法確認它國意圖的前提下都會盡可能的強化自己的國力直到成為世界霸權，但是它認為國家作為理性的行為者會衡量風險與效益，這也使崛起國對既存強權的外交政策會衡量以既存強權的軍事姿態與它對於崛起國的戰略價值高低決定。³²只有在既存強權軍事能力薄弱且對於崛起國缺乏戰略價值的前提下才會使崛起國對其採取掠奪性的外交政策甚至發動戰爭，而相反的，如果既存強權對於崛起國存在高戰略價值的同時卻缺乏軍事力量，崛起國基於自身利益考量甚至會主動協助既存強權恢復國力。³³這一觀點有效的提供在現實主義的脈絡下提供一個為何崛起國不對既存強權採取掠奪型政策的合理論述，填補了現有文獻對於權力轉移中戰爭與衝突以外的內容討論不足的問題，但是「戰略利益」定義的模糊性也使理論的解釋力與預測能力受到一定程度削弱。

五、 多重威脅

學界對權力轉移中情境中的多重威脅討論相對不足。目前學者主要從多重威脅情境和多重威脅結構兩大類進行討論。第一類探討國家在面對複數威脅時會如何調整外交政策，學者曾以英國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既存強權英國同時面對美國與德國兩個崛起國為例，提出國家會在多重威脅的前提下對威脅進行理性排序，並利用次要威脅制衡主要威脅：「倘若一個大國同時面對兩個或更

³² Joshua Shiffrin,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Fear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1, no. 4 (2018): 65–83.

³³ Shiffrin, *Rising Titans, Falling Giants: How Great Powers Exploit Power Shifts*.

多侵略者，而他既無資源遏制所有對手，又沒有盟友供他推卸責任，那麼該國可能會區別威脅的優先順序，允許威脅較小的一方增強實力，以便專注對付首要威脅，如果運氣好的話，次要威脅最終會成為主要威脅的敵人，從而實現與前者結盟反對後者的目標。³⁴這一類文獻不僅有效補充權力轉移中對其他國家行為者討論的不足，也可以為現存強權對崛起國的綏靖政策做出有效解釋。

另一派學者主要以中國春秋戰國時期作為研究素材，提出戰國時期的國際社會屬於霍布斯式的文化結構，因此形成特殊的多重威脅結構。國家彼此都為了生存追求擴張與自利，導致國家間信任度極低而難以透過結盟制衡崛起國。³⁵這一類文獻成功地補充了權力轉移理論的缺陷，但因為將討論範圍預設在霍布斯式文化結構，也使得其解釋範圍相當有限，難以套用到其他文化結構中。

六、轉移性外交政策

研究轉移性外交政策（Diversionsary Foreign Policy）的學者專注於探討國內行為者如何利用強硬的對外政策甚至戰爭來挽回自己搖搖欲墜的國內支持。簡單來說，當政者會透過發動對外衝突來獲取國內政治優勢，包括轉移民眾對國內議題的關注，提高執政者的支持度等。³⁶透過外交政策轉移國內壓力的這一過程也被學者稱為「聚旗效應」，國家的行政部門會透過強硬積極的外交政策引導群眾忽視國內問題並「團結在旗幟周圍」來應對外國威脅，從而使行政部門受益。雖然傳統上這一類理論的討論對象以民主政體為主，但是也有學者將專制政體納入討論，認為這一理論同樣適用於專制政體。³⁷

轉移性外交政策提供從國內政治精英的視角出發的解釋，解析政治精英的利

³⁴ John J. Mearsheimer, 《大國政治的悲劇》，頁 219。

³⁵ 唐豪駿，〈多重威脅結構下的國家行為邏輯：中國戰國時期之同盟策略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62 卷，第 2 期，（2019 年 6 月 1 日），頁 109-140。

³⁶ Stephen E. Gent, "Scapegoating Strategically: Reselection,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the Diversionsary Theory of Wa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5, no. 1 (2009): 1-29.

³⁷ Kilic Kanat, "Diversionsary Foreign Policy in Authoritarian States: The Use of Multiple Diversionsary Strategies by Saddam Hussein during the Gulf War,"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7, no. 1 (2014); Alastair Smith, "Diversionsary Foreign Policy in Democratic Syst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0, no. 1 (1996): 133-53.

益如何影響本國的外交政策。這不僅補充了傳統國際關係中的國內視角不足，也突顯了政治精英的國內政治利益和實力分佈對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性。



七、小結

上述內容整理了主流國際關係學界對於權力轉移中戰爭機制的看法，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出目前國際關係學界對於影響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的變項可以分成「地位」、「對於權力轉移認知」、「對於現狀滿意程度」、「戰略利益」、「多重威脅」、「政治菁英國內政治利益」六類。以上六類文獻都能對權力轉移過程中崛起國與既存強權戰爭與和平的因果機制提出完整論述，但透過文獻的檢閱我們仍能發現現有文獻仍有不足之處。

首先，部分目前文獻並未窮盡對於戰爭機制依變項的討論，例如「戰略利益」的相關文獻只強調崛起國會在既存強權無戰略利益、軍事力量缺乏的情況下對既存強權實行掠奪性政策，但是對於崛起國採取的掠奪性政策中什麼情境下會升級到戰爭目前仍缺乏進一步討論，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對於現狀滿意程度」的文獻中，這也使我們有需要在不同情境下將這些理論進行進一步檢驗。

第二個問題是目前文獻所選案例的重疊性不足，這也暗示他們彼此有對話不足的問題，這也讓這些競爭性理論缺乏橫向比較與對話的機會。

第三個問題是現有文獻整合性的不足，雖然不同學說能對國家間戰爭機制做出解釋，但是都無力以單一機制同時處理所有案例，學界目前並不缺乏對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的討論，但是卻缺乏一個能同時整合各理論並讓不同理論互補的戰略互動框架。

延續上述文獻檢討，本文會在下一章會開始進行理論框架的建構，並嘗試透過理論框架處理上述發現的研究缺口。

表一：目前學界對於權力轉移戰爭機制提出的競爭性理論

	地位	對於權力轉移認知	對於現狀滿意程度	戰略利益	多重威脅	轉移性外交政策
戰爭原因解釋 (1)*	地位與預想不匹配或是在特定位置停留過久	崛起國認知既存強權衰退的事實或未來	既存強權維持的國際現狀無法滿足崛起國	如果既存強權軍事能力不足又對於崛起國不具備戰略利益	國家面對複數威脅來源而做出戰略排序，避免同時交戰	政治菁英基於獲取個人聲望、轉移國內壓力、而對外強硬
戰爭原因解釋 (2)*	既存強權為了維持衰退的地位	既存強權認知自己在衰退，在充足的視窗存在時，會比崛起國更關心長時間的權力轉移結果	崛起國崛起過程的外交政策無法符合既存強權的偏好		同上	同上
理論優勢	討論其它會隨權力轉移變動的非物質因素	將認知產生的差異納入討論，為錯誤計算提供解釋	強調國家的能動性與對於他國行為的塑造能力	在現實主義的脈絡下為戰爭非常態化提供有效論述	為國家的綏靖政策提出有力解釋	對國內政治菁英的影響納入討論
理論劣勢	地位概念的不明確	近來實證研究的挑戰	適用範圍與效力仍有待研究，缺乏對戰爭機制的完整解釋	目前文獻數量不足且缺乏對戰爭機制的完整解釋	缺乏對權力轉移的討論	缺乏對權力轉移的討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 以上圖表中的戰爭原因解釋(1)跟戰爭原因解釋(2)是以不同視角作為區分，(1)主要以崛起國視角，(2)則是透過既存強權視角。後面兩個變項「多重威脅」與「轉移性外交政策」則因為並沒有將視角限定在崛起國或是既存強權，故不特意做分類。

第三節 理論框架建構與案例選擇的邏輯



一、研究框架建構

延續上一節文獻分析與檢討的討論，現有文獻已經足夠豐富並為權力轉移戰爭機制提供多元的因果機制解釋，但是欠缺讓各類理論對話與競爭的平台，為此，本文將現有各類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理論視為自變項、兩國最終的戰略互動作為依變項，提出一套以政治菁英偏好組合作為核心的戰略框架作為中介變項（mediator），用於檢驗不同權力轉移和戰理論在不同情境中的適用性。本文無意對權力轉移過程中崛起國與既存強權的戰略互動提出新的自變項，而是希望對現有理論進行檢驗，本文認為政治菁英的所言所行是檢驗因果機制是否作用最好的觀察指標，透過對政治菁英言行的觀察，檢驗不同情境中不同理論機制的出現頻率，根據被觀察的次數，我們可以廓清各類理論的適用範圍與局限性。

基於上述討論，本文將國內政治菁英作為本論文的討論核心，雖然傳統結構現實主義時常將國內政治黑箱化，主張國家作為單元層次的行動具有普遍性，但是當國內行為體分享政策制定權並且各自偏好不同的政策時，將國家單純視為單一行為者存在曲解國際關係的風險。³⁸基於此，本文的研究目標為建構一套以掌權政治菁英政策偏好為基礎的框架，以用於檢視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的各類理論適用性。為此，有必要先對本文的政治菁英做出定義，並針對政治菁英在國家互動中扮演的角色進行分析。

本文將政治菁英定義為對於國家內外政策具有影響力的群體，考慮到不同時空背景下，影響國家決策群體的組成與範圍並不固定，本文對於政治菁英同樣不會做出嚴格的定義，相反的，本文會爬梳所選案例的歷史文獻，將不同情境中，有能力影響國家外交決策的組織與個人統稱為「政治菁英」進行討論。另外為避免過度延伸，本論文不會在理論上預設政治菁英形成特定立場的原因，而是將重

³⁸ Helen V. Milner 著，曲博譯，《利益、制度與資訊：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31。

心放在不同類型政治菁英的言行與不同組合產生的效果。

討論完政治菁英的定義，接下來必須分析政治菁英的政策偏好如何影響崛起國與既存強權的戰略互動，為此有必要先依照政治菁英的偏好對政治菁英進行分類。研究外交政策的學者常以鷹派與鴿派代稱政治菁英在外交政策的立場與偏好，鷹派通常被認為主張強硬的外交政策，傾向在外交事務中採取強制性政策，並且更不願意相信讓步的價值³⁹，也有文獻指出鷹派會更容易受到偏見的影響。⁴⁰而鴿派則被認為更偏好溫和的外交政策，傾向在外交事務中使用非強制性政策。⁴¹

本文為何以「崛起國與既存強權政治菁英的政策偏好」作為的核心理論框架，是參考學者菲利浦·C·施米特（Philippe C. Schmitter）在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一書關於國家民主過渡的研究成果。書中將國內主要行為者分為四類，分別為現任獨裁政府內部的強硬派與改革派，與反政府團體中的激進派與溫和派，獨裁政府與反政府團體中派系的不同組合，將會影響民主過渡的走向。⁴²

本文對政治菁英的分類則嫁接於上述分類，將崛起國與既存強權政治菁英分為強硬派與溫和派兩大類，承繼學者們對鷹派與鴿派的分類方式，強硬派主張對另一國採取激進與修正主義式外交政策，溫和派則主張應該與對方和平共存，避免衝突升級。

³⁹ Daniel Kahneman and Jonathan Renshon, “Why Hawks Win,” *Foreign Policy*, no. 158 (2007): 40.

⁴⁰ Jonathan Renshon and Daniel Kahneman, “Hawkish Biases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onflict Decision-Making,” in *Advancing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d. Steve A. Yetiv and Patrick James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 51–81; Joshua D. Kertzer et al., “Hawkish Biases and Group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6, no. 3 (2022): 513–48.

⁴¹ Baris Kesgin, “Features of Foreign Policy Birds: Israeli Prime Ministers as Hawks and Dov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55, no. 1 (2020): 107–26.

⁴² Guillermo A.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定義完政治菁英的分類後，我們回到本文的理論框架建構，通過將國內政治菁英分類為強硬派與溫和派，我們可以得出四種不同的組合，並推演出不同的戰略互動結果，理論框架的內容如表二所示：

表二：理論框架

崛起國／衰退國政治菁英主導政局	溫和派	強硬派
溫和派	和平共存	單方退讓
強硬派	單方退讓	高強度競爭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根據本文對崛起國與既存強權戰略推演所得出的理論框架，若崛起國與既存強權國內皆由溫和派掌權，兩國政治菁英會避免採取另一方強硬的外交政策。儘管這並不代表雙方不會發生外交衝突，但是衝突與規模會得到有效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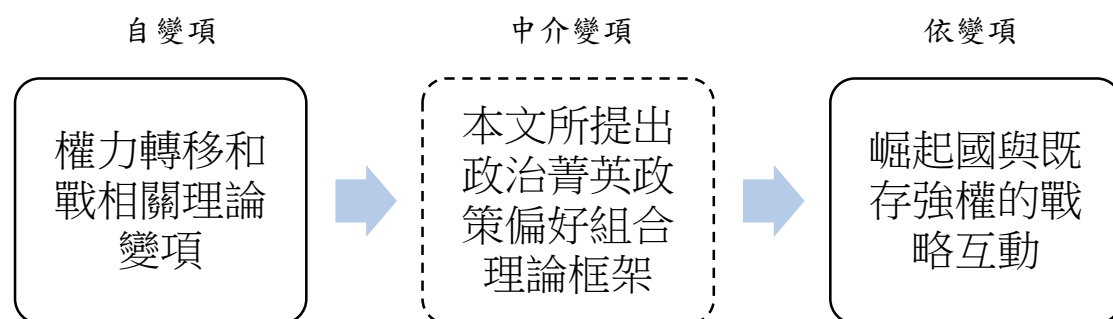
反之，如果兩個國家的政治精英都由強硬派主導，他們都不會願意對另一方做出讓步。這種情況下，儘管兩國不必然會爆發戰爭，但是兩國之間會處於高強度競爭狀態，從而提高了戰爭發生的可能性。

而除上述兩種情境，還存在一方由強硬派，而另一方由溫和派主導的情境，此時不論是崛起國或是既存強權，當其中一國國內政局由強硬派政治菁英主導，而另一方國內由溫和派政治菁英主導時，兩國雖然仍可能爆發外交衝突，但是由溫和派主導的國家往往會在外交衝突中主動退讓，在另一方的要求滿足的情況下衝突規模會得到控制。

透過上述以既存強權與崛起國之國內掌權政治菁英政策偏好為基礎的戰略互動框架，我們觀察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崛起國與既存強權內分別由何種政治菁英（強硬派或溫和派）掌握權力，並假設兩國戰略互動的結果是由不同的互動

組合所決定。同時本文以「掌權政治菁英政策偏好」為基礎的理論架構也可以作為中介變項檢驗各類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理論的效力，如下方表三所示，透過政治菁英的言行，我們可以觀察不同的政治菁英會根據那些因素決定自己的立場強硬與否，換言之，本文將政治菁英的言行視為檢驗現有學說的載體，檢驗在特定情境中現有學說的適用性範圍，完善對於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的研究。

表三：本文理論因果機制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案例選擇的邏輯

本文並不打算針對崛起國與既存強權採取過於嚴格的定義，只要一國在持續的一段時間穩定的拉近與目標國的相對國力差距，就滿足本文對崛起國與既存強權的條件。不採取嚴格定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決策者在不同時空情境中計算他國國力的方式差異甚大，例如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將俄國在歐洲鐵路網絡的完善視為俄國崛起與德國國力衰退的重要因素，但若是參考俄國在當時用於評估國力的其他重要指標諸如鋼產量、人口等等上可以發現實際未產生太大變化。另外一點是指標在不同時空的通用性問題，現代主流計算國力的諸多指標例如 GDP、外匯存底等等在晚近才誕生，權力轉移的案例的跨時性使相當一部分案例缺乏具體數據，只能透過後人將歷史資料進行換算。

本文雖然對於崛起國與既存強權設置較為寬鬆的定義，但本文依然會透過當時國際體系中主流使用的國力測量指標並結合當時政要與學者的論述與公開談話作為判斷崛起國與既存強權的判斷基準，雖然依舊無法有效克服跨時比較的缺陷，但至少可用於判斷同一時空背景下的國家是否滿足本文提出的定義。

在確立崛起國與既存強權的定義後，我們進一步檢視在權力轉移的案例中哪些案例適合用於進一步的理論建構，案例的選擇上需要在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的同時兼顧操作性，為此我根據以下基準挑選兩組案例，其一是選擇近現代、資料豐富的重大歷史案例，另外為了使檢驗力度最大化，我分別選擇一組成功避免戰爭的案例與一組最終步入大戰的案例。⁴³根據上述基準，我挑選了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前期和平權力轉移的美英以及二十世紀前半到二十世紀中葉日本作為挑戰者對美國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兩個案例，希望能涵蓋所有依變項的取值可能，並讓競爭性理論彼此進行對話。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由於本文同時涉及複數理論因果機制的檢驗，因此本文預計使用透過案例內比較之路徑追蹤 (process tracing)，來檢驗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是否正確。⁴⁴在案例選擇上，本文選擇一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前半的英美與戰間期的日美兩組案例作為測試各類理論適用性的經驗事例。

德瑞克·畢奇 (Derek Beach) 與拉斯穆斯·布倫·佩德森 (Rasmus Brun Pedersen) 兩位學者將過程追蹤法界定為一種「通過單一案例探究其因果機制」的研究方法，過程追蹤法作為質化研究中檢視因果機制的研究工具，它追蹤的不是單純的一系列經驗事例或敘述，而是潛在的理論化因果機制本身。⁴⁵過程追蹤法可分為理論

⁴³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70–85.

⁴⁴ Van Evera, 53–60.

⁴⁵ John Gerring,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72–87.

檢驗型過程追蹤、理論建構型過程追蹤和解釋結果型過程追蹤三種變體，分別用於檢驗理論、建構理論與測試不同機制對於個案結果的解釋力，本文主要使用檢驗型過程追蹤此種過程追蹤法，測試不同理論在權力轉移個別情境的表現，並追蹤檢驗本文理論框架在不同案例的適用性。⁴⁶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一共分為四章，分別為第一章緒論，包含研究動機與問題、案例選擇的邏輯、文獻分析與檢討與理論框架建構與研究方法。第二章開始探討本文案例戰間期的日美，先在第一節簡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日美關係，在依序介紹日關係的三個時期，分別為友好相處的 20 年代（1919-1929）、從合作走向競爭的 30 年代（1929-1935）與走向全面競爭（1937-1941），並在章節結尾做出小結。第三章介紹 19 世後半到 20 世紀初的美英關係，與上一章節結構一致，先簡介南北戰爭前的美英關係，再依序介紹南北戰爭與戰後賠償（1861-1871）和英美大和解（1895-1903）兩個時期的英美互動，並在章節結尾做出小結。⁴⁷在第四章結論的部分，分為研究假設檢驗與案例中與不同理論變項出現次數、理論框架在中美(2008-2023)的適用性與理論與經驗意涵三個部分，在結論我會對本文提出的理論框架適用性做出總結，並嘗試將這一框架套用於目前國際熱點中美權力轉移中，並在最後講解本文的理論與經驗意涵。

⁴⁶ Derek Beach and Rasmus Brun Pedersen, *Process-Tracing Methods: 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3), 9–22.

⁴⁷ 跳過 1871 年與 1895 年之間是因為兩國在這一段時間幾乎沒有發生什麼重要的外交事件，而這一時間段的內容我會在章節英美大和解（1895-1903）的開頭簡介部分簡單介紹。

第二章 日美關係



本章節將介紹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日美關係。並將本文提出的框架套用於這一案例中，檢視日美兩國國內主張強硬與溫和外交政策的政治菁英之互動，如何影響兩國的外交政策。本文首先簡要介紹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日美關係。接下來，根據兩國關係的變化，將這一時期的日美關係分為三個小節進行討論。分別是：國際主義盛行、日美友好相處的 20 年代；日美關係逐漸惡化的 30 年代前半；以及走向全面競爭的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初。並依序介紹影響日美互動的重要事件，包括當時兩國時空下的背景、強硬派與溫和派的政治菁英，以及最終哪一派在國內取得優勢並進而主導國家的外交政策。透過日美在戰間期的互動中，可以發現本文提出的理論框架在解釋崛起國與既有強權的互動模式上具有高度適用性，兩國政治菁英都主張溫和的外交政策時，彼此能友好共存，如果其中一國的政治菁英仍主張溫和外交政策、另一方卻開始主張強硬外交政策時，溫和的那一方會對另一方提出的強硬要求做出妥協，而當兩國政治菁英都主張對對方採取強硬外交政策時，兩國就會陷入高強度競爭並大幅提高戰爭的機率。

第一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日美關係簡介

近代日美關係中，官方互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853 年培里艦隊叩關江戶灣，並在隔年與日本簽訂的《神奈川條約》，開啟日本現代化的大門。兩國雖然地理位置與國情有很大的差異，但在當時 19 世紀中期的時空背景下，兩國都屬於國際體系下的新成員，並在競爭激烈的西太平洋地區積極擴張。

日本雖然在七世紀左右便已形成統一的國家體制，但受江戶幕府鎖國政策影響，日本僅與他國維持最低限度的經貿往來，這也使在近代國際體系中，反而是一個年輕的新成員。明治維新後，日本透過大規模改革，快速增強國力。在對外

戰爭中，日本接連擊敗了中國和俄羅斯，成為當時亞洲唯一獨立自主的新興強國。

美國建國於 18 世紀後期的獨立戰爭，即使包含 17 世紀前半開始的殖民地時期也僅有 200 年歷史。儘管美國在 19 世紀的國力就開始大幅上升，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但直到國內開發告一段落後，才將目光轉向海外擴張。太平洋西側東亞地區因其重要的軍事和商業價值，很快成為美國的重要目標。在美西戰爭中，美國獲得了菲律賓的控制權，之後又透過參加八國聯軍獲得對中國事務的話語權，並倡議原本由英國支持的門戶開放政策，又在日俄戰爭中作為仲裁者協助雙方結束戰爭。與日本相同，美國也在短短數十年間成為東亞不容忽視的崛起強權，兩國都在短時間內成為東亞國際體系的核心成員。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歐洲列強不僅被迫暫緩對海外的投入，國力也遭大幅削弱。美國和日本成為一戰中實質上的最大贏家，並趁勢主導東亞的國際秩序。

在 19 世紀後半，美國和日本的利益衝突有限，反而雙方在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和抑制其他列強的擴張方面有許多共同利益。這也促使雙方的合作持續深化。美國對於修改日本的不平等條約和其朝鮮半島的擴張政策都表達了善意和支持，並在日俄戰爭中積極扮演協調者的角色，協助日本結束與俄國的戰爭。同時，日本也在美西戰爭期間為美國提供各方面的協助，並在外交政策上支持美國主導的門戶開放政策。這段期間雙方良好的互動，讓美國成為除了英國以外與日本關係最為友好的西方國家。

然而，隨著日本在東亞地區的軍事擴張，雙方關係也在 20 世紀初開始出現隱憂。日俄戰爭的勝利讓日美開始在滿州產生衝突，美國本土也在日本移民增加的情況下開始出現大規模排日運動。雙方的外交關係從合作逐漸走向競爭。而日本對中國強硬的外交政策與日美兩國海軍擴張所導致的軍備競賽更使雙方開始以太平洋兩大強權的身分展開長達近 40 年的競合關係。

第二節 友好相處的 20 年代 (1919-192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和日本同時躋升為世界強權。相較於其他西方列強因戰爭而元氣大傷、國力衰退，美國不僅未蒙受巨大損失，大規模戰爭反而造就經濟繁榮。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開始在外交上謀求建立戰後新秩序，但要實現這一目標，美國無法忽略日本在東亞的重要影響力，因此確保日本的服從與配合是美國在東亞建立新國際建制的大前提。

然而美日兩國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同屬協約國，共同對抗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但是兩國的關係自日俄戰爭後就持續惡化，美國本土的大規模排日運動、美國對日本在滿州擴張的干預與針鋒相對的海軍軍備競賽都讓兩國關係持續惡化，這一情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也未獲得好轉，甚至在海軍軍備競賽還進一步升級，使兩國在東亞軍事衝突的風險持續升級。

上述情況也影響到當時美國政治菁英對待日本的態度。除了美國海軍主張繼續與日本進行軍備競賽外，大部分美國政治菁英希望在確保美國安全的前提下，降低與日本軍事衝突的風險。這種態度體現在美國總統華倫·蓋瑪利爾·哈定 (Warren Gamaliel Harding) 主政時國務卿查爾斯·埃文斯·休斯 (Charles Evans Hughes) 對日本駐華盛頓大使幣原喜重郎所說的話：「美國本著坦率友好的精神，盼望消除在遠東所有的衝突和誤解的根源」。⁴⁸同時，他也在與同僚的討論中提出若是日本和美國還在擔心會為了中國問題而開戰，海軍軍備限制就無從談起。⁴⁹這表明美國政治菁英希望緩解日本對美國的不信任和敵意，改善日本對現狀的不滿意和對地位的焦慮。因此，在對日政策上，美國希望以合作代替對抗，降低日本的敵意。

然而美國政治菁英雖然在外交政策上希望減少與日本衝突，但是隨國內孤

⁴⁸ Sadao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napolis, Md: U.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2), 62–63.

⁴⁹ Asada, 62–63.

立主義的復甦，不僅讓美國意圖取代歐洲成為新的國際政治核心的企圖未能實現，伴隨孤立主義而來的還包含更嚴重的排外情緒，美國西岸湧現的強烈排日情緒，促使西岸州政府與民主黨國會議員在國內推行一系列針對日本移民的不平等法案，大幅限制日本移民的權利，這些政策也為日美關係蒙上陰影並最終成為日本在 30 年代對美政策轉向的遠因。⁵⁰

相較於美國，日本則在這一時期面臨更多挑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東亞造成的巨大權力真空被日本趁機填補，戰後日本也成功以戰勝國的身份成為了與歐洲列強平起平坐的大國。然而，與美國繁榮的國內經濟相比，日本在這一時期的經濟卻處於相當不穩定的狀態。

日本透過一戰所創造的龐大需求經濟得以飛速成長，成功擺脫了日俄戰爭所帶來的龐大外債。從開戰時的 15 億 1600 萬日圓的債務國，到 1918 年反而成為 2 億 8737 萬日圓的債權國。⁵¹然而，基礎不穩的經濟隨著戰爭的結束迅速泡沫化。接著又接連發生米騷動、代價高昂的海軍備競賽與關東大地震等一系列事件，讓日本必須做出政策調整與改革。最終，日本選擇接受美國主導的新秩序，並利用這一制度追求與維護自己在東亞的利益與地位。

這一時期也是日本近現代少數由文官與內閣主導內外政策的時期，軍方願意配合政府主導的大規模裁軍政策並服從文官內閣的指揮。此時的日本軍隊，海軍內部由主張英美親善的高層主導，願意配合文官政府的各類要求。陸軍則受北方主要威脅俄羅斯消亡與西伯利亞遠征的失敗聲勢大減，在社會的影響力與地位大幅下降，只得服從文官內閣的指揮⁵²，這一段時期也被認為是大正民主的黃金期。⁵³

⁵⁰ 五百旗頭真著，周永生譯，《日美關係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頁 96-98。

⁵¹ 井上光貞等編，《第一次世界大戰と政黨內閣》（東京，山川出版社，1997），頁 61。

⁵² 戶部良一著，孫維珍、韋平和譯，《日本陸軍史：近代化的異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241-246；Edward J. Drea 著，顧全譯，《日本陸軍興亡史 1853-1945》（北京，新華出版社，2015），頁 209-212。

⁵³ 大正民主指的是以大正天皇在位期間（1912-1926 年）為核心發展一系列社會風潮與政治改革，其中在政黨政治上，不僅成功打破原本藩閥壟斷總理大臣的情況，甚至進一步擴大選舉人範圍，深化日本的民主制度，而在 1924 年到 1932 年間，以國會為基礎的政黨內閣延續了 7

然而尚不成熟的民主體制也讓內閣面對諸多問題，時有耳聞的貪腐事件持續衝擊政黨菁英的形象與影響力。同時一系列改革雖然減緩了經濟問題，但脆弱不成熟的經濟體質卻始終困擾著日本的經濟穩定性，最終也讓日本在經濟大蕭條中受到致命打擊。這些問題也成為 30 年代軍方強硬派接管內閣的藉口。

同時日本在種族議題與滿蒙特殊利益這些對地位的訴求始終不為美國所接受。國內強硬派學者開始提倡激進的亞細亞主義，主張破壞美國建立的東亞國際秩序。這些論述不僅軍隊中廣受歡迎，也為軍中強硬派在 30 年代的修正主義政策提供了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

1921 年華盛頓海軍會議

日美從 1910 年代開始在太平洋爆發的激烈軍備競賽，讓雙方陷入嚴重的安全困境。美國國內強烈的排日運動，日本國內對民族與地位受到不平等對待感到嚴重不滿。這也讓兩國國內都充斥著好戰輿論，從同時期日本國內大受歡迎的「假如日美開戰」之類的書籍，以及美國國內新聞的各種標題諸如「新日禍」、「膚色的浪潮」，可以看出民間對彼此敵意的日漸升高。同時，這也反映出美國對於種族衝突的恐懼，以及日本對美國不平等政策的憤怒。⁵⁴然而相對於態度激進的民間，日美雙方的政治菁英除了美國海軍與部分日本海軍強硬派外，大多希望能規避衝突的擴大，並改善彼此對現狀的不滿。這也使得日本選擇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華盛頓會議，並最終成為華盛頓體系的擁護者。

日本在華盛頓會議的背景

在華盛頓會議之前，由於與美國關係惡化，日本對自己在東亞的地位和處境感到相當焦慮。在日俄戰爭後，日本就開始將美國的海軍力量視為對其帝國

代，也被視為大正民主的黃金期。

⁵⁴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58–60.

的嚴重威脅，並在 1907 年時制訂的《帝國國防方針》，以美國為假想敵，主張維持日美間七比十的海軍力量對比。此後，雙方陷入了激烈的海軍軍備競賽，這也讓日本的海軍規模迅速成長，成為僅次於英美的海軍強權。⁵⁵

但是為因應美國在 1910 年代的大規模造艦計畫，日本為維持實力對比只能毅然大幅提高海軍支出，所需的鉅額國防預算使日本財政不堪負荷。日本陸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西伯利亞干涉的大規模投入更讓財政問題雪上加霜，遠征所花費的軍費高達五億日圓，但高昂的代價不僅未能獲得多少實際利益，反而讓國內民生資源過度耗損，導致 1918 年爆發米騷動。⁵⁶軍事過度支出所導致的經濟危機也讓當時的寺內正毅內閣倒臺。

日本在軍事上的過度支出與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都讓日本亟需改善與美國的緊張關係。對於現狀的不安全感已無法透過軍事擴張得到緩和，日本開始將希望轉向裁軍會議，希望透過華盛頓會議協調雙方對現狀的滿意程度並結束代價高昂的軍備競賽。

美國在華盛頓會議的背景

美國同樣也日俄戰爭後將日本視為東亞的主要競爭對手，在 1905 年日本擊敗俄羅斯艦隊後，日漸強大的日本海軍也讓美國被迫思考如何消除日本的地緣優勢防止菲律賓遭受入侵，美國總統小狄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就曾在信中抱怨：「菲律賓成為我們的阿基里斯之踵，它使當前與日本的形勢變

⁵⁵ Asada, 30–40.

⁵⁶ 米騷動是指因為西伯利亞干涉軍方需要大量糧食因此在市場上大肆購買，讓原本就因為通貨膨脹而高昂的米價進一步飆升，最終讓無法忍受米價的民眾襲擊米商爆發大規模暴動，並一路延伸到多座城市，這一事件嚴重打擊排拒輸入外糧的地主，並促使日本政府開始制定政策在北海道、臺灣、朝鮮等地增產米糧，而這一政策也造成國內農村社會走向衰敗，米騷動也讓民間對於出兵的決定提出嚴厲批判，國會與媒體認為這一次遠征讓日本人白白流血，陸軍在西伯利亞遠征災難性的表現與傳統假想敵俄國的消失也讓陸軍在 1920 年代的前半段時間失去話語權。詳參吉田茂著，陳鵬仁譯，《決定日本的一百年》（臺北，致良，2006），頁 31；戶部良一，《日本陸軍史：近代化的異化》，頁 241–254；Edward J. Drea，《日本陸軍興亡史 1853–1945》，頁 202–208。

得危險」。⁵⁷美國為了應對這一威脅先是在 1907 年到 1909 年間派遣大白艦隊 (Great White Fleet) ⁵⁸環遊世界以彰顯自己具備大規模艦隊遠洋作戰的能力，並在 1911 年為對日作戰制定橙色計畫，將日本視為太平洋的主要威脅，美國海軍軍費的支出也從 1890 年的 2200 萬美元到了 1914 年一路飆升至 1.39 億美元⁵⁹，這也讓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擁有 8 艘無畏級主力艦與 8 艘超無畏級主力艦，數量是法國義大利與日本三國的總和。但美國並未停下腳步，除了在 1916 年下令建造 8 艘主力艦外，之後又在 1918 年提出建造 28 艘主力艦這一讓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規模，雖然之後因為戰爭結束而使 28 艘的計畫為能如願，轉而將計畫建造數量減至 16 艘，但是依然是美國政府在 1916 年批准的兩倍。美國海軍此時的規模已經與原海上霸權英國相差無幾，甚至因為大部分艦艇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或是戰後建造，多屬於新式艦艇更拉開它與其他國家的差距。

強大的海軍這也讓美國政治菁英企圖利用海上優勢去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正為威爾遜總統所言：「有了一支強大海軍，這個國家便可隨心所欲」。⁶⁰主張新秩序的威爾遜試圖在戰後建立超越英國皇家海軍的艦隊並將美國海軍視為重要籌碼，認為它能強迫英國為首的其他海權大國參加由美國主導的戰後國際制度，解決美國在太平洋與大西洋潛在的海上威脅，威爾遜對於國會的喊話中強調如果美國不加入國際聯盟則將陷入無休止的海軍軍備競賽。⁶¹可以看出政府希望建立滿足自己安全需求的新制度，但是與實際意圖相反，美國為了迫使其他國家就範，反而進一步挑起對英日兩國的大規模海軍軍備競賽，甚至讓英

⁵⁷ George W. Baer 著，吳征宇譯，《美國海權百年：1890-1990 年的美國海軍》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 46-48。

⁵⁸ 大白艦隊是指 1907 年 12 月 16 日至 1909 年 2 月 22 日間，經美國總統狄奧多羅斯福命令組成以環球航行為目標的美國海軍艦隊，美國藉此機會展現自己作為新興強國具有大規模遠洋作戰的能力，同時也讓美國海軍積累寶貴的經驗。

⁵⁹ 韓拓、賈慶國，〈美國崛起時是如何規避“修昔底德陷阱”的？〉，《國際觀察》，2019 年第 2 期（2019），頁 54。

⁶⁰ George W. Baer，《美國海權百年：1890-1990 年的美國海軍》，頁 91。

⁶¹ Paul Michael Kennedy 著，沈志雄譯，《英國海上主導權的興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 282-83。

國外交官質疑美國為何執行與官方宣傳完全不同的政策⁶²，這其實也間接說明英日兩國對於美國戰後秩序的战略價值。但是這一政策隨威爾遜總統在孤立主義盛行的國會踢到鐵板後出現轉向，而後新上任的哈定政府則進一步調整政策，放棄以軍備競賽的方式脅迫英日妥協，而希望透過華盛頓裁軍會議徹底解決巴黎和會未能徹底處理的戰後秩序分配。

兩國的強硬派溫和派對比與最終結果

日本在這一時期依然有數量不少的海軍軍官堅持與美國繼續進行高強度競爭，但是海軍高層已經意識到現有政策難以為繼，並願意在海軍規模上做出妥協，這也讓日本此時的外交政策由溫和派海軍與主張與美國和平共存的文官內閣所主導。

海軍內部的溫和派以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為代表，而文官內閣則以首相原敬與外交官幣原喜重郎為代表，而主張對美維持強硬政策的代表則以加藤寬治最具影響力，同為華盛頓會議的代表團成員並曾多次與加藤友三郎發生衝突，而他本人也在日後成為日本海軍內部重要派系「艦隊派」的領導人物。

隨支持干涉西伯利亞遠征的寺內正毅內閣倒臺與日漸嚴重的經濟壓力，新上任的原敬內閣意識到必須設法結束與美國的軍備競賽，在 1920 年內閣成員就在與海軍高層的會議中直接向海軍表明：「我們的財政狀況很快將陷入絕境，會不會破產完全取決於你們海軍」。⁶³在美國大規模的造艦計畫中壓力下，日本為維持噸位與艦艇數量的平衡，花費巨量預算進行軍備競賽，在競爭最激烈的 1921 年海軍預算甚至超過全國總預算的 30%，與日本陸軍所需預算加起來就已經超過 50%，使原本就脆弱的日本經濟面臨更巨大的壓力，新任內閣意識到這一次會議是解決困境的絕佳機會，並希望陸海軍都能配合他的政策。

⁶² George W. Baer, 《美國海權百年: 1890-1990 年的美國海軍》，頁 94-98。

⁶³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57-58.

表四：日本全國和海軍預算（1917-1921）

單位：百萬日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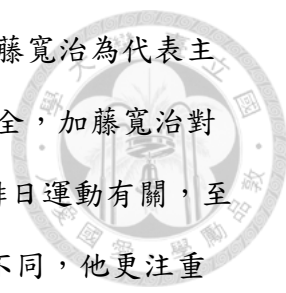
	全國總預算	海軍預算	海軍預算占比
1917	780	119	15.2%
1918	902	185	20.5%
1919	1064	250	23.4%
1920	1505	399	26.5%
1921	1591	502	31.6%

資料來源：Sadao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297.

加藤友三郎為首的海軍高層也與文官內閣抱持同樣看法，加藤友三郎作為海軍大臣更是深知情況的嚴重性，他在1919年的國會預算委員會會議就曾經承認：「即使我們應當與美國競爭，我們也註定難以勝任...如果美國以其無限的財產和資源進行與之相稱的海軍擴張」。⁶⁴同時加藤友三郎對於當時時局有自己的一套見解，根據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觀察，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證明國家不能只考慮短期決戰而必須考慮總體戰，在總體戰中則不能只單純考慮明面的軍事實力，戰爭型態的改變讓國家必須更重視綜合國力。日本不應過度擴張海軍規模導致國家破產，應該保留與國力相襯的海軍即可，盡量在多方面增強國力。⁶⁵在日本國力仍然與美國存在相當差距的前提下，在軍事上與美國過度競爭反而不利於國家利益。從他的主張我們可以看出對於日美兩國權力差距的認知直接影響到他在裁軍時立場，在相對國力衰退時，他更傾向採取戰略撤守，主張以國內改革提升國力，而非進一步在軍事上與美國競爭。以上立場也讓他選擇全力支持政府參加華盛頓會議，並在原敬首相的邀請下擔任代表團團長。

⁶⁴ Sadao Asada, "From Washington to Londo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Politics of Naval Limitation, 1921-1930," *Diplomacy & Statecraft* 4, no. 3 (1993): 152.

⁶⁵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55-60.



而相對於加藤友三郎以總體戰的思維看待日美關係，以加藤寬治為代表主張強硬政策的前線軍官更注重船艦在技術層面如何影響國家安全，加藤寬治對於美國存在嚴重的反感，這與他本人在 1907 年美國親身經歷排日運動有關，至此他就認定美國人普遍將日本視為敵人。⁶⁶同時與加藤友三郎不同，他更注重海軍科技與軍備數量的影響，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中得出與加藤友三郎相反的結論，認為日本若要保證自己的安全必須擁有強大常備軍才能與其他工業能力更強的國家抗衡，因為他們有能力更快的建造海軍艦艇，工業實力較弱的日本需要維持數量優勢才能在戰時保證本國安全，主張透過短期決戰趁美國尚未發揮工業潛力前就直接擊敗美國海軍。⁶⁷

從上述比較中可以發現加藤友三郎與加藤寬治雖然都認知到日美的巨大國力差距，但是加藤友三郎認為日美差距過於巨大，並不存在任何機會之窗。加藤寬治則持相反意見，認為兩國有能力競爭，維持日美軍力的機會之窗更為重要，日本與美國總體國力的巨大鴻溝更讓日本需要在海軍實力上維持優勢以防戰爭爆發。

相對於日本，美國政治菁英對日本戰略威脅的討論中雖然也存在政策分歧。但是主流政治菁英在孤立主義的興起背景下希望減少對外的投入，強硬派的意見並未獲得主流政治菁英的青睞，這也讓新上任的哈定政府決心以溫和的外交政策取代軍事競爭，利用華盛頓會議解決中國問題與海軍軍備競賽。

與開始調整方針的哈定政府不同，美國海軍對於日本依然維持相當強硬的立場，受到馬漢海權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美國海軍高層擔心日本為首的「黃色人種」崛起對美國地位的衝擊，美國海軍戰略委員提出的作戰計畫書不僅害怕日本在中國擴張持續領土並實行貿易獨佔，更害怕日本控制中國達到黃色人種的統一，進而讓「有色人種」橫掃世界。⁶⁸

⁶⁶ Asada, 38-41.

⁶⁷ Asada, 55-56.

⁶⁸ Asada, 58-60.

除了對有色人種的恐懼外，美國海軍高層也擔憂日本為維持地位而與美國衝突。海軍部長助理的狄奧多·羅斯福三世（Theodore Roosevelt III）曾在信中表示：「我見過的最好的專家表示，日本比現代歷史上任何國家都更系統、更徹底地在和平時期進行戰爭準備...雖然日本的軍費支出很可能僅是要維持他在亞洲的主導地位...但與我國之間可能會發生不可避免的摩擦」。⁶⁹這也讓英日同盟成為美國海軍的心腹大患，美國海軍認為若是同時面對英國日本兩大海上強權，可能會在戰力上陷入劣勢，軍事實力差距認知促使美國海軍督促政府繼續推進擴軍計畫。⁷⁰

然而主張溫和政策的哈定政府並沒同意海軍的觀點，雖然美國的政治菁英也都從日本強大的海軍實力、對中國強硬態度與干涉西伯利亞戰爭中意識到日本的潛在威脅，但美國的領導人意識到在東亞的權力競爭很可能會促使代價高昂的軍備競賽繼續發生甚至引發下一輪的戰爭。⁷¹就連推動軍備競賽的前美國總統羅斯福都曾在寫給官員的信中就表示：「關於滿州，如果日本決定做一系列不利於我們的事，我們無法阻止，除非我們已做好戰爭的準備」。⁷²因此新上任的哈定政府認為應該以裁軍與承認日本地位等方式取代軍備競賽。商務部長赫伯特·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認為應該接納與理解日本對中國的強硬政策，有鑑於中國政局的混亂，日本又高度依賴中國的資源和市場，日本推行的對中政策具有合理性。美國代表團成員之一、共和黨親日派議員伊萊休·魯特（Elihu Root）則將日本看作維護東亞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力量，認為美國必須承認日本在東亞的地位已成定局，而目前東京執掌政府的是一群溫和的自由主義者，應當明確地向之示好以加強其地位。⁷³根據美國國務院助理對於美國華盛

⁶⁹ Asada, 58–60.

⁷⁰ 為此美國進一步在 1919 年提出新一輪造艦計畫，要求在興建 10 艘主力艦與 6 艘巡洋艦以制衡英國海軍，美國為了幫自己的擴軍政策辯護，向英國提出這些作為是為了保護美國貿易網絡與自衛並宣稱美國需要保護的區域已經超過英國，包含大部分美洲地區並一路從太平洋東岸延伸到菲律賓，這也讓美國同時與日本與英國陷入嚴重的緊張關係。詳參 George W. Baer, 《美國海權百年：1890-1990 年的美國海軍》，頁 94–98。

⁷¹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102.

⁷²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64.

⁷³ Asada, 64.

頓會議代表討論會談方針所作的備忘錄中可以看出負責談判團的態度，備忘錄強調美國「唯一且首要關心的重大問題」是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削減海軍軍備至關重要，遠東問題只是次要。為此會議必須盡力消除日本對美國的疑懼。為完成上述目標，美國必須接受日本所聲稱與中國的「特殊關係」原則。⁷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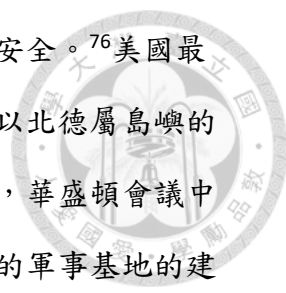
由上述內容可以看出新任政府在華盛頓會議的立場，為了保證戰後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保障，而為此必須讓日本參與裁軍會議，並願意為此對日本做出讓步與承諾。美國的溫和派菁英雖然也意識到日本國力提升所帶來的威脅，但是並不願為此與日本擴大衝突，相反的他們希望滿足日本在地位的索求並改善日本對現狀的認知來降低戰爭風險。

日本和美國溫和派的政治菁英最終都成功壓制了強硬派的主張，在 1922 年 2 月 6 日簽署《華盛頓海軍條約》，成功以裁軍為手段結束了兩國多年的高強度軍備競賽。在日本國內，雖然強硬派要求不可對美國作出妥協，主張兩國應享有平等的地位，光是接受比美國更低的海軍噸位限制就已經是莫大的讓步。若考慮作戰需求，則最少也得堅持與美國海軍維持 70% 的實力對比。然而，加藤友三郎並未遵守這一要求。他憑藉與文官內閣的合作、自己對海軍的強大控制力以及海軍元老東鄉平八郎的支持，壓制了強硬派的反對意見。在過程中，堅持反對在海軍比例上做出妥協的加藤寬治試圖以電報回報本國等方式扭轉局勢，但事無補。最終，加藤友三郎拍板接受了以 60% 的比例換取《四國條約》中美英兩國不會在西太平洋建設新要塞和海軍基地的保證，同時放棄日英同盟的續約並承諾在山東問題中做出讓步。這一系列操作不僅讓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得到保障，海軍噸位的限制也為日美雙方避免戰爭提供了前提。⁷⁵

美國海軍的意見也如同日本海軍的強硬派未能影響會議的走向，海軍擔心日本在巴黎和會中所取得的赤道以北德屬島嶼的委任統治權會對美國海軍計畫造成嚴重威脅，希望阻止日本控制這些島嶼，但是國務院的外交官們認為這些

⁷⁴ Asada, 64.

⁷⁵ 五百旗頭真，《日美關係史》，頁 88-92。



島嶼由國際聯盟安排並已要求日本不設防，這樣已經足夠保證安全。⁷⁶美國最終在會議中沒有對日本提出進一步要求，並承認日本對於赤道以北德屬島嶼的委任統治權。除了未能阻止日本強化對太平洋島嶼的控制權外，華盛頓會議中的結果也讓海軍元氣大傷，美國談判代表不僅放棄對西太平洋的軍事基地的建設權，甚至要求海軍報廢 15 艘現役主力艦。從以上種種也可以看出美國海軍在國內政治菁英中處境相當弱勢，他們發現自己正被國內輿論所孤立，海軍高層就曾提到當時海軍的處境：「海軍成員們發現在他們的記憶中，自己的觀點從未如此廣泛地遭到民眾反對」。美國海軍在國內孤立主義興起的背景下失去說服國民繼續投入的理由，正如官僚對裁軍給出的解釋一樣，條約比海權更能給遠東帶來整體的穩定，國會並不支持軍備競賽。⁷⁷最終哈定政府在幾乎無阻礙的情況下完成華盛頓會議的目標，重新安排了戰後太平洋的國際秩序。

華盛頓海軍會議有效確保日美之間的安全保障並建立東亞戰後的國際秩序，華盛頓海軍條約成功讓日本確立了在東太平洋的地位，並化解了美國在東亞逐漸增強的軍事威脅。美國在放棄對關島與菲律賓進一步的軍事基地建設後也讓雙方都無力對彼此發動大規模的跨海作戰，成功化解彼此的安全困境，緩解雙方對於現狀的擔憂，美國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也讓日本不再成為新秩序的威脅，反而讓日本成為新國際秩序的擁護者。

⁷⁶ George W. Baer, 《美國海權百年: 1890-1990 年的美國海軍》, 頁 101-102。

⁷⁷ George W. Baer, 《美國海權百年: 1890-1990 年的美國海軍》, 頁 114。

表五：華盛頓海軍裁軍會議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日本	美國
溫和派	加藤友三郎為首的溫和派海軍 文官內閣	哈定政府
強硬派	加藤寬治為首的強硬派海軍	美國海軍
實力對比	溫和派大勝	溫和派大勝
理論預期	若兩國皆由溫和派政治菁英主導，兩國會和平共存。	
結果	和平共存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924 年美國排日運動

這一事件中日本國內雖存在反對聲浪，但都未能形成對文官內閣政策的有效反制，因此日本仍然維持對美國友好的政策路線。相比之下，美國國內溫和派和強硬派之間的對立非常明顯，哈定政府並不支持排日政策的推動，但是日本移民帶來的經濟壓力讓民主黨國會議員和西岸州政府優先考慮國內政治需求，最終在國內壓力下美國通過了對日裔的不平等法案，限制了日本移民並立法排除了日本的擴大經濟影響力。

日本在排日運動中的背景

針對美國逐步升級的不平等政策，日本曾多次嘗試改善這一情況，在巴黎和會中日本就曾推動將種族平等明文寫進國際聯盟憲章中，希望以此保障美國日僑的權利，日本外相在會議中就曾表示，該提議的目的不是要求所有有色人

種的種族平等，而是要求國際聯盟成員國的種族平等，換言之，日本希望賦予自己的國民在主流國家受平等對待的權利。這除了反應日本對於種族歧視的嚴重擔憂，也展現日本希望能透過國際建制來追求與西方同等的地位的意圖。⁷⁸但這一要求卻遭到美國與澳洲的強力反對而失敗，這一次失敗也讓部分政治菁英與提倡亞細亞主義知識份子高度不滿。在日美開戰前夕擔任首相的近衛文麿就對巴黎和會中，日本的反歧視條款遭美國拒絕時表示：「具有道理的人種平等案，因為是由實力不足的日本提出而被拋棄，相反的沒有道理的門羅主義卻因為是由有實力的美國主張而被浮濫的插入進國際聯盟規章中」。⁷⁹著名的亞細亞主義者同時也在後來參與內閣刺殺的大川周明就將國際聯盟拒絕種族平等提案的視為「結束親西方外交框架的機會」，並提倡退出國際聯盟。⁸⁰

國際聯盟修改不平等政策的計畫失敗後，美國國內反日的浪潮不僅未能獲得改善，民主黨甚至試圖進一步推動更嚴格的排日法案完全排除來自日本的移民，這也讓日僑移民面臨進一步遭受不平等對待的風險。

美國推行排日政策的背景

日本對美國的移民最初主要是集中在夏威夷地區，對美國本土的大規模移民直到 1890 年代才開始出現。然而，自十九世紀末起，美國就已開始對亞裔民族進行排斥，最初以華人為主。1882 年，美國甚至制定排華法案，禁止華工進入美國十年。隨著日本移民美國的人數逐漸增加，對美國國內的經濟活動也開始產生影響，這種排斥感也開始擴及到日本移民。第一波大規模的排日運動發生在舊金山，並在日俄戰爭後進一步惡化。舊金山政府宣佈開設隔離的日本學校並禁止與白人共同上學，同時國家政府也在 1907 年進一步禁止持有墨西哥、加拿大和夏威夷簽證的日本或韓國勞工入境，以此封鎖夏威夷進入美國本土的移

⁷⁸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115.

⁷⁹ 加藤陽子著，黃美蓉譯，《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臺北，廣場出版，2016），頁 194–195。

⁸⁰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117–19.

民路線。最終，日美雙方通過日本主動限制移民數量的紳士協定達成妥協。

在美國和日本簽屬紳士協定後，日本的直接移民雖然減少，但通過讓女性嫁入美國的方式，美國的日本移民反而大幅增加，並開始在農業方面衝擊當地白人的經濟利益。這再次促使美國國內醞釀新一輪更大規模的排日運動。

兩國的強硬派溫和派對比與最終結果

日本在這次事件中始終由溫和的文官政府控制局面，雖然國內的知識份子與民眾曾為此引發一系列反美遊行與示威活動，並讓新渡房稻造與澀澤榮一等親美的著名自由派學者深受打擊，但是並沒有形成足以撼動主張對美親善的文官內閣。當時主持對美政策的幣原喜重郎堅持以務實的態度與美國來往，並成功說服國會維持對美友善的政策。內閣雖然有透過正式外交途徑與動員美國日僑等方式試圖阻止法案的通過，但基本上都維持相當克制的外交政策。

相較之下，美國的情況與日本不同，強硬派與溫和派在激烈的競爭後以強硬派獲勝告終。美國的強硬派主要由國會的民主黨議員與西岸的地方政府組成，他們希望進一步限制日本移民的數量與經濟影響力。首先推動美國在 1913 年通過第一次排日法案，緊接著在 1920 年加州的美國民主黨利用反日作為爭取農民支持的競選口號贏得加州的大選，並進一步制定第二次排日土地法限制日本移民的經濟影響力。但是民主黨並不滿足於現狀，在 1924 年希望在國會通過全國性的排日移民法，徹底封鎖日僑移民的可能性。

與國會持不同意見的主要是關心對日關係的國務院與哈定總統，他們有實際意識到排日移民法的通過將對日美關係產生致命性的影響。國務卿休斯與當時的哈定總統都曾試圖避免法案的通過，休斯就曾在信中提到寫信說：「日本人是一個敏感的民族，他們無疑會認為這樣的法案將在自己身上留下恥辱的烙印」，並警告法案「將破壞華盛頓會議的成果」。⁸¹駐日大使館曾對國內報告排

⁸¹ Walter LaFeber 著，史方正譯，《創造新日本：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頁 180-183。

日法案將重挫日本國內的對美協調派並激化敵視美國的亞細亞主義，美國駐日大使也曾表示：「新移民法是第一級規模的國際災難，是美國在極東外交的巨大災難」。⁸²可以看出美國溫和派的菁英認知到這一法案的對日美關係的潛在傷害，擔憂這一政策會傷害日本對地位的要求。

最終美國總統哈定領導的共和黨政府雖然嘗試阻止，但是在共和黨正深陷政治醜聞的背景下最終失敗，無力阻止法案在國會通過。而與之相對，日本則從頭到尾都由主張對美親善的文官與內閣控制局面，在嘗試各種管道都無效的情況下日本政治菁英選擇妥協默認法案的通過，排日法案最終在 1924 年 7 月 1 日開始正式實行。

這一事件對日本產生深遠的影響，雖然日美明面上並未爆發正面衝突，但是卻直接影響兩國在 30 年代的互動，首先這一事件加深軍中強硬派對美國的反感。其中艦隊派的領袖加藤寬治就在與在其他高層的信中表達對於 1924 年「移民法案」的憤怒，強調就是因為美國政府得意洋洋並瞧不起日本，才會通過驅逐日本移民的「移民法案」，並損害日本的榮譽。地位的平起平坐也因此成為他對於日美關係的重要訴求，作為日後海軍主流派系領導人，他對於美國的反感也為日後的日美關係埋下未爆彈。⁸³

另一點則是排日法案所激起的激進亞細亞主義，日本原本受溫和派青睞，主張透過學習西方文明並有機結合東方文明的東西文明調和論受到嚴重打擊，取而代之的是主張黃種人與白種人的衝突與白種人對黃種人壓迫的亞細亞主義崛起。⁸⁴

面對美國的不平等政策，以幣原喜重郎為首的文官內閣雖然對內強調移民法屬於美國內政，主張應繼續維持與美國的友好外交政策，但是在面對國會的質疑時，他們只能含糊地表示，美國人只是想把日本人趕走，並沒有暗示日本

⁸² 麻田貞雄，《兩大戰間の日米關係：海軍と政策決定過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頁 306–307。

⁸³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30–31.

⁸⁴ 麻田貞雄，《兩大戰間の日米關係：海軍と政策決定過程》，頁 290–291。

人更劣等的意思。這一說詞顯然未能說服國內的強硬派。對於提倡亞細亞主義的知識分子而言，1924 年的移民法案再次證明瞭他們在 1919 年與威爾遜拒絕接受種族平等條款所得出的結論：美國人鼓吹普世原則，但卻在國內實踐種族歧視。⁸⁵這也顯示儘管日本國力提升，盡力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卻依然無法被西方平等對待，日本的民族地位被美國以法律明文否定。地位的不公平待遇加速亞細亞主義走向激進化，並對軍方高層為首的政治菁英產生影響，最終成為 30 年代提倡修正主義政策的日本軍官的理論基礎。

表六：排日法案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日本	美國
溫和派	文官內閣	哈定政府
強硬派	無	民主黨國會議員與西岸州政府
實力對比	溫和派勝利	強硬派勝利
理論預期	若兩國政治菁英一方由溫和派主導，另一方由強硬派主導，則由溫和派主導的國家會對另一方的要求做出妥協	
結果	單方妥協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⁸⁵ Walter LaFeber, 《創造新日本: 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180-183。

第三節 從合作走向競爭的 30 年代（1929-1935）

1929 年美國股市的大暴跌引發的金融危機迅速擴展到全球，並對原本就脆弱不堪的日本經濟產生沉重打擊，日本股價暴跌，中小企業的倒閉潮導致超過兩百萬人失業，重要出口生絲價格也隨之暴跌超過一半，嚴重打擊原本就貧困的鄉村地區。⁸⁶對於鄉村經濟的嚴重衝擊直接影響到大量兵源來自農村的日本軍隊。⁸⁷軍中迅速累積對政府的不滿，軍官開始在軍中組織各種極端秘密組織，策劃針對內閣成員與菁英文官的暗殺。激進的亞細亞主義者也助長這些極端行動，並為這些軍官提供意識形態的支援。同時，嚴重的經濟問題不僅造成國內政局混亂，也開始讓部分強硬派政治菁英試圖透過對外發動修正主義政策來轉移國內問題。

在外交方面，中國國民政府的強烈民族主義政策也開始挑戰日本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隨著國民政府北伐成功控制全國，這一趨勢變得更加明顯。這一系列衝擊使日本在內政與外交上都遭遇巨大挑戰，最終衝垮了日本本就不穩固的政黨政治。文官為首的溫和派被排除，改由軍方主導國家內外政策。日本也從華盛頓體系的積極參與者，轉而尋求脫離華盛頓系的束縛。在這一時期，日本不僅在東北與華北發動一系列戰爭，在當地扶持多個親日的傀儡政權，並陸續退出國際聯盟與海軍裁軍會議。透過一系列修正主義外交政策，日本成功走出國內的經濟危機，但也使自己孤立於東亞的國際社會。

美國在這一時期同樣受困於經濟大恐慌中。一度國內失業率高達 25%。但相對於義大利、德國與日本以侵略擴張來解決國家經濟問題，美國的政治菁英並未在外交與軍事上展現出擴張的意圖。反而透過戰略撤守來應對國力衰退。國內的孤立主義使美國選擇對內實行「新政」，由國家主導在國內進行經濟改

⁸⁶ 由井正臣著，初曉波譯，《岩波日本史·第八卷：帝國時期》（北京，新星出版社，2020），頁 128。

⁸⁷ 戶部良一，《日本陸軍史：近代化的異化》，頁 267-270。

革。但上述情況也使國內政治菁英在推動積極的外交政策時會受到更強的阻礙。國內比起對外政策更注重經濟改革。這也使總統與國務院若是企圖對日本的東亞擴張行動積極回應時，會受制於國會的孤立主義，難以採取行動。⁸⁸



1930 年第一次倫敦海軍會議

美國的政治菁英比起外交政策更關注於擺脫經濟的泥淖，而與日本密切的貿易往來讓美國國內除了海軍以外大部分主流政治菁英希望透過這次會議釋放善意，提供推動親美政策的文官內閣對內交代的籌碼以利於日美關係。而日本此時的海軍也已分裂為艦隊派與條約派兩大派系，艦隊派主張強硬的面對歐美，在地位上必須維持對等，不容在海軍比例上做出任何讓步，主張退出比例不對等的海軍協議。條約派則承繼承加藤友三郎透過改善與英美關係保障國家安全的主張，並與致力於財政改革的文官內閣合作與艦隊派對抗。

日本在第一次倫敦海軍會議的背景

日本海軍的地位在華盛頓海軍裁軍會議中得到確立，日本不僅擁有僅次於英美兩國的海軍艦艇噸位限制，同時也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排除英美兩國興建任何軍事基地。但是隨時間的推移，華盛頓海軍會議的結果逐漸無法再讓日本海軍強硬派滿足，強硬派開始尋求對於海軍地位的進一步提升，並開始對海軍內部產生強大影響力。

這一情況的產生與海軍高層的人事變動密不可分，日本海軍大臣後兼任首相的加藤友三郎在 1923 年去世後，海軍內部就失去了能完全統禦內部的領導人，這不僅讓海軍內部的派系鬥爭開始日益嚴重，也開始讓加藤友三郎在華盛頓會議中立下的海軍方針受到挑戰。加藤友三郎的追隨者山梨勝之進上將就曾在二戰後表示：「如果加藤友三郎元帥再活幾年，日本就不會陷入絕境（太平洋

⁸⁸ 五百旗頭真，《日美關係史》，頁 116-119。

戰爭)」。⁸⁹日本海軍嚴重內部的分裂也削弱他與其他政治勢力競合的能力，這也成為海軍無法阻止日本在 1941 年對美開戰的原因之一。⁹⁰

1929 年爆發的經濟大蕭條也讓日本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日本經濟高度依賴美國市場，而美國為保護本土產業對日本實行嚴格的關稅壁壘直接重創日本脆弱的經濟，雖然日本政府以各種經濟改革嘗試解決問題，但是仍然難以擺脫持續性的經濟衰退。

美國在第一次倫敦海軍會議的背景

美國此時正面臨經濟大恐慌帶來的強大國內壓力，美國失業率在 1929 年到 1933 年之間從原本的 150 萬人一路上升至 1260 萬人，高達全國 25%，為了挽救經濟國會甚至在 1930 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 將關稅稅率提升到 20 世紀最高紀錄來保護自己商品與市場，但是這一政策不僅重創日本與英國等海軍強權的經濟，也直接惡化美國與日英的外交關係，英國甚至與美國走到經濟戰的邊緣。⁹¹在這樣的背景中，美國總統與國務院希望藉由倫敦海軍會議修復與英日兩國的關係，甚至願意為此在會議中做出讓步。

兩國的強硬派溫和派對比與最終結果

日本此時國內的強硬派與溫和派大體實力相當，這也讓日本在倫敦海軍會議中搖擺不定，直到最後才在天皇為首的皇室官員介入下，溫和派才勉強壓制強硬派，簽署新的裁軍條約。

日本海軍軍官主要分裂為兩大勢力對峙，分別為加藤寬治為首的軍令部與前線軍官組成的「艦隊派」和負責行政工作、掌握海軍省要職的海軍官僚為主

⁸⁹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03–5.

⁹⁰ Asada, 161–62.

⁹¹ Walter LaFeber, 《創造新日本: 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190–191。

的「條約派」。艦隊派大部分由第一線的軍官組成，因此更關心武器裝備與數量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主張以擴軍解決日本國防的「嚴重缺陷」，認為軍力比條約更能維護國家利益。艦隊派的重要人物山本英輔就曾在寫給同僚的信中抱怨：「艦隊是國家的第一道防線，為了克服條約帶來的不足，正在不分晝夜地訓練，而海軍省的高官卻在面臨財政困難時急於做出妥協」，並指責東京的海軍高層是案頭官吏而非海上武士。加藤寬治本人也曾在 1927 年的巡洋艦夜間訓練意外中宣稱這次意外的責任並非自己過度訓練，反而將責任歸因於華盛頓公約，表示條約對艦艇的限制讓日本海軍必須在不利的條件下作戰，因此才必須進行嚴苛的訓練，只有通過這些艱苦的訓練才能擊敗美國。⁹²

加藤寬治本人在 1929 年出任軍令部長確立他在軍令部的領導地位，並成為艦隊派的領導人物。而他對於美國的警戒與厭惡情緒也並未隨 20 年代的「海軍假期」而減少，甚至反而有進一步升溫的態勢，在他心目中對於海軍比例的堅持已經超越軍事範疇，在他寫給天皇近臣牧野伸顯和安保清種上將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對於美國與日本地位不平等的強烈不滿：「日本越是謙虛地放棄自己的平等主權，默許 70% 的比例，美國就越是明目張膽強加 60% 的比例給日本」、「真正的問題已經不只是海軍，而是我們國家的威望與信譽」。⁹³這也讓他更堅定相信與美國艦隊數量上的差異不僅在軍事上迫使日本海軍處於不利的作戰條件，也是日美地位不平等的象徵，必須做出修正。

另外主張強硬政策的艦隊派也得到其他勢力的支持比如後來在海軍派系平衡中擔任要角的大角岑生、曾支持裁軍但後來改變立場的海軍元老東鄉平八郎⁹⁴與宮中重要人物伏見宮博恭王的協助。除了其他勢力的支持外，海軍內部親英美派比例的下降也造成海軍態度的轉變，隨英日同盟的廢除，日本海軍的留學生開始從英國轉向德國，雙方也在海軍技術層面建立深厚的聯繫，這也讓許

⁹²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10–11.

⁹³ Asada, 130–31.

⁹⁴ 景南阪井，《英傑加藤寬治：景南回想記》（東京，ノーベル書房，1979），頁 31。

多留學回來的海軍軍官與技術人員成為親德派並對英美持負面態度。⁹⁵

相對於組成較為單一的強硬派，溫和派由各種不同勢力組成，包含海軍內部的條約派、文官內閣與皇室官員等等。與由前線軍官為主的艦隊派不同，條約派大部分由負責後勤與文書的官僚組成，雖然大多缺乏在艦隊中擔任要職的經驗，但他們主掌行政工作並控制海軍省的要職，並繼承華盛頓會議主導者加藤友三郎觀點主張國際協調。核心人物包含山梨勝之進、堀悌吉、左近司政三等人，在海軍內部除了條約派外，海軍上將後擔任首相的岡田啓介也支持條約派的立場，支持裁軍並認為應該與英美保持親善，他在自傳裡表示：「我們應該避免通過軍事擴張與美國和英國發生戰爭，並努力增強我們的國力」。⁹⁶這也成為他在倫敦海軍會議的行動方針。條約派認為比起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維持條約更能維持日本的安全。⁹⁷

條約派與艦隊派的矛盾雖然原本就存在，但是這一次會議讓雙方的衝突達到空前的高度，同為海軍出身的日本首相齋藤實就曾發表看法：「當前的騷動源於加藤寬治對當時華盛頓會議日方代表加藤友三郎上將（政策）的反感」。⁹⁸

相對於陷入嚴重對立的海軍，日本文官內閣則急於在倫敦裁軍會議上做出成果，1930年的日本正籠罩在大蕭條所造成的巨大的金融危機中，急需擺脫經濟上的困境，首相濱口雄幸將這次裁軍會議視為改善英美關係與減少財政支出的重要契機，故他高度重視這一次海軍協議並強調：「如果過於執著軍備立場而使海軍條約落空，將會在廣義的層面上損害我們的國防」。他選派同樣主張日本無力進行軍備競賽並支持裁軍立場的文官若槻禮次郎擔任代表團首席。⁹⁹當時擔任外相的幣原喜重郎同樣也主張維持與英美的友好關係，極力促成這次會議的成功，他們三人構成在海軍裁軍會議中的重要角色，讓內閣成員保持團結

⁹⁵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66–67.

⁹⁶ 岡田啓介，《岡田啓介回顧錄》（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5），頁40–42。

⁹⁷ George W. Baer，《美國海權百年：1890-1990年的美國海軍》，頁129–130。

⁹⁸ Sadao Asada, *Culture Shock and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Historical Essays* (Columbia,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7), 136.

⁹⁹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31.

的同時，主張繼續維持對英美友善與裁軍的政策方針，力扛對於日本地位有更進一步要求的海軍強硬派。

除了文官、內閣與軍方外，皇室官員也在這一次會議中做出表態，包含元老西園寺公望、內大臣牧野伸顯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都支持濱口首相的政策方針，甚至天皇也曾在與首相的會面中要求他盡力達成倫敦會議以為世界和平之利益。¹⁰⁰可以看出皇室官員認為比起重啟軍備競賽，維持現有海軍政策更符合日本利益。

在這一次倫敦海軍會議中，與日本國內政治菁英激烈對抗不同，美國與上一次華盛頓海軍會議一樣，依然由溫和派控制局面，海軍作為強硬派甚至被進一步邊緣化，無法在會議中發揮影響力，最終溫和派對日本作出讓步，成功讓日本停留在現行制度中。

美國海軍基本上維持與華盛頓會議同樣的立場，希望提高美國的艦隊規模並削弱日本在西太平洋影響力，希拉蕊·P·瓊斯（Hilary P. Jones）為首的強硬派擔心若是與日本開戰美國將在太平洋面對實力不對稱的難題，瓊斯認為基於美國在太平洋擁有眾多隔絕的島嶼，日本佔 60% 的海軍就實質等於 100% 或更多。¹⁰¹可以看出美國海軍認為光是維持現狀對國防安全就已經構成巨大危險。

而與海軍意見相反溫和派則以美國國務院與胡佛總統為核心，外交政策的領導人並不認為美國會與日本交戰，國務卿史汀森就曾表示他無法想像國會會因為日本打算在中國幹些什麼而向日本宣戰。¹⁰²他對海軍高層的擔憂不以為然，他曾以誇張的方式描述美國海軍的擔憂，表示美國海軍高層經常從邏輯的世界退入宗教世界，在那裡海神尼普頓是上帝，馬漢是先知，而美國海軍是唯一的正統教會。¹⁰³美國總統胡佛則秉持孤立主義的立場，對於海軍建設興致缺缺，認為美國軍隊只需要有能力阻止外國士兵登陸美洲大陸即可，除此之外，

¹⁰⁰ Asada, 147–48.

¹⁰¹ Asada, 151–53.

¹⁰² Walter LaFeber, 《創造新日本: 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179。

¹⁰³ George W. Baer 著，《美國海權百年: 1890-1990 年的美國海軍》，頁 126。

外交政策不需要也不會用到海軍力量。¹⁰⁴面對國內混亂的經濟，以裁軍減少公共開支成為合理的選項，胡佛總統甚至將裁軍與戰爭債和賠償掛勾，表示若相關國家可以保證不將資金用於戰爭，他願意減免這些支付。¹⁰⁵同時美國的溫和派政治菁英也注意到日本內部圍繞裁軍會議正在展開激烈的政治鬥爭，對於日本政局，他們也希望藉由在倫敦海軍會議中做出讓步，提高溫和派在日本國內的影響力。¹⁰⁶

可以看出美國總統與國務院高層不僅希望進一步縮減對外投射國力的海軍規模，實行戰略撤守集中力量恢復衰退的國力，也願意對日本做出進一步讓步，維持日本對現有地位與現狀的滿意程度。

日本國內的溫和派與強硬派陷入激烈競爭，雙方都難以壓倒另一派的意見。日本海軍的強硬派提出的三大準則，輔助艦噸位達美國 70%、重巡洋艦 70%、潛艇保有 7.8 萬噸，並強調這是基於日本實際作戰所需要的最低數量不可讓步，而這一要求並不為英美同意使談判陷入僵局。

突破這一僵局的首先是負責談判的文官們，雙方先是強勢推動《里德—松平妥協案》，讓日本的總噸位占美國 69.75%，潛艇數量則與英美持平並獲得改善排日法案的承諾，隨後文官與內閣先是成功說服海軍內部的條約派支持這一草案，雖然條約派也並非完全滿意這一結果，但認為若是將軍事技術層面外的政治與外交納入考慮則勉強能接受這一妥協。¹⁰⁷而在過程中雖然加藤寬治曾透過串聯國內媒體與透過東鄉元帥對談判代表施壓等手段企圖影響結局¹⁰⁸，但是最後在岡田啓介的周旋、與濱口首相獲得來自天皇與皇室官員的支持下，最後勉強壓過強硬派的意見，成功達成協議。

美國則由溫和派強勢排除強硬派影響力後對日本作出讓步。海軍作為強硬

¹⁰⁴ George W. Baer 著，《美國海權百年：1890-1990 年的美國海軍》，頁 126。

¹⁰⁵ 入江昭著，施茵、張振江譯，《美國的全球化進程(1913-1945)》(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4)，頁 112-113。

¹⁰⁶ Walter LaFeber，《創造新日本：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194-195。

¹⁰⁷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43-45.

¹⁰⁸ 佐藤國雄，《東鄉平八郎元帥の晩年》(東京，朝日新聞社，1990)，頁 95-102。

派曾在 1927 年的日內瓦海軍會議直接影響會議走向，並最終阻止美國與其他國家在會議中達成協議，以上經驗也讓國務院與總統在這一次會議前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包含長達 7 個月的先期會議準備，並嚴格限制海軍高層在會議的權限，僅允許他們提供諮詢意見，並選擇親日的威廉·普瑞特（William V. Pratt）領導諮詢委員會以最小化強硬派海軍的影響力。正如同代表團主席對胡佛總統的報告，美國代表團是一個：「和諧一致的集體，每個人都努力工作」。¹⁰⁹溫和派主導了美國的談判，並與陷入嚴重分裂日本形成強烈對比。

日美達成的裁軍條約雖然成功維持了華盛頓體系的運作，但仍然殘存許多問題，對於會議結果日美不同政治菁英之間存在嚴重認知分歧，相對於義憤填膺認為遭到不平等對待的日本海軍，美國強硬派海軍對此持完全相反態度，美國鷹派軍官認為這一條約不僅是美國的重大讓步也是重大失利，日本透過這一會議已成功掌握西太平洋的海上霸權，美國溫和派則是將這次談判視為對於濱口、若槻、幣原等溫和派的支持，希望維持溫和派對於國內的控制。¹¹⁰

但事實上在日本國內產生了與美國認知完全不同的結果，雖然這一條約的達成受到國內民眾的歡迎，但卻讓國內激進右派開始以激進手段「淨化國家」，以批准這一條約的濱口首相在同年遭右翼分子暗殺為起點，日本開始出現一系列針對文人政府與溫和派軍官的暗殺與政變，主張對美協調的文官與條約派海軍高層遭到大規模的殺害，開啟 1930 年代日本混亂的政局。在海軍內部，艦隊派認為倫敦會議再一次驗證英美不願意給予日本對等地位，加藤寬治在會議過後認為日本地位未受應有的尊重並表示：「日本像被盎格魯美國強權綁住手腳然後被扔進監獄中」。¹¹¹艦隊派也因此加劇與條約派的競爭，並在 1933 年大獲全勝排除條約派，同時陸軍也在同一時間開始策畫建立一套排除政黨政治、以軍部為核心的政治體制。¹¹²

¹⁰⁹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33–34.

¹¹⁰ Asada, 151–53.

¹¹¹ Asada, 157.

¹¹² 由井正臣，《岩波日本史·第八卷：帝國時期》，頁 128。

從其他國家的角度來說，日本的溫和派不僅壓制了國內的激進派，還在條約中獲得實際作戰的優勢與海軍地位的再次提升。但在日本國內卻被強硬派理解為完全相反的結果。從日本國內強硬派激烈的反對聲浪中可以看出日本軍方的強硬派已經不滿足於現有華盛頓體系，強硬派的阻撓開始大範圍侵蝕日本在國際制度的參與。強硬派也以這一事件為起點，開始大規模清算溫和派，並主導日本的對美外交政策。

表七：第一次倫敦海軍會議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日本	美國
強硬派	艦隊派	美國海軍
溫和派	條約派 文官內閣 皇室 官員	國務院 胡佛總統
派系實力對比	溫和派勉強獲勝	溫和派勝利
理論預期	若兩國皆由溫和派政治菁英主導，兩國會和平共存。	
最終結果	和平共存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931年九一八事件到日本退出國際聯盟

倫敦海軍會議中日本的溫和派上尚能有效發揮作用，除了文官此時仍然具備與強硬派對抗的能力外，日本海軍內部仍然有相對溫和的條約派支撐才讓會議能圓滿落幕。但是當更為激進且團結的陸軍帶頭引發事件，並得到海軍艦隊派的支持時，主張溫和政策文官內閣的制約能力則進一步受到挑戰，並成為日本強硬派與溫和派勢力逆轉的起點。

美國國內面臨強大的經濟衰退，實行戰略撤守，不僅國會無心介入東亞糾紛，政府也不希望對日本採取強硬的外交政策，造成與日本的關係進一步惡化，國內政治菁英不論是政府官員、國會議員都還是主張用溫和消極的方式處理問題，不願意對日本的修正主義政策強力回擊。

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事件背景

日本在日俄戰爭後取得關東州與南滿洲在內的諸多權利並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勢力範圍，並在 20 年代多次在公開與非公開場合要求各國承認日本在滿州擁有特殊權力，但都未能如願。並且在 30 年代前後，日本對滿州的控制也開始出現鬆動，經濟大蕭條引發的經濟危機重創滿洲的農產品，滿洲鐵路的營運也出現赤字，這都顯示日本的經濟地位出現衰退。

另一項則是中國蓬勃發展的民族主義，在國民政府北伐的過程中，日本軍方就曾多次嘗試阻撓，不僅曾在北伐軍路過山東時引發的濟南事件，關東軍也曾私自在 1928 年引發皇姑屯事件，炸死北洋軍奉系軍閥領袖張作霖，試圖在國民政府進入東北以前搶先製造混亂藉機控制東北全境，但最終未能成功，反而使張作霖之子張學良決心加入國民政府，並以民族主義為號召，推動大規模排日運動。日本的一系列政策不僅讓國民政府內部的親日派勢力大幅衰退，國民政府也在全國統一後計畫收回日本在東北的鐵路，並拒絕讓日本興建新的鐵路。國民政府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施壓刺激到日本強硬派軍方，加速日本軍方對於現狀的不滿。這一浪潮也影響滿州的日本僑民，使「滿蒙獨立論」受到僑民熱烈歡迎，為日本強硬派使用武力提供有利條件。¹¹³

與此同時，英美兩國始終不願意以公開條文的形式具體保障日本在滿州的利益與地位也加劇日本對於華盛頓體系的反感，雖然美國曾在 1917 年在藍辛-石井協定中以日本遵守門戶開放政策為交換承認日本在滿蒙享有特殊利益，但

¹¹³ 読売新聞戰爭責任検証委員會，《検証戰爭責任 II》（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6），頁 9。

是這一協定迅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遭九國公約所取代，但與藍辛-石井協定相比，九國公約卻沒有明文保障日本在滿蒙地區的特權，之後日本也多次嘗試突破這一限制但都以失敗告終，擔任中國外交署局長的有田八郎就曾在 1928 年的文件中寫道：「關於日本擁有東三省的特殊利益這一點，從來各國多有爭論，至今為止各國都未承認，而在最近甚至連英國外相對於下議院勞動黨國會議員的質詢中都表示，英國不承認日本在滿州擁有任何特殊利益」。¹¹⁴日本對滿蒙地位要求在現有制度上一直未能受到保障，反而還有逐漸惡化的傾向。

針對上述情況，部分強硬的關東軍軍官開始策畫更大規模的行動，以「下克上」非法改變現狀。在 1931 年九月十八日自導自演柳條湖的鐵路爆炸並向東北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正式發動以佔領滿州情境為目標的九一八事件，隨後為了鞏固九一八事件的成果，關東軍在 1931 年 9 月 22 日制定《滿蒙問題解決方案》，除了確立將溥儀作為滿州國傀儡政權元首的方針外，也試圖引發另一起軍事行動來轉移西方各國的注意力，在國際聯盟調查團到達中國東北以前搶先讓滿州國的建立成為既成事實。¹¹⁵於是關東軍夥同海軍強硬派在 1932 年 1 月 28 日，蓄意製造日本僧人遭受襲擊的一二八事件，讓戰火延燒至上海，企圖轉移國際注意力，藉機完成對國際聯盟調查團的事前準備工作。

美國在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事件背景

美國國內失業率持續飆升也讓政府承受極大的國內壓力，這也讓美國無力也無意願捲入海外的紛爭，而是優先致力於國內改革以恢復國力，美國在九一八事件剛發生時反應相當消極，雖然美國在日本擴大衝突，開始轟炸東北錦州時態度出現反轉，認為日本的目標不僅僅是平息當地動盪，而是建立一個日本直接控制的區域，並為此對日本駐美大使表達抗議，指責日本違反國際聯盟精

¹¹⁴ 加藤陽子，《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頁 232-233。

¹¹⁵ 読売新聞戰爭責任検証委員會，《検証戰爭責任 II》，頁 19-21；由井正臣，《岩波日本史·第八卷：帝國時期》，頁 140。

神。國務卿史汀生也在 1932 年初日本完全佔領滿州南部時發表聲明不承認日本違反門戶開放政策強佔滿州領土，不會承認中日之間任何傷害美國利益的協約或協定。但是實質上美國直到一二八事件日本開始砲擊上海前都未做出太多實質行動。¹¹⁶

一二八事件中日本以維護秩序為由派遣 1800 名海軍陸戰隊登陸上海並轟炸上海閘北區，與中國政府在上海市區展開激戰，日本的軍事行動對各國衝擊巨大，上海是西方各國在華的核心據點，英國在華有近八成的投資都集中在上海，美國也有 64.9% 在華投資集中在上海。¹¹⁷ 大批外國僑民也都定居於上海的公共租借區，這也讓美國有多達 1600 名公民受到來自日本軍方砲火的威脅，為此美國緊急加派 1300 名海軍陸戰隊進入上海，並警告日本如果違反九國公約，美國將放棄九國公約的規定重建自己在太平洋的海軍力量。¹¹⁸

兩國的強硬派溫和派對比與最終結果

此時日本的溫和派尚有抵抗能力，可以一定程度上反制強硬派的獨斷，但是隨內閣成員遭暗殺、無法命令前線軍隊停止軍事行動等一系列事件，強硬派逐步取得主導權，最終讓日本選擇退出國際聯盟。

日本強硬派包含關東軍、陸軍高層與在一二八事件中提供海上支援的日本強硬派海軍，溫和派則以內閣與外務省官員為主體。在這一連串事件中雖然天皇與身旁皇室官員都曾在不同場合表示希望控制局勢避免危機升級，天皇還曾在一二八事件中私下要求高階將領避免事態擴大。¹¹⁹ 但是在這一事件中卻沒有積極與溫和派互相合作，故在這一事件中不列入溫和與強硬派討論。

強硬派中最為關鍵的核心莫過於關東軍的參謀軍官，其中最為重要的人物就是石原莞爾，從他的論述中也可以發現大川周明與北一輝等亞細亞主義者的

¹¹⁶ 読売新聞戰爭責任檢証委員會，《檢証戰爭責任 II》，頁 19-21。

¹¹⁷ 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New York: H. Fertig, 1968), 200-300.

¹¹⁸ Walter LaFeber, 《創造新日本: 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213-214。

¹¹⁹ 寺崎英成著，陳鵬仁譯，《昭和天皇回憶錄》（臺北市，蘭臺出版社，2021），頁 38。

觀點如何影響日本軍官的意識形態，他本人在 1928 年就開始積極參與陸軍內部的激進組織「木曜會」，其中著名成員包含東條英機、鈴木貞一等人，木曜會主張日本應該在滿州確立完整的政治權力，為了日本的生存必須確保滿蒙地區，石原莞爾本人在此基礎上開始積極主張「世界最終戰爭論」，認為日本必須控制滿蒙地區以準備與美國的最終決戰，並主張這場戰爭是奉行王道的東方與奉行霸道的西方進行的決戰。¹²⁰他在被調任到關東軍擔任參謀前還在聚會中宣稱：「一定會讓諸君看到我把滿州全部拿下」。¹²¹在九一八事件爆發前他所完成的《滿蒙問題之我見》提到滿州的農產品、鐵礦與煤礦對於與美國未來的對抗至關重要，主張應該在俄國國力尚未恢復與美國未提升海軍力量前完成對滿州的完全控制。¹²²與石原莞爾共謀發動九一八事件的板垣征四郎也抱持類似觀點，認為日本要解決經濟大蕭條的困境必須直接控制滿州，主張滿州是解決日本境內貧困的唯一方式，除了可以藉由開發當地解決國內失業問題外，日本嚴重的人口過剩也可以透過移民解決，更關鍵的是確保滿州的天然資源能保障日本工業化迫切需要的原物料完成帝國在經濟的自給自主。¹²³從石原莞爾等人的主張顯示出日本軍官受亞細亞主義的深刻影響，為了反抗西方並建立平等的地位，需要滿洲作為戰略基地，同時也希望藉由發動對外戰爭轉移與解決國內問題。

石原莞爾與板垣征四郎對於滿州的計劃獲得關東軍司令、陸軍省、參謀本部與朝鮮軍司令官的支援，其中朝鮮軍司令就在未獲得中央授權的情況下直接派軍援助關東軍，參謀本部也以抵制關東軍會損害公眾對陸軍信心為由支持關東軍的行動，在東京的陸軍高層雖然明面上遵守政府的命令，下令實行不擴大方針沒有加派援軍，但是也表示若現任內閣阻礙當前的軍事行動就會扳倒他，

¹²⁰ 石原莞爾，1940，〈最終戰爭論〉，青空文庫，
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0230/files/1154_23278.html，2022/11/29。

¹²¹ 読売新聞戰爭責任検証委員會，《検証戰爭責任 II》，頁 11。

¹²² 石井寬治，周見、周亮亮譯，《日本的對外戰略（1853-1937 年）：帝國主義思想的演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頁 211-214。

¹²³ Toland John 著，吳潤璿譯，《帝國落日：大日本帝國的衰亡一九三六-一九四五》（臺北，八旗文化出版，2015），頁 15。

以迂迴的方式為關東軍的計畫提供支援。¹²⁴

艦隊派的海軍菁英也選擇支持關東軍的方針，他們認為英美兩個盎格魯民族國家在華盛頓會議與倫敦會議狼狽為奸，壓制日本對於地位的正當訴求。這也讓艦隊派選擇支持關東軍的計畫，並在一二八事件中組建第三艦隊支援上海。艦隊派也藉機將海軍軍備與中國問題綁定，認為若要征服滿州日本必須仰賴強大的艦隊，也因此海軍的軍備限制將會對對華政策產生阻礙，艦隊派的核心人物同時也參與一二八事件中海軍指揮的末次信正就曾表示：「滿州問題離不開海軍，難道不是由於日本海軍的存在才使日本可以不服從國聯並抵制美國挑釁嗎？」¹²⁵

與強硬派對立的政治勢力以內閣與外務省的官僚為主，內閣在這一時期歷經若槻內閣與犬養兩任內閣，兩位首相都反對將戰爭持續擴大，主張應該就滿州問題進行外交談判，若槻內閣其實在事件發生前就已發現前線出現異常並嘗試阻止，但派出處理此事的將領卻支持關東軍並默許事件爆發，而嘗試與中國政府協商的領事人員則直接遭軍官以武力威脅不准干預軍方行動或發送對關東軍不利的電報。¹²⁶上述情況使政府未能事先阻止這一「下克上」，若槻內閣雖然嘗試控制局面，數次下令限制前線戰事的擴大，但不僅內閣差一點就遭軍方激進派政變推翻，內閣也始終未能阻止前線軍官的自行其事。繼任的犬養內閣雖然同樣未能避免戰線擴大，讓軍事衝突從錦州一路延伸至熱河，但他始終反對滿州國的成立，這也讓他之後染上殺身之禍。

除了內閣與在滿州的第一線外交官外，外務省也積極緩解衝突擴大，駐中公使重光葵在事件爆發初期試圖安撫國民政府，並商議組建日中共同委員會處理危機，可惜最後以失敗告終。外相幣原喜重郎除了公開反對關東軍的軍事行動以外，還在與陸軍大臣確定事情經過後認定這一事件為參謀本部的獨斷，以

¹²⁴ Edward J. Drea, 《日本陸軍興亡史 1853-1945》，頁 242-244。

¹²⁵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7-91.

¹²⁶ 東中志光、森島守人主編，陳鵬仁譯，《鐵蹄底下的亡魂、陰謀、暗殺、軍刀合輯》（臺北，蘭臺出版社，2021），頁 241-251。

敕令命令關東軍歸還奉天城，¹²⁷並積極與美國進行談判協商並一度取得重大成果，但在過程中美國為了牽制日本政府公開日美大使秘密會談的內容，表示日本政府已命令關東軍停止進攻，這一行動卻反而重創若槻內閣在國內的形象，政府屈服於美國這一印象直接拖垮若槻內閣，幣原喜重郎也被迫隨其他內閣閣員辭職並被逐出決策層。¹²⁸此外，外務省另一個弱點則是缺乏對華經驗豐富的外交官，當時負責遠東事務的官員多半僅有派駐歐美的經驗，缺乏對遠東地區的深入瞭解，這也嚴重限制了外務省應對事件的能力，無力限制熟悉遠東地區的陸軍自行其是。¹²⁹

在這一事件中美國各政治勢力基本都不希望與日本爆發進一步衝突，雖然國務院內部在初期存在親日派與親華派的角力，但即使是親華派官員也認為國民政府的民族主義傷害到日本的財產，不支持為中國與日本交戰。¹³⁰這也讓美國政策雖然經歷數次調整，但始終由溫和派掌握，維持溫和消極的對日政策。

美國此時的政治菁英不希望擺出強硬姿態，讓幣原為首的溫和派政治菁英失勢，當得知幣原喜重郎正在正面與陸軍對抗並要求軍方撤退時，國務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就曾表示：「敢去扯陸軍這匹野馬，幣原實在很有膽量，我認為這個消息非常可靠，並會盡最大努力不對日本採取高壓政策，也不使幣原在國內的威望下跌」。¹³¹並且基於美國才剛在 1931 年派遣軍隊干涉尼加拉瓜、海地等國，高層並不太願意批評國家對鄰國的干涉行為，國務卿史汀生曾表示：「中國需要管教，而日本可以擔任這一使命」。胡佛總統也有類似看法，他告訴內閣：「無論是我們對中國的義務還是我們自己的利益，或是我們的命運，都不會要求我們因為中國東北而加入戰爭」。¹³²從中可以看出在事件發生初期，日本以保護本國利益為名對東北的軍事干涉能說服美國的政治菁英，日

¹²⁷ 岡崎久彥著，章澤儀譯，《日本外交史話》（臺北，玉山社，2009），頁 175。

¹²⁸ 五百旗頭真，《日美關係史》，頁 113。

¹²⁹ 東中志光、森島守人主編，《鐵蹄底下的亡魂、陰謀、暗殺、軍刀合輯》，頁 260–263。

¹³⁰ Walter LaFeber，《創造新日本：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208–211。

¹³¹ 岡崎久彥，《日本外交史話》，頁 174–177。

¹³² Walter LaFeber，《創造新日本：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210–211。

本的正當化策略具有一定成效。美國的一部分政治菁英也將日本視為制衡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力量，並對美國具有一定程度的戰略利益，雖然這些觀點隨著戰爭持續擴大與日本溫和派迅速被削弱而有轉變，美國也從 1932 一月調整立場奉行「史汀生原則」不承認日本的修正主義政策，但是美國政治菁英始終拒絕針對日本做出實際的制裁。

日本的溫和派在與國內強硬派的競爭中迅速被削弱，幣原喜重郎的失勢導致外務省難以發揮作用，同時由軍方支持的激進右派血盟團與年輕軍官所犯下一系列的暗殺與軍事政變排除大量重要的政經菁英，政經界溫和派的重要人物如三井財閥總帥團琢磨、財務大臣井上準之助、與堅持反對承認滿州國的犬養毅首相相繼身亡，而取而代之的則是由海軍大將齋藤實與荒木貞夫等強硬派軍人建立的「舉國一致」內閣，這一系列暗殺與繼任的軍人內閣也正式宣告日本政黨政治的終結與溫和派勢力由盛轉衰¹³³，國家開始改由強硬派主導政局。

美國基本一直維持對日的溫和政策，國內各政治勢力都無意與日本正面衝突，雖然政府還是有針對日本的作為做出譴責並表示不會承認任何日本單方的領土變更，並開始與國際聯盟合作制衡日本，但在會議中美國始終堅持以觀察國的身分參與並對經濟制裁相當消極，不願意加入共同制裁的行列，使美國始終未能發揮在國際聯盟內對日本發揮制約能力，讓華盛頓體系大受衝擊。¹³⁴

日本強硬派主掌政局的結果讓新任由軍方掌控的內閣公開發表「焦土演說」，強調：「舉國一致，即使國土化為焦土在貫徹主張（承認滿州國）上也不能退卻一步」。¹³⁵斷絕進一步談判的可能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經過調查後，認定日本在東北的軍事行動並非出於自衛，並建議將東北作為非武裝地帶並由國際共管，日本在會前雖然嘗試阻止國際聯盟通過調查書並以退出作為威脅，但國際聯盟依然在

¹³³ 重光葵著，陳鵬仁譯，《昭和之動亂》，臺北，蘭臺出版社，2021，頁 64-65。

¹³⁴ 劉笑盈，《眺望珍珠港：美日從合作走向戰爭的歷史透視》（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頁 174。

¹³⁵ 讀壳新聞戰爭責任檢証委員會，《檢証戰爭責任 II》，頁 21-22。

1933年2月通過了基於李頓調查書的決議，所有國家只有日本表示反對，日本也在通過決議後隨即宣佈退出國際聯盟。

從這一連串事件中都可以明確看出日本強硬派對於地位的追求，尤其是在退出國聯盟這一決定上尤為明顯，李頓調查書並無國際法拘束力更沒有要求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理性上留在國際聯盟明顯更為合理，但日本還是選擇主動退出將自己孤立於現存國際體制外，這一方面顯示出日本對於現存秩序的不滿外，也反應出日本不分強硬派與溫和派都將李頓調查書視為對日本地位的嚴重傷害。就連主張溫和外交政策，與歐美關係深厚的學者新渡戶稻造都曾向美國人表示：「西方必須承認我們主張的正義性，這涉及我們的榮譽和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¹³⁶主張強硬外交政策並率團退出國聯的松岡洋介也曾表示如果日本不退出聯盟將會招來世界的嘲笑，並以德國的情況類比，強調雙方都在為地位而奮戰。¹³⁷對於地位的追求最終也促使日本選擇退出國際聯盟。

表八：九一八事件到日本退出國際聯盟日美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

	日本	美國
強硬派	關東軍 艦隊派 陸軍高層	
溫和派	內閣 外務省官員	政府 國會
派系實力對比	強硬派勝利	溫和派勝利
理論預期	若兩國政治菁英一方由溫和派主導，另一方由強硬派主導，則由溫和派主導的國家會對另一方的要求 做出妥協	
最終結果	單方妥協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¹³⁶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124–25.

¹³⁷ Steven Ward, 124–25.

1936 年第二次倫敦海軍會議

在這次會議中美國雖然仍然對日本維持溫和的外交態度，但是在涉及海軍這一類影響美國核心利益的安全政策，美國並無意願在條約上作出讓步，而日本海軍條約派失勢後由強硬派主導日本的海軍政策，也讓日本在提出的條件未能滿足後就選擇直接退出會議，拒絕簽署第二次倫敦海軍公約。兩國都由強硬派政治菁英主導的情況下，兩國重啟海軍軍備競賽，再次陷入高強度競爭。

日本在第二次倫敦海軍公約的背景

日本的文官政府與海軍溫和派在爭取到皇室官員的支持下成功在 1930 年壓制了強硬派海軍的強烈反對下的簽署第一次倫敦海軍條約，但是這一條約的效力到 1936 年 12 月 31 日就會終止，因此各國在 1934 年開始對下一次裁軍的相關內容進行討論，日本作為海軍三大國再次成為關鍵角色，但接連的暗殺行動大幅削弱國內文官與政黨菁英的影響力，軍方的強硬派開始更積極的影響日本的外交政策。

除此之外，日本海軍內部勢力平衡的改變也進一步加速海軍方針的轉變，視華盛頓條約為罪惡根源的艦隊派成功在海軍大臣大角岑生發起的「大角人事」中戰勝條約派後，讓原本由條約派掌握的關鍵職位改由艦隊派掌握，大量條約派成員被下放為預備役，艦隊派在大角岑生的協助下大獲全勝，艦隊派也因此能進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張，擴大海軍規模並解決日本不平等地位。

美國在第二次倫敦海軍公約的背景

美國在羅斯福於 1933 年就職時，正處於經濟大蕭條的谷底，也使他必須優先處理國內糟糕的局勢，除了推行著名的「羅斯福新政」外，他也進行一系列外交政策的調整，在 1933 年泛美會議明確表明放棄武力干預為中心的政策並積極推動互惠貿易政策，並在同年放棄對於蘇聯的敵意政策並與其建立外交關

係，在對日政策方面，羅斯福政府維持美國的既定路線，盡可能避免刺激日本引發衝突，但是在 1934 年日本開始顯現出退出海軍限制軍備條約的意圖時，他也開始在條約的規定份額內開始擴增海軍艦艇，提出用八年的時間興建 102 艘軍艦與 1184 架飛機的計畫，希望藉此嚇阻日本，讓日本認知到退出條約的後果。¹³⁸美國雖然無意進行軍備競賽，但是也無意對日本強硬的要求做出讓步。

兩國的強硬派溫和派對比與最終結果

日本此時的海軍政策基本上都已經被強硬派把持，雖然溫和派仍具有一定串聯能力但已經不足以撼動強硬派的主導權。

日本的強硬派依然以艦隊派為骨幹，與 1930 年第一次倫敦會議情況不同，艦隊派佔據絕大多數的重要職位，主導海軍大部分的對外政策。溫和派在海軍內部的只剩下少數殘存的條約派成員與主張英美親善的軍官如山本五十六等人，在海軍外，文官、由前海軍大臣岡田啟介領導的內閣、天皇本人與周圍的皇室官員如西園寺公望、牧野伸顯也都支持日本繼續維持現有政策，簽署新一輪裁軍條約。

主張強硬政策的艦隊派在贏得海軍內部的派系鬥爭後，便開始以廢除條約的方向努力，認為廢除條約不僅能有利於擴大海軍規模外，也能改善日本不平等的地位，艦隊派主張與英美兩國不平等的比例侮辱了日本的榮譽，美英日三國的海軍應該擁有對等的地位。¹³⁹艦隊派堅持日本在新一輪海軍裁軍會議中的相關限制必須與美英兩國一致，不願意接受與英美不同比例的限制，主張無法被接受後就應直接退出協定，並已經成功施壓讓政府在 1934 年 12 月被迫廢除第一次倫敦海軍條約。¹⁴⁰

相對於艦隊派對於現行制度的激進主張，國內溫和派仍然希望避免惡化與

¹³⁸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4.

¹³⁹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127.

¹⁴⁰ 根據條約內容，廢除後該條約仍然具有兩年的拘束力。

英美的關係使日本在國際免於遭受國際進一步孤立，少數主張與英美保持友好的海軍將領山本五十六就曾在廢除條約後私下表示：「10：10：6的比例是合適的，因為條約實際限制的是對方」。¹⁴¹首相岡田啟介也在海軍議題上得到陸軍大臣、外交大臣與財務大臣的支持，認為在大蕭條時期進行軍備競賽將引起難以承受的財務危機，並反對在倫敦會議中提出英美無法接受的條件。¹⁴²陸軍也基於軍費的競爭與不希望增加蘇聯以外的假想敵而支持溫和派，陸軍參謀本部的軍官就曾對西園寺公望的秘書表示希望派條約派的軍官去進行談判，陸軍大臣荒木貞夫也曾表示：「和美國的競爭會變得難以控制，我認為會這終將導致與美國的戰爭」。¹⁴³

皇室官員與天皇本人也都不希望捲入新一輪的軍備競賽並對強硬派海軍主掌海軍表示擔憂，天皇本人曾親自要求海軍大臣大角岑生保證日本不會因此捲入與美國的軍備競賽，並質疑海軍高層是否有能力控制下屬，牧野伸顯也曾表示對海軍高層無法控制局面，放任海軍直接干涉國家政策的不滿。¹⁴⁴

美國國內在海軍政策上基本由強硬派主導政策，美國政治菁英認為面對日本在海軍的修正主義政策應該維持強硬不做任何妥協，不論是美國海軍抑或是羅斯福政府都無意針對日本的要求做出任何讓步，羅斯福根據他擔任過海軍助理部長對日本海軍的瞭解，認為沒有理由做出讓步，讓步只會構成對門戶開放政策與九國公約的進一步侵犯，他在國會表示日本正在亞洲推行一項深遠的帝國主義擴張計劃。海軍諮詢委員會也認為日本正在尋求西太平洋的霸權地位，美國海軍應該要堅決維護在東亞的條約體系，海軍作戰部長威廉·哈里森·斯坦德利（William H Standley）也曾在信中表示：「條約所規定的比例必須不惜代價維持，否則我們在遠東將無能為力」。¹⁴⁵可以看出美國已經開始意識到日本的軍

¹⁴¹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2–3.

¹⁴² Asada, 194–95.

¹⁴³ Asada, 192–95.

¹⁴⁴ Asada, 195–97.

¹⁴⁵ Asada, 200–201.

事威脅並開始做出對應政策，可以看出雖然美國的政治菁英仍堅持戰略撤守，但是當日本威脅美國核心利益時，美國就不會再對日本妥協。

日本國內雖然溫和派看似支持者眾多，但是在最關鍵的海軍內部的溫和派已經失去影響力的前提下，艦隊派依然能肆無忌憚推行自己的主張，岡田啟介曾想通過更換海軍大臣人選的方式削弱艦隊派但最後未能成功，陸軍高層也曾在 1934 年的陸海軍會議上試圖化解分歧但同樣未能影響海軍的決定，而相反的艦隊派卻有相應的力量迫使其他勢力妥協，例如在與文官的會談中艦隊派高層就曾直接以五一五事件威脅文官，若不同意海軍的主張則可能重演針對文官的刺殺事件，末次信正作為聯合艦隊司令在會議中直接恐嚇政府官員他無法控制底層軍官的行動，並表示：「如果無法達到對等要求那海軍將無法控制其軍官」、「對實力對等的讓步會重燃華盛頓條約的覆轍，激怒海軍與公眾輿論，由此產生的不幸會超越五一五事件」。¹⁴⁶在其他溫和派勢力都無法撼動海軍強硬要求的情況下，日本在第二倫敦會議依然堅持要在數量與噸位與英美完全對等。

美國的政治菁英也不願意接受日本開出的條件，羅斯福總統認為讓日本在體制內合法的提升自己的實力反而更危險，羅斯福也曾私下對英國大使表示：「若是日本堅持要求實力對等並通知廢除條約，他將會要求國會撥款五億美元」。其他政府成員也認為基於工業實力與國力的差距，日本無論想怎麼做，美國和英國都可以比他造更多¹⁴⁷，主張美國維持強硬的態度強迫日本妥協。美國海軍則對日本維持一貫的立場，認為需要充足的海軍實力才能維持美國支持的既定政策，美國與日本雙方的強硬態度使談判很快就陷入僵局。日本最終在 1936 年 1 月 15 日選擇直接退出倫敦會議，雙方重新開始在太平洋進行新一輪的軍備競賽。

在日本退出後，英美等國仍然簽署新的《限制海軍軍備條約》，但為了應對來自日本的挑戰英美也額外條約中加上「假如日本與義大利不加入，主力艦

¹⁴⁶ Asada, 196–98.

¹⁴⁷ Asada, 201.

的標準排水量將放寬到 45,000 噸」這一條款。這一事件不僅破壞了華盛頓體系最重要的基底，使各國重回海軍艦艇的軍備競賽，並進一步讓日本在國際社會孤立無援，廢除條約也讓軍隊不再受到任何限制開始大量佔用國家預算。¹⁴⁸日本強硬派海軍雖然滿足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地位平等問題，但是條約的退出卻反而重傷日本的安全保障，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讓英美重啟對東亞軍事基地的建設，讓日本暴露在嚴峻的國防危機中，日本海軍卻對此無能為力，而日本海軍與英美重啟的大規模軍備競賽不僅佔用大量國防預算也開始陷入與陸軍無止盡的軍費爭奪，為了爭奪預算與緩解嚴峻的戰略環境，海軍開始提倡「南進政策」，為後來與美國在南洋的衝突埋下伏筆。

表九：第二次倫敦海軍會議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日本	美國
強硬派	艦隊派	美國海軍 羅斯福政府
溫和派	文官 皇室官員 海軍溫和派 陸軍	
派系實力對比	強硬派獲勝	強硬派獲勝
理論預期	若兩國國內政治菁英皆由強硬派主導，則兩國就會陷入高強度競爭	
最終結果	高度競爭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¹⁴⁸ 重光葵，《昭和之動亂》，頁 72-73。

第四節 走向全面競爭（1937-1941）



觀察這階段的日本與美國，雙方的處境與 1930 年代初期立場似乎調轉過來，1936 年發生的二二六事件中將僅存的日本文官勢力徹底摧毀。「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的再次出現讓內閣成員的陸海軍大臣職務從原先規定由退役的將軍改為現役將領，只要內閣與軍方發生衝突，軍方就可以透過陸軍大臣請辭，迫使內閣重組，換言之，軍方擁有無限制對於內閣的解散權。內閣幾乎失去與軍方正面對抗的能力，軍方在國內政治鬥爭的勝利也讓他們開始全面接管日本政府的內外政策，並挑起與中國的全面戰爭並隨之陷入泥沼。

在經濟方面，日本在過去幾年都利用對外擴張解決經濟問題，並維持多年的高經濟成長率，但隨著美國國內改革生效與經濟回穩，雙方經濟實力差距又再次被迅速拉開。與此同時，日本出口商品不僅與美國在美國本土與海外市場展開激烈競爭，日本的外銷主力紡織品又在此時受英國各殖民地的強烈抵制，包含澳大利亞、印度都開始以高額關稅阻止日本商品進口，日本的海外市場在英美夾擊中大受打擊，激烈的貿易戰讓日本也更有強烈動機破壞現行制度。¹⁴⁹

另一邊美國則終於擺脫了經濟大恐慌的陰霾，在各方面重新調整後與日本展開全面競爭，雖然受國內孤立主義的制約，政策的調整相對緩慢，但隨中日戰爭的延燒，日美雙方的互動也走向全面的對抗，雙方不僅在中國與南洋問題上爭鋒相對，在東亞的軍備競爭也陷入白熱化階段，此時的日本海軍已具備正面對抗美國海軍的實力，但是隨美國重新將太平洋的島嶼軍事化，並依靠強大的工業能力大量造艦，日本海軍的海上優勢被迅速削弱。

但即使兩國的矛盾與對抗強度不斷升高，在主觀意志上，不論是美國或是日本都無意直接以戰爭解決爭端，兩國在一系列的衝突中依然保持密切的聯繫，試圖迴避戰爭的發生，但雙方卻還是在一連串外交互動中走向兵戎相見。

¹⁴⁹ 劉笑盈，《眺望珍珠港：美日從合作走向戰爭的歷史透視》，頁 213-216。

1937 年帕奈號事件

在帕奈號事件中，日美雙方最終都是溫和派在國內取得優勢，日本擔心多重威脅的風險，美國政府雖然試圖調整政策，但受制於國會孤立主義者的壓力只能作罷，兩國政治菁英最後以日本做出賠償道歉收場，成功化解外交危機。

日本在帕奈號事件背景

日本與中國在九一八事件後簽署《塘沽停戰協議》，雙方表面上暫時保持和平，但實際上日本並未停下對於中國北方的侵略，日本關東軍在華北地區開始扶持自治政府作為滿洲國與中國國民政府之間的緩衝地區。中日雙方也因此長時間在華北地區持續性地進行小規模的交火，而導致中日爆發戰爭的盧溝橋事件其實也屬於這一類事件。按照過往經驗雙方應該能在短暫交火後迅速達成停火協議，但是在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在西安事件後停止內戰共組反日戰線的背景下，日本軍方試圖故技重施，採取九一八事件的做法，利用這一機會給國民政府全面軍事打擊並強迫中國承認華北自治政府，當時的首相近衛文麿雖然不願意擴大衝突，但在軍方表示這一事件為蘇聯支持下的中國所發起的挑釁，必須對此強硬回應後妥協，同意陸軍對前線進行增援。¹⁵⁰日本的大軍壓境迅速讓事態升級為全面戰爭，但與日本軍方設想速戰速決的方針的不同，中國政府利用廣闊的地形避免決戰，使日本只能持續加派部隊到中國並讓戰火一路延燒到當時的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而在攻陷南京前的 1937 年 12 月 12 日，日軍戰機在執行任務時不慎在長江流域擊毀美國軍艦帕奈號，帕奈號事件就此爆發。

美國在帕奈號事件背景

雖然美國經濟此時已經逐漸好轉，但是中日戰爭的爆發嚴重打擊美國經濟並在這段時間發生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下滑，羅斯福政府平衡預算與超支的政策也

¹⁵⁰ LaFeber Walter, 《創造新日本: 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226。

讓利率與股價受到嚴重打擊。¹⁵¹國內的經濟危機使美國不僅希望戰爭盡早結束，卻也不願被捲入代價高昂的衝突，同時有鑑於日本與美國密切的貿易往來，美國商界並不希望為了中日戰爭而失去對日貿易出口的巨大利益，反對美國政府為中日戰爭而與日本爆發衝突。

除了經濟的考量以外，美國國會也在 1935 年陸續通過一系列中立法案，對美國與交戰國的貿易做出嚴格限制，法案中禁止美國提供交戰國戰爭原材料以此避免捲入與他國的戰爭中，這也讓美國政府在對中日戰爭時陷入兩難立場，最後美國選擇以拒絕承認兩國為交戰國繞開中立法案的限制，一方面為中國提供大量武器，同時也出口大量石油與原物料到日本賺取利益。¹⁵²

兩國的強硬派溫和派對比與最終結果

在這次事件中可以明顯發現多重威脅的存在直接影響日本國內不同政治勢力對美國的態度，不論是文官、內閣還是軍方都希望盡可能安穩地平息這一事件，避免日本必須在面對與中國的戰爭中在增加與美國衝突的風險。這一擔憂也難得讓幾乎所有日本政治菁英都主張在做出妥協，維持與美國的友好關係。

外務省與內閣本來就不希望爆發戰爭破壞日美關係，也因此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就積極行動避免美國的介入與反感，根據當時的情報部的資料，日本政府要求外務省將：「對美工作作為本事件最重要事項傾盡全力。」並為了降低官方宣傳的印象，公開活動名目上都以親日美國人與日本移民組織。¹⁵³日本政府則在官方場合強調自己無意與美國對抗，並會維持美國在這一區域的重要利益，在事件剛爆發的七月就已向美國表示：「日本大使明確保證將會全力保護美國人及其他國家在受到影響地區的權益」、「日本政府不想擴大事件....並希望及時和平的解決爭端」。¹⁵⁴甚至政府還為此雇用前美國駐華領事去說服美國人「日本正

¹⁵¹ LaFeber Walter, 《創造新日本: 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226。

¹⁵² LaFeber Walter, 《創造新日本: 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236-237。

¹⁵³ 五百旗頭真, 《日美關係史》，頁 92-93。

¹⁵⁴ 美國國務院主編, 張瑋瑛、張友雲、杜繼東譯, 《美國外交檔 (日本 1931-1941 年選譯)》

在為白人的利益與中國民族主義者交戰」。¹⁵⁵可以看出內閣與外務省在無力阻止中日戰爭擴大的情況下，希望盡力避免美國的介入。內閣與外務省在這一事件也維持同樣立場，廣田弘毅外相在事件爆發當天的 13 號就立即前往美國駐日大使館道歉，日本駐美大使齊藤博除了立即與國務卿赫爾道歉外也在美國國內購買廣播時段在全國廣播中直接對這一事件致歉。

軍方也迅速做出反應，海軍省在事件發生的同日就由海軍副大臣山本五十六發表道歉聲明並強調這是一次誤炸事件，軍方會對此負起責任，並由山本本人親自到美國大使館做出說明並當面道歉，日本在中國前線的海軍高層也在事件發生後就立即派遣高階將領去與美國亞洲艦隊的海軍高層說明事件經過並表示遺憾。

美國則在這一事件則明顯存在兩派勢力對峙，分別為主張對日強硬，以羅斯福總統為首的部分內閣成員，與另一派主張對日友好的部分內閣與官僚，和希望維持孤立主義政策的國會。羅斯福在中日戰爭爆發後，帕奈號事件發生前就認為應該經濟制裁日本，他在 1937 年 10 月 5 日就曾發表著名的「隔離演說」，主張國際社會應該「隔離」侵略國，並強調戰爭是一種疾病，不論是正式宣戰或是為宣戰他都會造成國家與人民的危害。¹⁵⁶這也讓他在這一事件發生時就希望能透過強硬的外交手段遏制日本的侵略，羅斯福總統在事件爆發後除了發出強硬的外交照會並要求日本立即道歉外還開始與各部門探討沒收日本在美資產與棉花與石油等資源禁運的可行性。¹⁵⁷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也選擇支持總統的強硬政策，認為應該透過軍事與經濟結合的政策強迫日本讓步，並認為日本沒有能力與勇氣與美國對抗。¹⁵⁸

（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92-99。

¹⁵⁵ LaFeber Walter, 《創造新日本: 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234。

¹⁵⁶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937. "Quarantine Speech (October 5, 1937). Miller Center. in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509132052/http://millercenter.org/president/speeches/detail/3310>. Latest update 22 December 2022.

¹⁵⁷ 劉笑盈，《眺望珍珠港: 美日從合作走向戰爭的歷史透視》，頁 269。

¹⁵⁸ LaFeber Walter, 《創造新日本: 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227。

而反對對日強硬的成員除了官僚與部分內閣成員外，還包含支援孤立主義的國會，駐日大使格魯與國務卿赫爾認為對日強硬不僅可能會進一步削弱本就在日本國內弱勢的西園寺與近衛等溫和派，還可能導致與日本的戰爭，國會則希望維持孤立主義政策，不希望與日本發生戰爭，在事件發生後出於對戰爭的擔憂，國會甚至進一步推動《路德洛修正案》(Ludlow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要求美國除非受到直接侵略，否則必須在國會認為美國遭遇危機，舉辦全國公投得到多數票才能對外發動戰爭。¹⁵⁹

與各政治勢力都主張維持對美溫和的日本相比，美國國內的強硬派則是在受到溫和派強烈反對後才被迫妥協，以羅斯福總統為首的強硬派原本希望是事件爆發能提供強硬外交政策的輿論上支持，但卻與預期不同，美國國內反而要求美國船艦駛離交戰區避免重複事件發生，根據 1938 年 1 月的蓋洛普民意調查，有高達 70% 的美國人希望政府退出中國¹⁶⁰，同時也有近七成的民眾支持貫徹孤立主義政策的拉德格修正案。美國媒體也表現出對日本的好感，主流報紙社論認為帕奈號事件反而讓美國轉向對日友好而非繼續支持中國。¹⁶¹強硬派不僅沒有獲得預期的支持外，還被迫全力阻擋拉德格修正案在國會通過，最終雖然成功以 209 票對 188 票有驚無險的擋下修正法案，但也反應出孤立主義者的強大影響力，正如同羅斯福總統在寫給其他人的私人信件中提到：「自己正在與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戰爭的公眾心理對抗」。¹⁶²最終美國選擇與日本進行外交協商，日本向美國道歉並支付賠償金。

日美之間雖然在這次事件中成功避免了嚴重的外交衝突，但是這一情況並未持久，隨著戰爭的持久化，美國國內的主張積極制裁日本的聲浪也逐漸擴大，羅斯福總統為首的強硬派也開始積極擴編美國海軍並提供中國更多軍事與

¹⁵⁹ LaFeber Walter, 《創造新日本: 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234。

¹⁶⁰ 本橋正, 《太平洋戰爭をめぐる日米外交と戦後の米ソ対立》(東京, 學術出版會, 2006), 頁 27-28。

¹⁶¹ 五百旗頭真, 《日美關係史》，頁 121。

¹⁶² Jr. John McV. Haight, "Roosevelt and the Aftermath of the Quarantine Speech," *The Review of Politics* 24, no. 2 (1962): 235.

經濟的援助，日本也在與中國戰爭的泥淖中陷入原料與能源的不足而被迫更加依賴美國，並開始將心思轉向西方列強們控制具有豐富資源的東南亞。



表十：帕奈號事件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日本	美國
強硬派	無	羅斯福總統 部分內閣
溫和派	文官 海軍	國會 部分內閣
派系實力對比	溫和派獲勝	溫和派獲勝
預期結果	若兩國皆由溫和派政治菁英主導，兩國會和平共存。	
最終結果	和平共存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941 年日軍南進與美國石油禁運

日美兩國在高度競爭中都意識到戰爭爆發的高度風險，雙方國內的政治菁英都陷入嚴重爭執，但是以日本強硬派出兵中南半島與美國發動石油禁運開始，雙方國內的強硬派都在國內與溫和派的激烈競爭中取得勉強的勝利，並讓兩國衝突繼續升級，陷入高度競爭的兩國最終爆發戰爭。

日本在日軍南進與美國石油禁運背景

雖然日本國力在中日戰爭中嚴重耗損，但是卻不願意接受自己在中國戰場投入的沉默成本無法回收，拒絕與國民政府談判，這不僅讓日本必須部署人數超過百萬的部隊在中國戰場，維持龐大部隊的鉅額成本與戰場上的巨大耗損不僅讓日本對美國原物料與工業製品的依賴更嚴重，軍費的節節攀升也讓國內經濟陷入困境，日本軍部再次以國防為藉口在國內推動舉國一致的戰時體制以應付在戰場的巨額開銷，最終在 1938 年通過《國家動員法》完全凍結議會的權限

以集中國家資源，日本也至此進入戰時經濟體制，文官系統也幾乎完全失去與陸軍對抗的所有權力，駐日英國大使評論：「被陸軍剝奪的自由已經永遠失去了」，日本陸軍對於戰爭缺乏實際戰略目標卻又不時追求進一步擴張地位的行為就在牽制溫和派制約的情況下讓戰爭進一步走入無法回頭的境界。¹⁶³

除了經濟體制的調整外，日本為了說服國內民眾必須對為何需要繼續與中國戰爭提出一套完整的論述，這也催生「東亞新秩序」聲明的誕生。1938年11月3日，近衛文麿首相發表「建設東亞新秩序」聲明，說明日本的戰爭目的在於「建設確保東亞永遠安定之新秩序」、「確立日滿中三國主導的國際正義、達成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結合」¹⁶⁴，首相還強調歐美列強應該正確理解該政策並適應地區的新情勢，這一說法後面也在美國對此提出強烈抗議時再次被強調：「日本政府堅信，當此東亞新情勢發展之際，欲將事變之前的形式概念與原則不加更改的套用於現在與未來之形式，絕對無助於眼前問題之解決。」等於正面的否定美國建立的華盛頓條約，否定美國在華簽訂的條約與原則。¹⁶⁵日本明確的向歐美宣告它將建立一套具有排他性的「亞洲版門羅主義」。

伴隨「東亞新秩序宣言」的發表，日本也開始將南進視為擺脫國力衰退與戰爭泥沼的救命解方，軍方開始相信向南擴張不僅能緩解戰略資源不足的困境，也可以切斷西方各國對於中國政府的支援。雖然此時已有文官對政府提出警告，表示美國可能透過禁運制裁日本，但未獲得軍方高層的重視，日本政府最終決定以擴大國力投射的方式來結束戰爭，並在歐戰爆發，西方列強無力干涉海外殖民地的背景下向中南半島進軍。

¹⁶³ Toland John, 《帝國落日：大日本帝國的衰亡一九三六-一九四五》，頁 62。

¹⁶⁴ 近衛文麿, 1937, 〈東亞新秩序の建設〉, 史料日本史,

http://chushingura.biz/p_nihonsi/siryō/1201_1250/1220.htm, 2023/06/12。

¹⁶⁵ 入江昭著, 李響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 頁 80-86。

美國在日軍南進與美國石油禁運背景

中國戰場的不斷擴大嚴重傷害美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並加速惡化與日本的關係，美國民間對於日本的好感度也隨戰爭時間的拉長而逐步惡化，日本雖然在戰爭初期成功利用民間與政府宣傳限制了美國政府的介入，但是隨戰事的長期化與日本政府外交口徑的大幅調整，美國國內輿論在 1938 年已經與戰爭初期呈現完全不同的風向。


首先是戰爭長期化所帶來的影響，隨著越來越多的激烈的戰場前線資訊被媒體報導，美國民間開始對中國感到同情並對日本產生負面印象，以在 1920 年就在美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時代》雜誌從盧溝橋事件後就開始不間斷地每週更新中日戰爭局勢讓美國民眾瞭解戰場的慘烈情況，並多次將中國的相關人物放置於雜誌封面，成功起到在美國國內扭轉中日戰爭印象的作用¹⁶⁶，媒體的持續報導讓美國開始出現聯合抵制日貨的動向，近衛文磨的兒子近衛文隆在 1938 年滯留美國時就曾表示：「人們對於日本情感相當惡劣，無論如何進行宣傳，都很難排除對於侵略者的指責」。¹⁶⁷戰爭的長期化與情報持續被傳遞到美國國內讓民意產生巨大反轉，日本原有的外交論述與宣傳已經難以說服美國國內，在 1938 年時蓋瑞普民調顯示美國國民普遍同情中國並支持實行道德禁運，大眾開始對於美國提供給日本的鋼鐵、工業製品與軍火成為日本侵略用的幫兇感到擔憂，這也影響到美國廠商出貨給日本的意願，美國出口到日本飛機相關零件數量也因此下降，美國國會甚至出現「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開始積極阻止向日本出口原物料與軍火。¹⁶⁸政府也開始積極遊說國內武器製造商不將武器出售到為殺傷平民而使用的地區。¹⁶⁹

¹⁶⁶ 吳昆財，〈1937 年美國《時代》雜誌對中國的報導〉，《嘉大應用歷史學報》2020 年第 5 期（2020 年 12 月）

¹⁶⁷ 読売新聞戦争責任検証委員会，《検証戦争責任 I》（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6），頁 78。

¹⁶⁸ 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第 80-86 頁；劉笑盈，《眺望珍珠港：美日從合作走向戰爭的歷史透視》，頁 272。

¹⁶⁹ 読売新聞戦争責任検証委員会，《検証戦争責任 II》，頁 74-75。



除了戰爭導致對於國內對日本印象的惡化外，日本發表的「東亞新秩序」也直接重創美國與日本合作的互信基礎，日本基於地位與利益提出的「東亞新秩序」在美國政府眼裡是對於門戶開放政策的徹底否認，這不僅促使美國在外交正式轉向，加速東亞的海軍建設並開始援助中國、抵制日本的計畫，並在1939年針對「東亞新秩序」做出一系列大規模政策調整，先是廢止對日本經濟至關重要的《日美通商航海條約》，並廢除限制武器出口到交戰國的「中立法」，逐漸增加對於國民政府的支援加速消耗日本的國力，但隨後日本在1940年進一步發動對中南半島的軍事入侵並與發動歐戰的德國結盟則讓美國更加憤怒並做出強硬回應，先後在1940年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用油與廢鋼鐵，這對石油和廢鋼鐵大部分依賴從美國進口的日本造成致命的打擊。

另外面對德日義三國在1940年組成三國同盟條約與歐戰的爆發，羅斯福總統更公開聲明，美國是各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並通過「武器租借法案」進一步加強對中國和英國的援助，並最終在1941年8月1日宣佈最為致命的制裁，聯合荷蘭與英國對「所有侵略國」實施石油禁運，對於有70%石油都依賴美國進口的日本而言這一制裁無疑是致命性的，也讓日本國內不同政治勢力陷入是否該與美國宣戰的激烈爭辯中，美國對於日本政策的變化也可以看出美國對於日本作為崛起國與對東亞現狀的認知演化的過程。

兩國的強硬派溫和派對比與最終結果

日本面對美國這一強敵，實際上國內也存在嚴重的分歧，皇室、內閣、外交省的官僚與少部分海軍高層都希望避免與美國正面對抗，而大部分陸軍與海軍成員則主張直接對美宣戰並奪取東南亞資源克服美國的禁運。

天皇本來就反對日本與義大利、德國共組三國聯盟，並曾支持反對三國聯盟的海軍大臣米內光政，但是最終仍未能阻止條約的簽署。在開戰前夕他也曾質疑參謀總長杉山元對於三個月能解決戰爭的說詞，他表示：「我記得爆發中日

事變時，你是陸相，那時你以陸相的身分說一個月可以解決事變，但是經過四年之久還不能解決...你說中國內地廣闊，太平洋更廣闊，你有什麼根據說三個月」。¹⁷⁰那為何能計畫三個月結束，海軍軍令部部長永野修身提出的作戰計畫也遭到天皇直接反對並批評這僅僅是絕望的計畫¹⁷¹，並在御前會議表示出反對戰爭的態度，但是這些行動最終都未能對強硬派形成實際阻力。¹⁷²

外務省與內閣都在美國開始進行一系列制裁時，其實曾委任民間與美國展開對話，1941年4月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就曾對國務卿赫爾提出了「日美諒解案」，這個提案以日本承諾回歸門戶開放政策，並將陸軍逐漸撤離中國大陸和放棄德意日三國同盟為條件換取美國對滿洲國的承認與確保日本獲取能源與原物料的安全，但是最終在互信有限未能成功，但是就算在開戰前夕仍有不少外交官員堅持反對開戰，例如駐倫敦的外交官神村慎一在11月21日發電報警告政府與美國開戰將會使英美兩國共同對日開戰，迫使日本面對強大的同盟，主張此時挑起戰爭是愚蠢的行為，應該與美國談判解決中國問題。¹⁷³

海軍中的溫和派則以山本五十六、米內光政與井上成美等人代表，井上成美在陸軍入侵越南就多次向中央表示強烈反對¹⁷⁴，並認為與美國作戰將難以獲勝：「美國幅員遼闊，不可能拿下整個國家或占領首都...另一方面，美國卻可以佔領日本全境和攻佔首都...日本雖然可能不輸給美國，但是卻無法讓美國投降」。¹⁷⁵山本五十六則認為美國巨大的戰爭潛力讓日本或許能在東亞短時間維持局部優勢，但是只要時間拉長日本就會無力抵抗，因此他主張與美國對抗的三國同盟抑或是南進政策都是短視的政策，他對於與美國的戰爭的結果相當悲觀，他曾對日美開戰前夕對西園寺的秘書原田熊雄表示：「對抗美國等於對抗世

¹⁷⁰ 寺崎英成，《昭和天皇回憶錄》，頁59。

¹⁷¹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265–66.

¹⁷² 寺崎英成，《昭和天皇回憶錄》，頁59–61。

¹⁷³ 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頁28–30。

¹⁷⁴ 阿川弘之，《井上成美》（東京，新潮社，1986），頁212–215。

¹⁷⁵ 新名丈夫，《海軍戰爭檢討會議記錄：太平洋戰爭開戦の経緯》（東京，角川，2022），頁192–216。

界，但事已至此我只能竭盡全力，我無疑將死在長門號（旗艦）上，東京將被夷為平地，近衛與其他人會被憤怒的人們撕成碎片，我對此毫不懷疑」。¹⁷⁶他也是少數積極阻止戰爭爆發的海軍高層，先是試圖透過天皇以「聖斷」的方式避免戰爭，之後又想以人事洗牌的方式讓溫和派的海軍軍官擔任要職來阻止戰爭，但是在海軍他始終是少數派，而直到戰爭開打的最後時刻他都仍盼望野村吉三郎可以與國務卿赫爾談判順利，甚至在襲擊珍珠港前夕嚴令作戰的官兵如果談判成功即使飛機已經起飛也得立即停止作戰。¹⁷⁷可以看出溫和派並不認為對美交戰勝利的機會之窗存在，並希望以讓步降低美國對日本的敵意。

支持戰爭的勢力則以陸軍與海軍為主，陸軍情況較為複雜，內部本就存在北進與南進兩種意見互相競爭，1939年諾門坎事件慘敗蘇聯與中國戰場的擴大雖然削弱北進派的影響力。雖然1941年6月爆發的德蘇戰爭讓陸軍鷹派看到與德國兩面夾擊蘇聯的機會，但是陸軍高層與參謀本部始終不願意放棄「南進」戰略的彈性。隨著德蘇戰爭的持久化，德國看起來已無力在短期內擊敗蘇聯，日本陸軍決定繼續觀望北方戰場局勢，優先考慮南進¹⁷⁸，希望透過南進政策切斷國民政府的後援。軍方認為國民政府之所以還能維持與日本的對抗高度仰賴英國提供的軍事援助，若是要贏得中國戰場的勝利就必須南進切斷英國殖民地與國民政府的補給線。¹⁷⁹同時陸軍也認為南進政策可以掠奪東南亞豐富的天然資源以度過美國的制裁，同時陸軍也有意識到美國強大的戰爭潛力，有鑑於美國持續有計畫地擴建軍隊，日本應該趁美國還未做好戰爭準備時把握機會之窗率先動進攻。¹⁸⁰

海軍除了山本五十六等少數高階將領外，大部分都積極支援對美開戰，其中以低階軍官最為狂熱，這也讓這些溫和派高階將領處於弱勢，艦隊派代表海

¹⁷⁶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276.

¹⁷⁷ Asada, 277-78.

¹⁷⁸ Edward J. Drea, 《日本陸軍興亡史 1853-1945》，頁 312-315。

¹⁷⁹ 由井正臣，《岩波日本史·第八卷：帝國時期》，頁 167。

¹⁸⁰ As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267-69.

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認為雖然在總艦艇數量與噸位日本處於劣勢，但是單純計算太平洋的艦艇數量是日本占優，但這一優勢會美國強大工業能力下而逐漸被拉開，他在與天皇的報告中表示：「如果失去石油供應，以目前情況僅有兩年儲備量，如果開戰則一年半會耗盡，不如早日開打」。因此他主張盡速對荷蘭控制的南洋殖民地發起進攻，奪取石油資源。¹⁸¹可以看出與陸軍的主張類似，海軍強硬派也以把握機會之窗為由主張發動戰爭。

但是與陸海軍的說詞相反，根據軍方的內部資料，海軍與陸軍的高層們其實早已認知實際兩國的國力的巨大差距，陸軍曾派遣新莊健吉為首的軍官作為間諜赴美調查並提交新莊報告回報中央日美國力差距過大難以戰勝，井上成美也曾在戰前提出「海軍航空戰備的現狀」的報告書指出日本海軍軍備在當下不足以與美國對抗。¹⁸²但是在石油禁運發生後，這些意見被有意隱藏與無視，強硬派對於實際的戰損與捐建生產比例進行偽造，陸軍內部雖然也曾對是否能荷蘭殖民地快速獲取石油提出質疑，但最終在御前會議卻也偕同海軍做出隱瞞，表示足以供應需求。¹⁸³陸軍與海軍在數字的造假也讓日本其他政治勢力錯誤評估戰爭的可行性。海軍另一個支持南進政策甚至不積極反對與美國戰爭的原因則是來自於與陸軍之間的鬥爭，日本海軍如果支持北進政策就會增加陸軍預算並擠壓到海軍可獲取的預算，因此他們寧可擺出對美強硬態度也希望能取得過內預算案對陸軍的優勢，最終導致更曾雖然認知到與美國的戰爭勝算不高，但是為了爭取經費所以最終維持強硬的態度支持戰爭。

¹⁸¹ 読売新聞戦争責任検証委員会，《検証戦争責任 II》，頁 80。

¹⁸² 新名丈夫，《海軍戦争検討會議記録：太平洋戦争開戦の経緯》，頁 207-216。

¹⁸³ 読売新聞戦争責任検証委員会，《検証戦争責任 II》，頁 82-83。

表十一：新莊報告日美國力比較

主要項目	美國	美日對比
鋼鐵生產量	9500 萬噸	1 比 24
石油生產量	1.1 億桶	1 比無限
煤炭產量	5 億噸	1 比 12
電力	1800 萬千瓦	1 比 45
鋁生產量	85 萬噸	1 比 8
飛機生產架數	12 萬架	1 比 8
汽車生產量數	620 萬量	1 比 50
船舶保有量	1000 萬噸	1 比 15
工廠工人數量	3400 萬人	1 比 5

資料來源：齋藤充功：《昭和史發掘開戰通告はなぜ遅れたか》，新潮社 2004 年版。

美國也與日本情況類似，國內政治菁英對於向日本禁運石油一事態度分歧。支持石油禁運的強硬派主要以國務院的官員與部分內閣成員為主，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與國務院的強硬派認為在經濟與軍事上的施壓就可以迫使日本妥協，所以應該持續加強對日本的制裁直到願意重回華盛頓體系為止。美國國務院的官員也認為日本沒有膽量對美宣戰，他們希望將亞洲局勢拖延至歐戰結束，正如推動禁運石油的強硬派代表斯坦利·亨培克（Stanley K. Hornbeck）所言：「任何一個有理性的日本人都明白，攻擊我們除了給自己的國家帶來災難外，不會得到任何好處」。¹⁸⁴可以看出美國國內強硬派雖然希望以海上禁運讓東亞重回美國滿意的現狀，但是並沒有預期到這一政策會讓日本選擇對美國宣戰。

而總統與海軍的高層則對此持不同意見，海軍高層清楚現有兵力無法阻止

¹⁸⁴ LaFeber Walter，《創造新日本：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頁 303。

日軍南下，認為這會刺激日本提早發動進攻讓美國海軍在未做好充足準備的時候就捲入戰爭，並且認為比起讓海軍重兵駐防夏威夷，應該優先確保西半球的安全。¹⁸⁵羅斯福總統則是在面對納粹德國與日本的多重威脅時選擇先歐後亞，在與國務卿赫爾的討論中，他強調美國在遠東外交政策要避免在太平洋發生公開爭鬥以便集中全力援助英國與加強我們自己，並且在保持對日本的經濟壓力與可信的軍事嚇阻的前提下，保持協商空間，避免逼迫日本軍方推到要求戰爭的地步。¹⁸⁶雖然他支持禁運但是並不同意實施石油的全面禁運，而是希望維持「把繩套套在日本的脖子上讓他時不時斷氣」的絕妙平衡，但國務院在他參加大西洋會議時就實施了全面的禁運，為了避免對日本示弱他只好繼續維持這一政策。¹⁸⁷但是他仍然保持與日本高層談判的管道，羅斯福總統要求負責談判的國務卿赫爾不要讓局勢惡化或中斷，如果有可能不要採取有的敵意的行動，避免觸發危機。¹⁸⁸但是國務卿赫爾卻向野村大使與來棲三郎特使提出的《赫爾備忘錄》，要求日本政府從中國和越南撤出所有軍隊、承認蔣中正政府並退出三國同盟等要求，日方代表將美國的漫天開價解讀為最後通牒，並最終讓談判失敗。從美國溫和派與強硬派的說詞中我們可以發現雙方雖然都同意應該對日本的擴張做出制衡並以經濟制裁迫使日本妥協，但其實都無意在歐陸戰場白熱化的當下對日本發起一場預防性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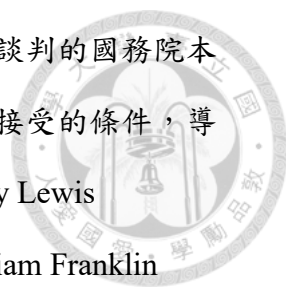
美國最終在戰爭爆發前仍然維持強硬的外交政策，儘管美國國內的強硬派與溫和派都無意與日本爆發全面戰爭，但是卻依然堅持不讓步。總統認為在外交政策上示弱會被日本與中英等友好國家視為綏靖政策，所以不願意在態度上做出讓步。但是直到戰爭爆發前一刻他仍然寄望重啟談判，他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曾對裕仁天皇寄出電報，希望日美可以繼續談判，但這一電報最終遭到軍方

¹⁸⁵ George W. Baer, 《美國海權百年: 1890-1990 年的美國海軍》，頁 170-171。

¹⁸⁶ 劉笑盈, 《眺望珍珠港: 美日從合作走向戰爭的歷史透視》，頁 316。

¹⁸⁷ George W. Baer, 《美國海權百年: 1890-1990 年的美國海軍》，頁 191。

¹⁸⁸ George W. Baer, 《美國海權百年: 1890-1990 年的美國海軍》，頁 197。



扣留一直到攻擊珍珠港的部隊出發後才交到天皇手上。而負責談判的國務院本就認為日本不敢開戰，致使國務卿赫爾最終也提出日本不可能接受的條件，導致談判失敗，赫爾也在談判失敗後告訴戰爭部長史汀森（Henry Lewis Stimson）：「我洗手不幹了，現在這件事落在你和諾斯克（William Franklin Knox）以及陸海軍手上」。對於赫爾無視軍方仍未作好準備就擅自終止談判讓軍方非常憤怒，海軍高層指責赫爾的獨斷專行既是糟糕的戰略又是草率的行政舉措。¹⁸⁹國務院對於軍方要求與日本威脅的忽視也讓美國在戰爭初期付出慘痛代價。

美國在赫爾宣言的外交要求被日本國內強硬派理解為「最後戰爭通牒」，讓國內溫和派頓時失去話語權，日本放棄美國談判並全力備戰，最後發動珍珠港事件。雖然溫和派一直希望阻止戰爭的爆發，但是強硬派在過程中也一直對於談判形成各種阻撓，包含設立最後期限給外務省、超過期限軍隊就會開始自行準備對美戰爭、扣留羅斯福總統在 12/6 寄給裕仁天皇的電報等等，讓本就處於弱勢的溫和派更加艱難。在國力衰退的情況下，強硬派政治菁英認為美國的石油與原物料制裁的前提下，若錯過這一次機會，日美之間的軍事差距只會被繼續拉大，權力轉移將難以逆轉。對美國妥協不僅得要放棄過去數十年在東亞的地位與制度，也將會失去與美國對抗的可能性，最終日本在強硬派的主導下決定在現有軍力仍能在太平洋與美軍對抗的這一「機會之窗」下襲擊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

¹⁸⁹ George W. Baer, 《美國海權百年: 1890-1990 年的美國海軍》，第 200-201 頁。

表十二：日軍南進與美國石油禁運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日本	美國
溫和派	文官 天皇 部分海軍高層	羅斯福總統 海軍
強硬派	海軍 陸軍	國務院
實力對比	強硬派勝利	強硬派勝利
理論預期	若兩國國內政治菁英皆由強硬派主導，則兩國就會陷入高強度競爭	
結果	高度競爭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五節 小結

日本與美國經歷三個時期的關係變遷，從合作逐漸走向全面競爭最終爆發戰爭。其中可以觀察到，日本作為崛起國的地位一直是國內強硬派的核心訴求。在華盛頓會議中，日本得到了東亞海權地位的保證，雖然在 20 年代出現排日法案的糾紛，但是在這一時期日本對於東亞的現狀與地位大體上都是滿意的。觀察這一時期的日本決策者，並沒有明顯以戰略利益的角度觀察美國。以上因素也讓溫和派在這一時期能持續壓制強硬派，並能維持溫和的外交政策。

美國則在 20 年代的政治菁英都有意識到日本對地位的重視，並試圖做出讓步以扶持日本國內的溫和派。雖然未能阻止國內排日法案的通過，但仍然成功安撫日本，讓日本願意配合美國建立的新秩序。可以看出此時的日本對美國是存在戰略利益的，這也讓美國得以創造自己滿意的新國際秩序。溫和派在移民以外的議題上也維持了溫和的政策。

但是到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使日本國力大幅受損並開始對現狀產生不滿。在日本對滿蒙地區與海軍比例的地位申索一直未獲得滿足的情況下，國內強硬派迅速擴大影響力。在排除文官、政黨菁英和海軍條約派等溫和派後，強硬派主導了大部分外交政策，並大幅調整政策走向。

美國則在經濟大蕭條使國力大幅衰退的背景下，一開始試圖維持原有的政策，透過讓步來扶持日本的溫和派。但在這一嘗試失敗後，美國開始採取戰略撤守。除了海軍比例這一會影響美國核心安全利益的議題上不願意做出讓步外，盡可能避免與日本正面對抗，並透過國內經濟改革恢復國力。

在這一時期，一部分官員曾主張日本的崛起可能會對美國產生戰略利益，例如壓制中國的民族主義。但隨著日本的持續擴張，這一觀點也失去了說服力。

在 1930 年後期中日戰爭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意識到與美國的國力差距，並極力避免同時與美國和中國交戰。傳統主張強硬外交政策的軍方甚至願意配合政府對美國讓步，並配合外務省的宣傳策略，希望避免美國對中國戰場進行干預。雖然在初期展現出不錯的成效，但卻隨戰爭的擴大而逐漸失效。在這一時期，地位、對現狀的不滿和機會之窗成為日本國內強硬派的核心訴求。溫和派也將主張權力差距作為核心論述，但與強硬派不同，溫和派主張日美國力差距過大，機會之窗從未存在過。最終，溫和派還是敗給強硬派。

而美國國內雖然主張避免戰爭的孤立主義仍然十分強大，但隨著日本對現有秩序的挑戰從太平洋海軍比例一路升級，甚至開始公開否定門戶開放政策並直接入侵中南半島，美國對現狀的不滿也隨之升級。強硬派開始在國內的競爭中獲得勝利，讓美國的對日外交政策開始逐步調整，並與日本展開全面競爭，但同時面對歐陸德國納粹的壓力也讓美國陷入多重威脅的難題。

對於崛起國日本而言，地位、對於現狀的認知在三個時期都可以被國內的溫和派強硬派觀察到，而對於權力轉移的認知一直到戰爭前夕才被大量討論，

而關於戰略利益的部分則甚少在精英的論述中提到過，同時也可以發現與第三國（中國）的衝突直接影響到日本菁英對美國的態度。

作為既存強權的美國則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因素影響與日本的關係，對於權力轉移與現狀的認知廣泛的受到國內強硬派與溫和派的討論，而溫和派則一直有意識到地位對日本的重要性，並少量提到過日本的外交政策是否構成美國的戰略利益。在歐戰爆發的背景下，美國溫和派政治菁英也意識到日本與德國所造成的多重威脅。

透過本章節的案例可以發現本文所提出的理論框加可以得到驗證，當兩國國內都是溫和派主導政局，兩國就得以和平共存，若有一方由強硬主導而另一方仍然是溫和派主導則會以溫和派主導的國家妥協做收，若雙方都由強硬派主導國內政局，則會進入高強度競爭甚至進而引發戰爭。

第三章 英美關係



本章節將介紹從南北戰爭至英美大和解的英美關係。利用戰略框架，檢視英美兩國政治菁英的戰略互動如何影響兩國的外交政策。本文首先簡要介紹南北戰爭前的英美關係。接下來，根據兩國關係的變化，將這一時期的英美關係分為兩小節進行討論。分別是：**南北戰爭與戰後索賠（1861-1871）**和**英美大和解（1895-1903）**。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基於1871到1895之間兩國並未發生太多重大外交事件，本文僅會在英美大和解（1895-1903）的章節簡單介紹這一時期的英美。

本文將在這兩時期中依序介紹影響日美互動的重要事件，介紹當時時空背景下兩國國內的強硬與溫和派政治菁英，並探討兩國主政政治菁英的組合如何決定雙邊的外交關係。透過英美在19世紀中到20世紀初的互動中，可以發現本文提出的理論框架在解釋崛起國與既有強權的互動模式在這一案例中依然具有高度適用性。

第一節 南北戰爭前英美關係簡介

美國源於英國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雙方在1775年爆發獨立戰爭，美國在法國的協助下最後成功擊敗英國的遠征軍，建立獨立的國家，雙方在短暫的和平後又因為拿破崙席捲歐洲而再次關係惡化，英法在歐洲的大規模對抗讓英美兩國在1812年爆發第二次英美戰爭，戰爭一直持續到1815年才告一段落。

雖然英國在美國建國初期一直扮演主要的安全威脅者，但作為美國的原殖民母國，美國仍然在經濟上高度依賴英國。同時，拿破崙戰爭也讓歐洲列強的國力衰退，大幅削弱他們對中南美洲殖民地的控制，這也為英美在外交政策上提供了合作空間。英國希望減少其他列強對美洲的影響力，而美國則希望排除歐洲國家介入美洲事務。因此，當美國在1823年提出排斥列強再次建立中南美

洲殖民地的「門羅主義」時，英國給予了支持。英國藉此阻止其他列強控制中南美洲的局勢。然而，英國在支援門羅主義的前提下仍在美洲持續擴張。在維持對英屬北美（加拿大）的控制權的同時，在 1833 年占領福克蘭群島，又在 1850 年代與美國爭奪俄勒岡州和中美洲地峽的控制權。

我們可以發現，英美兩國在第二次英美戰爭結束後，雖然不再發生激烈的軍事衝突，但彼此仍然保持著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美國的政治菁英提倡「門羅主義」，要求英國和其他歐洲列強不得在美洲實行進一步的殖民或主權干預，但是這一主張卻必須仰賴在中南美洲持續擴張的英國才得以實現。同時，英國在美洲的擴張政策也使其成為美國最大的威脅來源，政治菁英時時提防英國再次入侵美國本土。而英國一方面在保全自己的美洲利益的前提下擁護美國，雖然排除其他歐陸強權介入中南美洲，但是卻也沒有放緩它在美洲的擴張行動，並成為唯一有能力在美洲制衡美國崛起的強權。

第二節 南北戰爭與戰後索賠（1861-1871）

在英美維持多年和平後，隨著美國國力逐漸提升，英國也開始注意到美國的崛起並在多次戰略摩擦中感受到來自美國的競爭壓力，隨著英國在 1860 年結束在中國爆發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國重新將目光拉回美洲。

美國雖然也不時在美加邊境與英國爆發衝突，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 1859 年在聖胡安群島爆發的豬戰（Pig War）¹⁹⁰，雙方甚至一度瀕臨戰爭邊緣。但是與騰出手可以關注美洲的英國相反，美國此時卻反而因為國內南北意見分歧而陷入巨大危機，經濟與意識形態的差異使南北雙方陷入內戰邊緣。隨著支持廢奴政策的共和黨籍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勝選，美國南方州開始陸續宣告脫離聯邦，並推舉傑佛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為臨時總統，在南北雙

¹⁹⁰ 英美兩國本來就對於聖胡安群島的歸屬存在歧見，事件起因於一名美國農民在島上射殺一隻闖入他莊園的黑豬。而這隻豬是屬於英國哈德遜灣公司職員的財產，在英國政府威脅逮捕農民，農民轉而向美國政府求援後，衝突也隨之升級。英國派遣 2000 名士兵，雙方在島上軍事對峙並一度瀕臨戰爭邊緣，最後在英美高層的協商下事件得以降溫。

方在談判無果後，內戰也隨之爆發並為原本就緊張的英美關係帶來全新挑戰。



1861 年特倫特號郵輪事件

美國在林肯總統當選後，於 1861 年分裂為南北政府互相對抗。同年 7 月 27 日，第一次馬納沙斯戰役爆發，這是南北戰爭初期規模最大的戰役之一，雙方在激戰後由南方軍取得勝利，並讓北軍蒙受巨大的損失。這一次戰役的失利不僅出乎北方政府的意料，並迫使他們擴大徵兵並進行軍事改革，也讓南方政府看到希望並試圖利用這一次勝利爭取歐洲各國的支持。為此，南方政府於同年 11 月派遣兩位外交使者前往英、法兩國。然而，在乘坐英國籍郵輪「特倫特」(RMS Trent) 號前往英國途中，他們遭到美國北方政府的軍艦攔截，並被強行帶到波士頓囚禁。

美國民眾在接連的戰場失利後將逮捕南方政府使者的船長視為英雄。但這一消息傳回英國本土時也掀起軒然大波，英國國內將其視為對英國的挑釁，英國政府也立即以美國違反國際法為由要求美國歸還人質，並表示英國不惜一戰。美國北方政府與英國政府也因此陷入嚴重的外交危機，最終在英國強硬的要求下，美國做出妥協釋放人質。

美國（北方政府）在特倫特號郵輪事件的背景

北方政府與南方政府相比，控制國內的主要工業生產，並擁有更多的人口與領土去支撐戰時經濟。海軍的優勢地位也讓北方政府能在開戰之初就對南方政府的海港進行封鎖，嚴重打擊依賴棉花出口的南方經濟。但是，相對於國力與軍力上的巨大優勢，北方政府卻在戰場上蒙受一系列挫敗，讓南北軍事對抗的局勢陷入長期化。為了削弱南方政府，北方政府極力以各種手段切斷南方政府與歐陸國家的聯繫，並要求歐洲各國不得承認南方政府或干涉內戰。著名的反英派表人物國務卿西瓦德（William Seward）就曾公開發出警告，表示任何承

認南方分裂勢力的國家都會被視為美國的公敵。¹⁹¹南方政府的總統傑佛遜戴維斯也曾在戰後回憶，他的南方政府千方百計爭取（外國）干涉，而林肯政府同樣百般努力，而且更加成功的阻止了干涉。¹⁹²可以看出北方政府此時的外交方針就是盡力避免外力干涉，並削弱南方政府與外國的聯繫。

在這一次事件前，北方政府就曾多次與英國陷入嚴重的外交摩擦，雙方因為北方政府對南方政府貿易封鎖與英國承認南方政府交戰方身分而關係惡化，而這次事件的爆發更進一步將雙方推入戰爭邊緣。

英國在特倫特號郵輪事件的背景

英國在美國內戰中陷入左右為難的局面。除了戰爭發展的高度不確定性外，美國內戰中意識形態與現實主義利益的矛盾也讓英國難以下定決心支持任何一方政府。首先，美國北方政府提倡的廢奴政策符合英國長期政策。英國早在 1807 年就開始禁止奴隸販賣，並在 1833 年基本成功在本土完全廢除奴隸制度。在外交政策上，英國在 19 世紀初的維也納會議中就已開始提倡將奴隸貿易非法化，並對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等奴隸販賣國進行外交施壓。英國海軍在 19 世紀前半段也將打擊非洲奴隸貿易視為重要任務，英國海軍為此還在西非佈署大量軍艦，積極打擊奴隸貿易。這些代價高昂的廢奴政策其實並未受到英國大眾的青睞，反而是仰賴英國政治菁英在意識形態上的堅持得以維持。¹⁹³

基於上述原因，相較於主張維持蓄奴政策的南方政府，美國北方政府的意識形態更受到英國主流政治菁英的認同。然而，部分英國的政治菁英在 1845 年的激烈邊境衝突後，開始將美國視為英國的重要威脅。除了美國快速上升的國力與接連發生的邊境摩擦外，美國對於英國國內的影響力也開始受到政治菁英

¹⁹¹ 王黎、王梓元，〈論析帕麥斯頓時期英美平等關係的確立〉，《史學集刊》2013 年第 03 期（2013），頁 107。

¹⁹² Bradford Perkins 著，楊光梅、周桂銀譯，《共和制帝國的創建(1776-1865)》（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頁 224-225。

¹⁹³ Paul Michael Kennedy，《英國海上主導權的興衰》，頁 179-181。

的警惕。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接收了大量海外移民，英國政治菁英擔憂美國會利用移民在英國挑起對現有制度的不滿。其中，由於愛爾蘭大饑荒而大量移民美國的愛爾蘭裔移民最受到警惕。實際上，北方政府的外交人員也曾公開威脅英國，若英國干預美國內戰，北方政府會鼓動並支持英國境內分離勢力。時任英國首相的亨利·約翰·坦普爾·巴麥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也將愛爾蘭移民視為英美外交的主要障礙，並認為美國涉嫌支持愛爾蘭獨立運動。¹⁹⁴

除了上述因素外，美國南方與北方分別提供英國重要的紡織原料與工業產品，讓英國不願意失去與兩地的經貿往來。在國際情勢方面，拿破崙三世主政的法國對干預美洲局勢躍躍欲試並邀請英國共同干預美國內戰。法國自己也在1861年底以墨西哥拒絕歸還貸款為由直接出兵墨西哥扶持親法政權。然而法國的提議卻受到英國的高度警惕，此時的法國正積極擴大在地中海沿岸的影響力並擴張自身的艦隊規模，這也讓英國國內出現對法國崛起的擔憂。同時，拿破崙三世反覆無常的外交政策也讓英國難以信任他的外交承諾。這也讓唯二有能力干預美國內戰局勢的英法兩國難以在對美政策上有效協調合作。正如美國駐英公使秘書所言，此時的歐洲正處於十分有趣的糾纏狀態。¹⁹⁵

兩國的強硬派溫和派對比與最終結果

北方政府的政治菁英在經過短暫的狂熱後，很快被迫面對該如何處理這一場棘手的外交事件，溫和派的意見快成為主流看法。美國國內對英強硬派當以國務卿西華德為代表，他在多次公開表達對英國的不滿與反感，在英國王儲拜訪美國時，他曾公開對代表團成員表示：「如果他成為下屆政府的一員，侮辱英國將會是他的工作」。¹⁹⁶英國駐美大使也曾對英國政府提出警告：「我不禁擔心

¹⁹⁴ Kori N. Schake, *Safe Passage: The Transition from British to American Hegemon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86–89.

¹⁹⁵ Bradford Perkins, 《共和制帝國的創建(1776-1865)》，頁 224–225。

¹⁹⁶ Charles S. Campbell,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783-1900*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4), 99.

西華德會成為危險的外交家，他對美國和英國之間的關係的看法一直是一個可以利用於政治資本的好材料...他們會努力將公眾的注意轉移到與外國的爭吵上。雖然我不認為西華德會認真考慮與我國開戰，但他很願意玩弄把戲，通過對我國的示威爭取人氣」。¹⁹⁷西華德甚至曾在內戰爆發前向林肯總統提出計畫，由美國主動向英國開戰，藉由製造外部敵人來團結美國內部防止南北分裂，在事件發生當下他熱烈支持對英國船隻的搜捕行動，並在收到英國政府針對特倫特郵輪事件的強硬照會後也毫不掩飾的對當晚對來訪的英國記者宣洩憤怒。¹⁹⁸

但是美國北方政府大部分政治菁英都有意識到在與南方政府苦戰的當下，不能再與國力更加強大的英國發生衝突，政治菁英們雖然在事件發生時與美國群眾一樣熱烈支持船長的行為，但是隨英國的強硬態度，政治菁英立即意識到這一事件可能會使英國宣戰，美國總統林肯就曾表達擔憂：「如果英國對此抗議並要求釋放被囚者，我們必須釋放他們，並為美國的行為道歉」。¹⁹⁹美國駐英公使也在觀察英國國內的反映後發出警告：「目前英國民眾群情激昂，這個消息在傳到大洋彼岸之前，如果美國政府對威爾克斯艦長的行為不做任何解釋，那麼衝突就不可避免。英國政府和民眾會因此相信美國政府是有意讓兩國陷於敵對關係」。²⁰⁰郵政總長蒙哥馬利·布萊爾（Montgomery Blair）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查爾斯·索姆奈（Charles Sumner）在事件發生時就意識到危險，查爾斯·索姆奈更曾直接對林肯總統表示應該釋放南方政府的使節以避免與英國爆發戰爭，他認為戰爭不僅會讓英國政府承認南方政府主權，甚至會促使英國利用海軍封鎖北方政府沿岸港口。²⁰¹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美國政治菁英們意識到自己無力在內戰時挑戰英國這個海上霸權，面對多重威脅的美國即使有能力在陸地上

¹⁹⁷ Lord Newton, *Lord Lyons; A Record of British Diplomac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13), 30–31.

¹⁹⁸ Carl Sandburg, *Abraham Lincoln; the Prairie Years and the War Yea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268–69.

¹⁹⁹ Dean B.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Washington, D.C: Brassey's, 1999), 62.

²⁰⁰ Mahin, *One War at a Time :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²⁰¹ Victor H. Cohen, "Charles Sumner and the Trent Affair,"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22, no. 2 (1956): 205–10.

戰勝加拿大的英國守軍，也會被迫分散兵力兩面作戰，同時英國強大的海軍甚至可以反過來封鎖北方政府並與法國合作直接支援南方政府。正如林肯總統所言：「一次一場戰爭」、「雖然丟臉，但是我們有大仗要打，我們不想同時打兩場」。²⁰²溫和派的政治菁英認為不應該在多重威脅的情況下招惹英國，此時與英國開戰也並非良好的機會之窗。

與美國相比，英國基本上始終由強硬派主導維持強硬的態度，雖然英國國內在此時仍有不少政治菁英主張強硬的對美政策可能造成的風險，包含當時的駐美大使理查·萊昂斯（Richard Lyons）與王夫亞伯特親王（Albert, Prince Consort），前者在南北戰爭爆發前就曾有效的解決加拿大與美國在聖胡安群島的邊境衝突，並曾安排英國皇儲到訪美國緩和雙邊關係。他認為英國應該在戰爭中保持中立並拒絕法國的邀請，若與北方政府發生戰爭，加拿大將會遭受入侵。²⁰³而身為王配的亞伯特親王雖然在事件發生時已身患重症，但是仍主張緩和雙邊關係²⁰⁴，並在本人審核英國政府準備遞交給北方政府的通告時說服首相，修改部分過於強硬的語句。²⁰⁵

但是與主張降低衝突的溫和派相比，強硬派基本上仍主導這一時期的外交政策。其中強硬派以當時的英國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為代表。他本人並不喜歡美國，在第二次英美戰爭期間擔任軍務大臣時，曾在戰爭過程中支持砲擊巴爾的摩與焚燒華盛頓。²⁰⁶他曾表示：「美國人都是惡棍、魯莽、粗野、狡詐、貪婪、膽小根本聽不進別人的合理建議和友好勸說」。²⁰⁷雖然他本人對奴隸制度持反對意見，但這也沒有讓他主張廢奴的北方政府具有好感，相反他更願意支持南方政府，認為南方政府能提供英國製造業一個廣大的市場。²⁰⁸比一

²⁰² Sandburg, *Abraham Lincoln; the Prairie Years and the War Years*, 269.

²⁰³ Lord Newton, *Lord Lyons; A Record of British Diplomacy*, 39–40.

²⁰⁴ Jasper Godwin Ridley, *Lord Palmerston* (New York: Dutton, 1971), 553.

²⁰⁵ Winston S. Churchill 著，劉會梁譯，《英語民族史》（新北市，左岸文化，2004），頁 145。

²⁰⁶ Schake, *Safe Passage*, 91–92.

²⁰⁷ Bradford Perkins, 《共和制帝國的創建(1776-1865)》，頁 228。

²⁰⁸ Ridley, *Lord Palmerston*, 552.

個獨立且日益強大威脅英國的共和國，南北分裂會對於英國更有利，他表示：「如果南北兩國明確分離，同時墨西哥可以成為繁榮的君主制國家，我不知道什麼安排會比這一情況對英國更有利」。²⁰⁹除此之外，作為首相他判斷英國有能力在此時干預美國內戰，可以趁勢發動對美國的預防性戰爭，在 1861 年向英國女王的報告中他曾提出：「大不列顛比以往任何時刻都處於更好的狀態，有能力對美國實行嚴厲的打擊並讓它上一堂不會很快被遺忘的課程」。²¹⁰他的意見也受到當時英國政治菁英的歡迎，強硬派下議院議員約翰·亞瑟·羅巴克（John Arthur Roebuck）就曾表示：「北方永遠不會成為我們的朋友，南方倒是我們結交的對象」。²¹¹根據著名的政治家理查·科布登（Richard Cobden）的說法，當時下議院有高達 75% 的人支持英國「肢解」美國。²¹²

另外是北方政府在 1863 年發表解放奴隸宣言以前正當化策略成效不彰，英國政治精英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支持廢奴，但是在林肯總統宣稱這場戰爭是為了維護聯邦制而非廢奴後讓英國政治菁英產生懷疑，質疑北方政府是否真的有意推動廢奴政策，英國外交大臣約翰·羅素（John Russell）就曾在演講中表示：「南北雙方不是為奴隸制打仗，而是像舊世界藉許多國家曾經做過的那樣進行爭奪，一方是為了帝國，另一方是為了權勢」。²¹³

以上種種因素也讓英國的政治菁英對北方政府態度依舊強硬，這也反應在他們在南北戰爭初期的外交政策上，英國不僅沒有聽從北方政府的要求，很快就承認南方政府的交戰方身分。在面對特倫特號郵輪事件上也表現出極為強硬的態度，要求美國政府放人並做出道歉，首相巴麥尊甚至為此下令增派艦隊前去美國，並調派大量陸軍部隊到美加邊境預防美國拒絕歸還人質使情勢升級為戰爭，他認為美國的國內壓力將會讓英美陷入戰爭：「很難不得出以下結論，即

²⁰⁹ Schake, *Safe Passage*, 86.

²¹⁰ Schake, 91–92.

²¹¹ Bradford Perkins, 《共和制帝國的創建(1776-1865)》，頁 226。

²¹² Schake, *Safe Passage*, 92–93.

²¹³ Bradford Perkins, 《共和制帝國的創建(1776-1865)》，頁 225。



那些幾乎控制著所有北方報紙的流亡愛爾蘭人，會因為他們對英國的強烈憎恨而去影響平民大眾，最終使林肯和西華德無法同意我們的要求。由此我們必須準備迎接可能發生的戰爭」。²¹⁴

這一事件最後以美國釋放羈押的特使而落幕。強硬派的領頭人西華德在諮詢法學專家的意見後，並與駐美大使交談過後，選擇改變立場。在這一次衝突中，美國國內的溫和派成功主導外交政策，選擇做出妥協，以滿足英國所提出的要求。美國政治菁英認識到，美國無力在與南方政府開戰的同時，與海上霸權英國進一步交惡。英國國內強硬派的要求也在美國的讓步下得到了滿足。同時，從這一事例可以觀察到，雖然美國北方政府主張的廢奴政策符合英國政治菁英的意識形態，但在林肯還未發表《解放奴隸宣言》前並不顯著。

表十三：特倫特號郵輪事件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英國	美國
溫和派	阿爾伯特親王 理查·萊昂斯	林肯總統 財政部長蔡斯 查爾斯·薩姆納
強硬派	英國首相亨利·坦普爾	國務卿西華德
實力對比	強硬派勝利	溫和派勝利
理論預期	若兩國政治菁英一方由溫和派主導，另一方由強硬派主導，則由溫和派主導的國家會對另一方的要求 做出妥協	
結果	單方妥協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²¹⁴ Schake, *Safe Passage*, 103.

1871 年阿拉巴馬號仲裁案

在特倫特事件發生後，英美在內戰期間曾經發生數次外交衝突，包括 1862 年英國嘗試調停南北戰爭、1864 年南方政府特務引發的聖奧爾本斯襲擊事件等等。但是其中對英美關係影響最大的當屬 1862 年發生的「阿拉巴馬號事件」。

阿拉巴馬號是英國船廠所建造的新型軍艦，當時英國同時向南北政府雙方出售武器，根據英國法律規定，造船廠雖然可以向雙方出售各類船隻，但是不允許將其武裝化。為了規避法律的相關規定，南方政府藉由離港後自行武裝化這一方式，成功向英國船廠訂購多艘軍艦。它們作為南方政府的商業劫掠船持續襲擾北方的船隻。其中阿拉巴馬號更是立下赫赫戰功，活動範圍不僅限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灣一帶，甚至越過好望角延伸到印度洋，擊毀和俘獲超過 60 艘船隻，並讓北方政府蒙受超過 650 萬美元的損失。直到 1864 年 6 月北方軍才終於在法國瑟堡港一帶將其擊沉。面對英國所販售的軍艦帶來的巨額損失，北方政府除了在戰爭期間向英國提出嚴正抗議外，也在內戰結束後對英國政府提起訴訟並要求賠償。最終，在美國強硬的立場下，英國選擇妥協並支付了高達 1550 萬美金的鉅額賠償。

美國在阿拉巴馬號仲裁案的背景

阿拉巴馬號為首的南方政府劫掠船嚴重影響北方政府的航線安全。在戰爭期間，總計損失超過 200 艘船艦，經濟損失超過 2500 萬美金。這也讓北方政府在得知此事時立即對英國政府提出抗議。駐英大使警告英國這是對於美國內政的嚴重干涉，並宣稱如果英國繼續為南方造艦對美國來說就是戰爭。這一事件也加深民間對於英國的反感，並將這些劫掠船視為英國不懷好意的事證。英國駐美大使曾指出，在事件發生後，美國反英情緒再次劇增，有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渴望與英國開戰。²¹⁵但是，與憤怒的民間形成強烈對比，美國政府並未立即

²¹⁵ Campbell,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110.

對英國大肆追究造艦的責任。成功確定英國政府已扣押南方訂購的另外兩艘軍艦並不會在協助南方造艦後，北方政府就暫時放下這一事件，繼續專注於結束戰爭。1865年4月9日，隨著南方軍司令李將軍的投降，北方政府成功再次統一美國。終結內戰的美國政府也立即要求英國作出賠償。新任美國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也在當選後即表示：「阿拉巴馬號賠償要求是美國與其他國家（英國）存在唯一的嚴峻問題」。²¹⁶

美國在內戰國內結束後出現強烈的擴張主義，政治菁英熱衷於擴大對美國周邊的影響力。1867年美國政府直接向俄羅斯政府購買俄屬北美（阿拉斯加），此外也將聖多明各與夏威夷等地列為併吞目標。在南方，美國選擇直接介入墨西哥局勢，推翻由法國扶持的馬克西米連（Maximilian）政權。在北方的美加邊境，這一風潮與國內強烈的反英情緒相結合，讓美英兩國在加拿大邊境持續衝突。實際上，美加邊境的嚴重衝突早在南北戰爭後期就已顯現，南方政府曾在1864年派遣特務從加拿大南下襲擊美國本土的聖奧爾本斯，並在得逞後迅速逃回加拿大。這一事件差一點讓北方政府的軍隊直接跨越邊境抓捕犯人。²¹⁷美加邊境衝突也在戰爭結束後進一步升溫，部分美國商人與議員提供資金與軍火不僅資助愛爾蘭裔反政府武裝力量芬尼亞兄弟會北上進攻加拿大，同時也扶持當地分離主義勢力試圖創造藉口讓美國可以出兵併吞加拿大。

英國在阿拉巴馬號仲裁案的背景

雖然在阿拉巴馬號事件後，北方州群情激憤，認為這是英國心懷不軌的明證，但實際上英國高層在轉交軍艦之前就已經針對這一交易可能產生的風險進行密切的討論，並最終決定勒令船廠不得轉交軍艦給南方政府。然而在英國政府下達命令之前，兩艘軍艦已提前逃離港口，但除逃逸的軍艦外，南方政府訂

²¹⁶ 滕建群，〈美國歷史上的"亞拉巴馬"號賠償案〉，《軍事歷史》1996年第5期（1996），頁61。

²¹⁷ Robin W. Winks, *The Civil War Years: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302-3.

購的其他船隻都遭到英國政府扣押。由此可見，英國政府其實當時無意再主動挑起爭端。實際上，在 1862 年英國調停未果後，英國的態度就一直維持不干涉的立場，如同巴麥尊首相所言：「我們只能繼續擔任旁觀者，等待戰爭出現更有決定性的轉機」。²¹⁸而這一立場也隨 1864 年歐陸局勢的大幅變動而進一步得到強化。

英國高層在 1864 年 2 月普魯士和奧地利軍隊跨境進入什勒斯維格 (Schleswig) 後開始將重心放回歐洲。普魯士的擴張政策引發了英國政府的嚴重擔憂，英國首相甚至直接對普魯士提出警告並表示：「侵略者將會發現他們與之戰鬥的將不僅僅是丹麥」。²¹⁹為了面對新的歐陸威脅並為可能的歐陸遠征進行準備，英國政府開始將海外部隊調回英國本土。在南北戰爭期間，為保護加拿大所派遣的超過一萬五千名陸軍也成為目標。駐紮在加拿大的陸軍部隊被陸續調回英國本土。同時，為提高加拿大獨自面對美國威脅的能力，英國政府對加拿大政治菁英倡議聯邦制的態度從原本的反對轉為支持。最終，加拿大在 1867 年成功升格為自治領。

由上述變化可以看出對於英國政府而言，在多重威脅的壓力下，美洲事務的優先度正逐漸降低。英國開始採取戰略撤守將重心放回歐洲本土。正如美國駐英官員對英國外交政策轉變的評論所說：「(南北) 戰爭成為一個令人討厭又無足輕重的小事」。²²⁰而這一政策也在美國結束內戰後向英國要求索賠並在邊境騷擾加拿大時受到挑戰。

兩國的強硬派溫和派對比與最終結果

美國國內的政治菁英在此時幾乎一面倒的主張對英國維持強硬的外交政策。在內戰後，美國的政治菁英自覺已經足以在軍事上輕鬆戰勝加拿大的英

²¹⁸ Bradford Perkins, 《共和制帝國的創建(1776-1865)》，頁 234。

²¹⁹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82.

²²⁰ Bradford Perkins, 《共和制帝國的創建(1776-1865)》，頁 235。

軍，對英國開戰的機會之窗已經成熟。新總統格蘭特曾宣稱若是任何一位將軍沒有辦法在 30 天內征服加拿大全境，就應該被不光彩地解職。強硬派的政治菁英也希望藉由併吞加拿大提高美國的地位，主張加拿大是阻礙美國建立新地位的障礙。眾議員外事委員會主席就曾宣稱，一個獨立的加拿大本身就是對門羅主義的暗中侵害。²²¹

然而，其中影響力最大、也最為激進的人物當屬擔任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議員查爾斯·索姆奈。雖然他曾支持美國在特倫特號郵輪事件中對英國妥協，但在內戰結束後多重威脅消失，他對於英國的立場就大幅轉變。他主張若是英國沒有同情南方政府並提供支持，南方政府會更快瓦解。他認為是英國為了棉花利益支持南方政府才讓戰爭延長，並指責英國：「可恥的不人道的背離了他自認信條的反奴隸制準則，英國開啟了戰爭之門，進而煽動毀滅之火。」宣稱英國必須付出高達 20 億美元的賠償或直接割讓加拿大才能補償美國的戰爭損失。²²²他除了多次阻撓英美之間的談判外，也成功讓美國廢除與加拿大在 1854 年簽署的互惠貿易協定，試圖以經濟壓力迫使加拿大併入美國。²²³從他的論點與行動也可以看出，強硬派政治菁英對英國控制加拿大的現狀嚴重不滿。

上述強烈的反英情緒和擴張主義讓美國政治菁英積極支持向北攻佔加拿大的芬尼亞兄弟會。芬尼亞兄弟會主要由愛爾蘭人組成，並主張以武力追求愛爾蘭的獨立自主。在南北戰爭中，芬尼亞兄弟會選擇支持北方政府並踴躍參軍，因此在戰後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同時，美國數量龐大的愛爾蘭裔移民也讓政黨菁英無法忽視他們對選舉的影響力。基於上述理由，美國政府基本默許他們在美國本土募集資金和招募兵力。國務卿西沃德曾表示，芬尼亞組織的成員享有美國憲法給予他們集會和組織的自由，只要芬尼亞分子沒有違反任何法律，美國政府就不會採取任何行動。部分激進的共和黨議員也公開表示支持芬

²²¹ Bradford Perkins, 《共和制帝國的創建(1776-1865)》，頁 330-331。

²²² Kagan Robert 著，袁勝育、郭學堂、葛騰飛譯，《危險的國家：美國從起源到 20 世紀初的世界地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360-361。

²²³ Bradford Perkins, 《共和制帝國的創建(1776-1865)》，頁 330-331。

尼亞兄弟會。共和黨籍的眾議院議長史凱勒·科法斯 (Schuyler Colfax) 也曾發表公開演講支持芬尼亞分子的行動。²²⁴英國派駐華盛頓的特使曾向英國政府發出警告，表示美國部分激進的國會議員正在操作芬尼亞運動的話題。²²⁵英國駐紐約市領事愛德華·阿奇博爾德 (Edward Archibald) 則在給羅素爵士的信中表達對局勢的擔憂：「美國人民的支援會使得芬尼亞組織變得更危險...美國盛行的反英情緒，以及各派宣稱的「我們必須與英國戰爭」的主張會強烈地鼓勵芬尼亞分子，他們希望趁兩國破裂的便利機會，準備實施他們的計畫」。²²⁶

在美國政府的默許下，芬尼亞兄弟會在 1866-1867 年之間陸續發動了多次大規模針對加拿大的入侵行動。之後，他們又在 1869 年與梅蒂人合作，反抗加拿大政府在紅河地區的統治。這次叛亂也同樣受到美國資本家和議員的資金援助，並得到新上任的格蘭特總統和國務卿漢密爾頓·菲什 (Hamilton Fish) 的支持。²²⁷這些政治菁英希望削弱加拿大的國力，並藉機併吞該地區。

相對於美國政治菁英的強硬態度，英國的政治菁英幾乎都不願意與美國爆發衝突。英國這一時期的政治菁英正處於換血期，並開始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張積極對外干涉的巴麥尊首相在 1865 年過世，英國干預普丹戰爭的企圖也遭遇嚴重的挫折。因此，支持減少對外干涉並加強改革的小英格蘭主義

(Little Englander) 開始受到政治菁英的歡迎。在這一時期，政治菁英開始提倡戰略撤守，希望降低海外支出與風險，並專注國內改革。部分歷史學家認為，巴麥尊首相的去世開啟英國的光榮孤立時期，並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在這個時期，自由黨領袖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 (William Ewart Gladstone) 主導這一時期英國的內外政策，他在 1868 年到 1874 年間擔任首

²²⁴ Schuyler Colfax and John O'Neill, *Speeches of Hon. Schuyler Colfax, and General J. O'Neill, (Who Whipped the Queen's Own in Canada.) Delivered at the Great Fenian Pic Nic, Chicago, Aug. 15. 1866, 1866.*

²²⁵ Brian A. Jenkins, *Fenian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Reconstruc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167.

²²⁶ John McLean, "Competing Fenianisms: British, Irish, and American Responses to a Transatlantic Movement,"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Ph.D., United States --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2010), 181.

²²⁷ Bradford Perkins, 《共和制帝國的創建(1776-1865)》，頁 331。

相，進行了軍事與經濟改革，裁減了包括加拿大在內的殖民地部隊規模以改善財政，通過一系列改革最終成功消除了高達 3600 萬英鎊的國債。²²⁸ 在外交政策方面，他主張英國應盡可能避免捲入不必要的海外衝突。這也影響到他對美國的政策。面對由美國扶持的愛爾蘭反抗勢力以及美國的外交壓力，他選擇讓加拿大擴大行政權和軍權，以替代英國軍隊的職責。同時，與班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約翰·羅素等保守黨首相堅持英國在內戰期間的中立政策具有正當性相比，他更願意與美國做出妥協。²²⁹

以保守黨為首的政治菁英雖然不願意對美國做出過多讓步，但他們注意到美國經過內戰後大幅上升的軍事實力和普魯士的崛起。這也讓這些菁英不願在此時挑起與美國的衝突。約翰羅素曾抱怨說：「德國對我們的虛張聲勢和英國獅子的無害咆哮嗤之以鼻」、「我們在國內的兵力嚴重不足，一旦發生戰爭，很可能使我們在愛爾蘭或蘇格蘭蒙受巨大災難。並且由於兵力分散，英國缺乏捍衛自身利益的能力」。班傑明·迪斯雷利也表達對英國必須同時面對美國與德國崛起的擔憂：「權力平衡已經完全被破壞了，而遭受損失最大、對這一巨大變化的影響感受最深的國家就是英國」。並指出美國在大西洋影響力已經能影響英國在歐洲的外交政策。²³⁰ 多重威脅讓原本主張維持對美強硬的保守黨政治菁英陷入兩難局面，並在權衡後願意對美國做出妥協。

除了政黨菁英外，英國海軍也意識到自己承擔過多職責與美國崛起的威脅，英國海軍部部長就曾抱怨：「從溫哥華到普拉特河，從西印度群島至中國，英國政府大臣都要求海軍派遣船過去...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們正在努力去做已經超出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²³¹ 英國海軍在 1869 年考察完美國的軍事能力後向英國政府警告不宜在未建造更多新型軍艦以前與美國交戰。²³² 從上述內

²²⁸ Macdonald and Parent, *Twilight of the Titans*, 84–86.

²²⁹ Macdonald and Parent, 112–14.

²³⁰ Macdonald and Parent, 82–83.

²³¹ Paul Michael Kennedy, 《英國海上主導權的興衰》，頁 194。

²³² Kenneth 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 1815-19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306–7.

容可以看出不論是政治菁英還是海軍，雖然對如何處理阿拉巴馬號爭議上可能存在分歧，但是都不願意與美國的衝突進一步升級，這也讓英國維持戰略撤守方針，面對美國在邊境的持續騷擾中始終維持溫和的態度，避免將局勢升溫。

最終，以芬尼亞兄弟會為首的加拿大分離主義勢力雖然獲得美國政治菁英的支持，並趁英國將主力部隊從加拿大調回本土的時機，對加拿大發動多次侵略行動，但卻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的成果。加拿大政治與軍事的改革成功承擔了英國戰略撤守下的卸責，成功擊退美國強硬派支持的軍事入侵行動。美國政治菁英在製造介入契機失敗與國內經濟持續惡化的背景下，開始調整自己的政策。雖然政府仍然主張英國必須付出巨額賠償，但開始將索賠的重心聚焦在金錢賠償，英國最終也在仲裁中支付高昂的賠償金，並在 1871 年 5 月簽訂《華盛頓條約》結束這一系列衝突。

在這一事件中，英美雙方外交政策的轉變可以明顯看出兩國國內菁英在國際環境的變動下所做出的調整。英國在戰爭中後期受到歐洲普魯士發起的德國統一戰爭的影響，對北美洲的關注度開始下降，在多重威脅與相對國力衰退的背景下，政治菁英支持戰略撤守並傾向更溫和的對美政策。而美國的政治菁英在南北戰爭時為避免開闢第二條戰線，在事件發生當下仍然對英國維持非強硬的外交路線，並未藉機做出過多要求。但當戰爭結束後，美國政治菁英的態度產生巨大反轉，在南方威脅消失、英美在北美相對實力此消彼漲的情況下，政治菁英認為已經足以在陸地上挑戰英國，開始追求地位並試圖改變現狀。最終，兩國政治菁英的政策偏好讓英國選擇讓步，滿足美國提出的要求。

表十四：阿拉巴馬號仲裁案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英國	美國
溫和派	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	
強硬派		查爾斯薩姆達 格蘭特總統 國務卿漢密爾頓·菲什
實力對比	溫和派勝利	強硬派勝利
理論預期	若兩國政治菁英一方由溫和派主導，另一方由強硬派主導，則由溫和派主導的國家會對另一方的要求 做出妥協	
結果	單方妥協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三節 英美大和解（1895-1903）

在解決內戰遺緒和國內擴張主義衝動的消退後，美國重新將注意力轉向西部未開發地區，開始長達 30 多年的大規模西進運動。所需的大量勞力讓美國在此時吸納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海外移民，美國人口總數也在短短 40 年間增加一倍。大量人口西移不僅加速美國西部的開發，也讓在美國西岸出現許多大型都市並形成廣大的市場，美國從 1790 年僅有 6 座 8000 人以上的城市到 1890 年已經成長到 449 座。在經濟發展方面，美國農工業都迎來爆炸性的成長，從 1860 年到 1910 年間，農業勞動力平均收穫面積從 12 英畝成長到 23 英畝，小麥收穫量成長三倍，成為世界最大的小麥生產國，棉花也在這一期間增長四倍，年產量達到 217 萬噸。在工業方面從 1865 到 1900 間美國的工業生產增長 5 倍之多，並在 1890 年正式超過農業的生產值成為美國經濟的主要支柱，工業產值排

名也從 1860 年的世界第四到 1894 年時已經躍升至世界第一，生產值幾乎等同於歐洲總產值一半之多。²³³

與美國國力的大幅增長相反，優先國內發展的結果也讓美國很少關心外交事務，雖然仍然和英國在中南美洲地峽、加拿大海上捕撈權和白令海捕獵海豹上仍存在一些爭執與分歧，但是規模都相當有限，²³⁴直到 1890 年代這一情況開始出現轉機。

英國政治菁英很快就意識到美國飛速成長所帶來的影響，如同英國作家威廉·托馬斯·斯特德（William Thomas Stead）略顯幽默且誇張的描述美國經濟崛起所帶來的影響：「英國人在新英格蘭製造的床單起身，用威廉斯香皂和楊基保險剃刀刮鬍子，再穿北卡雷蘭納短抹的腳上套上波士頓襪子...閱讀由美國機器用美國墨水印製在美國紙上的晨報，也許內容還是紐約市一位聰慧的新聞記者編輯的」。²³⁵英國政治菁英在這一時期雖然持續在海外積極擴張，在非洲與亞洲獲取大量海外殖民地，但是在其他列強的競爭壓力下，實際上相對國力正在衰退，英國不論在經濟與海軍實力都已經無力維持過去的優勢，被迫同時保護遍佈全球的海外殖民地也開始成為帝國沉重的負擔，最終讓政治菁英決心調整政策，這一情況也深深影響英美在這一時期的互動關係。

1895 年委內瑞拉邊界衝突

英國在南美洲的蓋亞那殖民地與委內瑞拉的邊境爭議最早可以追溯到 17 世紀，當時荷蘭、英國和法國在當地進行殖民活動，三國主要以河流為分界控制不同的區域。當英國於 1814 年併吞原屬荷蘭人控制的區域後，從西班牙獨立出來的委內瑞拉就認定它與蓋亞那的邊境應該承繼西班牙與荷蘭以埃塞奎博河作

²³³ 余志森、王春來主編，《崛起和擴張的年代. 1898-192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 16-50。

²³⁴ Winston S. Churchill 著，《英語民族史》，頁 261。

²³⁵ Emily S. Rosenberg and Eric Foner,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 1890-1945*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15.

為分界。但英國不予承認，並在 1840 年單方面派遣人員進行邊境劃定，並在隔年提出「朔姆布林克線」，這一劃界大幅增加英國的實際控制面積，理所當然地遭到委內瑞拉的反對。²³⁶而在這一區域發現的金礦資源也讓雙方領土糾紛更難化解。面對這一情形，英國為了製造既成事實，開始對爭議地區進行移民與金塊開採，並告訴委內瑞拉，若要採取國際仲裁，必須先放棄大部分爭議區域。

面對強大的英國，多次尋求仲裁無果的委內瑞拉決定向美國尋求援助。美國也在 1894 年年末正式以維護門羅主義為由介入這一衝突，最終英國對美國的要求做出讓步，按照美國的要求將邊境糾紛提交仲裁庭處理。

美國在委內瑞拉邊界衝突的背景

美國自南北戰爭結束後將重心轉為國內開發，大量的移民與全國鐵路網的完善進一步加速國內土地開發與工業的發展，這也讓美國成功在 19 世紀末在經濟上超越英國成為工業生產的領頭羊，並開始有強烈的動機尋求更大的海外市場，國力的增長也讓美國開始尋求國際地位的提升。在大西部開發告一段落後，美國的政治菁英在 19 世紀末重新將目光轉向海外與周邊地區的擴張。²³⁷在這一時期美國陸陸續續介入夏威夷與東亞諸國的內政外交，持續擴大自己的海外市場，從著名擴張主義者阿爾伯特·貝弗裡奇（Albert J. Beveridge）的演講中可以觀察到 19 世紀末強烈的擴張主義情緒：「我們是否應該為我們的農民種植

²³⁶ Venezuela, *Venezuela-British Guiana Boundary Arbitration: The Printed Argument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Venezuela before the Tribunal of Arbitration* (New York: Evening Post Job Printing House, 1898), 129.

²³⁷ 這一趨勢也可以從 1890 年代兩本定調美國路線的著作中看出美國如何思考自己在世紀之交的戰略調整，其分別為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海權對於歷史的影響：1660-1783》與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的《美國邊疆論》，馬漢強調海權的重要性並主張美國應該建立能保護自己貿易並能在戰爭時期摧毀敵方貿易並與敵方海軍決戰的艦隊，認為美國應該併吞加勒比海與夏威夷以建立海軍基地，他的學說不僅受到英國與日本等海軍強權的青睞，更受到羅斯福等強硬派議員的熱烈支持，而特納則主張美國的活力與國力增長都來自於開發邊疆的大西部運動，如果美國要持續發展勢必得繼續向海外發展經濟與政治。美國學界這一時期提出的這兩個重要學說不僅反映學者對於國家未來的戰略設想，也為美國的政策轉向提供重要理論基礎。Walter LaFeber 著，劉飛濤、石斌譯，《美國人對機會的尋求(1865-1913)》（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頁 390-394；中西輝政，王敬翔譯，《大英帝國衰亡史》（臺北，廣場出版，2017），頁 158-160。

的、我們的工廠製造的、我們的商人銷售的產品佔領新市場...夏威夷是我們的；波多黎各是我們的；在人民的祈禱下，古巴最終將屬於我們」。²³⁸而這一風潮也對原有的孤立主義外交政策產生衝擊，並驅使美國介入英委劃界爭議。

實際上委內瑞拉在 1876 年後就多次尋求美國的協助希望出面協助仲裁，但美國政府一直到 1890 年代才開始認真關心此地的局勢，而這一變化與委內瑞拉的積極宣傳有關，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在 1893 年美國前駐委內瑞拉公使在委內瑞拉的委託下出版的 *British Aggressions in Venezuela: Or, The Monroe Doctrine on Trial Paperback*，書中強調如果放任英國在委內瑞拉的擴張將會讓門羅主義瓦解，美國應該藉由干預英委衝突來提高美國門羅主義的地位，這一書籍在美國國內廣為流傳，不僅在報紙廣泛刊載更受到強硬派政治精英的熱烈支持²³⁹。而委內瑞拉的宣傳也成功讓美國大幅調整既定政策，改為對英國進行激進的外交施壓，1894 年年底美國總統格羅弗·克里夫蘭（Stephen Grover Cleveland）在國情諮文中重新提出關於英國與委內瑞拉的仲裁要求，並要求國務院提出關於邊界問題的報告，美國國會也在隔年 1895 年 2 月發佈聯合決議聲稱如果英國控制了奧諾科河（Orinoco），那將徹底改變至少南美 1/3 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從而影響美國與該地區的貿易和關係。提案的眾議員在國會為其提案辯解時表示，如果放棄了門羅主義，那也就放棄了國家的威望和聲譽，美國將成為文明世界的笑柄。²⁴⁰而在同年 7 月新任國務卿奧爾尼（Richard Olney）向英國政府發出了一封措辭強硬的照會，根據照會內容，美國不僅要求英國根據門羅主義原則必須接受美國的調停，並且還設下時間限制，要求英國需要在美國總統年底向下一次向國會提交年度諮文前給予答覆。這一封被克里夫蘭總統描述為「二十二英吋口徑大砲」的強硬照會直接明確的將門羅主義作為美國干預他

²³⁸ Albert Jeremiah Beveridge, *The Meaning of the Times, and Other Speeche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 1908), 48.

²³⁹ Robert Kagan, 《危險的國家: 美國從起源到 20 世紀初的世界地位》，頁 483。

²⁴⁰ 趙學功，〈第一次委內瑞拉危機與美英關係〉，《歷史教學》2003 年第 7 期（2003），頁 20-21。

國間邊境衝突的正當性²⁴¹，這也反應出美國希望透過這一事件強迫英國承認美國在中南美洲的主導地位。但是隨英國冷淡地拒絕美國的強硬要求後，美國總統隨即在年底以強硬的公開演說回擊，並在國內掀起了巨大的反英浪潮，強硬派的政治菁英也藉機鼓譟要對英國開戰，駐美大使警告首相，美國總統的戰爭聲明在議會和大眾心裡所產生的影響只能用歇斯底里來形容。²⁴²兩國至此陷入巨大的外交危機。

英國在委內瑞拉邊界衝突的背景

英國此時雖然仍然坐擁世界第一的海軍實力，但是隨各國加速擴建海軍與英國屬地過多導致的軍力分散，實際上已逐漸力不從心，土耳其帝國針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南非與布爾人的衝突等一系列事件都讓英國疲於奔命。在工業生產能力上，英國已經被高速成長的美國超越，兩國差距也正在被持續拉大，著名英國報紙編輯威廉·托馬斯·斯特德（W. T. Stead）就曾悲觀預言：「現在英國僅有兩條選擇與美國聯合或淪為會講英文的比利時地位」。²⁴³除了來自美國的競爭壓力，英國在軍事與經濟上也遭到另一個崛起國德國的迅速逼近，此時英國的情況正如同殖民大臣張伯倫所言：「疲倦不堪的巨人正蹣跚而行，頭上頂著這顆決定它命運過於龐大的寶珠」。²⁴⁴

在委內瑞拉的邊境問題上，雖然美國自 1894 年就以門羅主義為由高調要求介入此事，並在 1895 年遞交了一封極為強硬的照會要求英國服從，但是英國並沒有認真看待，整整隔了四個月才回覆，並拒絕對方的所有要求。英國對美國干涉風險的輕視主要來自於英國政治菁英對門羅主義的適用性以及對美國現狀的判斷。

首先，英國政治菁英認為自己並沒有試圖建立新的殖民地，與委內瑞拉的

²⁴¹ Robert Kagan, 《危險的國家: 美國從起源到 20 世紀初的世界地位》, 頁 483。

²⁴² Campbell,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182.

²⁴³ 《崛起和擴張的年代, 1898-1929》, 頁 90-91。

²⁴⁴ Walter LaFeber, 《美國人對機會的尋求(1865-1913)》, 頁 402。

邊境劃定糾紛也和美國無關。門羅主義並不能視為現行的國際法，因此美國無權以門羅主義介入這一衝突。我們可以從當時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Lord Salisbury）的看法中得到佐證。他認為：「門羅總統所處理的情況，與目前美國所處理的情況幾乎沒有共同之處。英國沒有將任何制度強加給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危機不是一個歐洲大國對美洲任何部分的殖民化問題，也不是一個將任何在歐洲設計的政府系統強加給南美洲社區。它僅僅是在委內瑞拉共和國成立之前很久，確定屬於英國王位的英國屬地的邊界... 國際法是建立在各國普遍同意的基礎上的；任何政治家，無論多麼傑出，任何國家，無論多麼強大，都沒有資格在國際法準則中插入一項以前從未被承認的新原則... 不能僅僅因為其地理位置在美洲，美國就有權來規定解決此爭端的特定方式」。²⁴⁵

另一點則是英國考量美國內政所做出的判斷，美國在 1893 年爆發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政府正為此焦頭爛額，大量銀行與公司受到衝擊而倒閉，失業率也一路飆升至 18%。²⁴⁶ 脆弱的經濟讓美國難以發動大規模對外戰爭。同時美國的軍隊自南北戰爭已長年未參與實際戰事，陸軍大多僅負責鎮壓國內的印地安人反抗，海軍的艦艇數量也相當有限。²⁴⁷ 最後是關於對現任政府外交政策的判斷，現任的民主黨政府在外交上仍奉行孤立主義傳統，以往對於對外干涉興趣缺缺，與主張積極擴張的共和黨相比也對英國更為友善，以上種種都讓英國錯估美國的反應。

在克里夫蘭總統發佈對英國的強硬演說後不久，德國在 1895 年初的一封電報觸及了英國的敏感神經，英國此時正在南非與布爾人對峙，局勢一觸即發，德國皇帝卻在此時發出一則支持布爾人的電報，讓英國國內民眾與政治精英驚覺德國介入的可能性。此前德國與英國就已經因為數次外交衝突而互相猜忌，

²⁴⁵ Lord Salisbury. 1895. "Lord Salisbury to Sir Julian Pauncefo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in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895p1/d529>, Latest update 26 December 2022.

²⁴⁶ Christina Romer, "Spurious Volatility in Historical Unemployment Dat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no. 1 (February 1986): 30–31.

²⁴⁷ J. A. S. Grenville,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4), 54–55.

英國政府在此前也已多次警告柏林：「南非可能是英國最核心的利益，因為擁有它就能保證與印度的連通...它對英國的重要性甚至超過馬爾他或是直布羅陀」。德國人無視警告所發出的這封被後人稱為克魯格電報的震撼彈讓英國的輿論沸騰。²⁴⁸國內輿論一面倒主張應該對德國強力回擊，但在面對美國時，輿論卻提倡政府應該對美國作出綏靖，不應該在此時與美國衝突。

兩國的強硬派溫和派對比與最終結果

美國的政治菁英此時幾乎都支持強硬的外交政策，主要原在於原本支持溫和外交政策的民主黨政府正因為國內政局而受到嚴峻的挑戰。在外交政策上，民主黨在國會受到強硬派議員強烈的壓力，著名共和黨鷹派議員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就曾表示：「如果美國打算眼睜睜看著南美洲落入英國和其他歐洲大國的手中，讓自己被英國與歐洲海軍基地所包圍那當然就沒什麼好說，但美國人民並沒有準備好放棄門羅主義或放棄他們在西半球的正當霸權。相反，他們現在已經準備好為維護兩者而戰，就像當時他們將法國人趕出墨西哥」。²⁴⁹「門羅主義的至高無上地位應該立即確立，如果可以就以和平方式，如果必須就以強制方式」。²⁵⁰可以看出強硬派對歐洲國家控制中南美洲的現狀感到不滿，要求美國在外交政策上做出調整，提升國家安全與地位。民主黨政府在 1893 年拒絕兼併夏威夷與在 1895 年對英國強佔尼加拉瓜科林托港的消極態度就因此受到國內強硬派的嚴厲批評。與此同時，國內在 1893 年面臨的嚴峻經濟衰退與工人的罷工抗議進一步加劇政府的執政壓力。

以上種種也直接反應在民主黨的國內選舉結果，民主黨在 1895 年參眾議院的席次大幅減少，僅在眾議院他們就失去了 125 席，僅剩下 93 席，並被擁有

²⁴⁸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 Boston: Allen & Unwin, 1980), 220–21.

²⁴⁹ Henry Cabot Lodge, *England, Venezuela, and the Monroe Doctrine*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895), 9.

²⁵⁰ Edward Weisband, *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Paradigm of Lockian Liberalism*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3), 29.

254 席的共和黨完全壓制，面對這一頹勢，民主黨開始將目光轉向在 1890 年代逐漸被美國民眾與強硬派議員關注的委內瑞拉衝突，民主黨試圖以這一事件轉移國內危機，民主黨議員菲茨休·李（Fitzhugh Lee）就建議政府應該藉由對外戰爭轉移國內民眾的不滿。²⁵¹而另一位民主黨議員湯瑪斯-巴斯卡（Thomas M. Paschal）則表達得更為直接：「把這個委內瑞拉問題搞得滿城風雨，上下左右、東西南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就是一個勝者」。²⁵²

以上原因讓克里夫蘭總統與新任國務卿奧爾尼決定對英國做出強硬的表態，國務卿奧爾尼就在照會中強調：「如今美國已經是這片大陸的最高主宰，他的命令就是大陸臣民的法律。」克里夫蘭總統則強調：「美國有責任以其權力範圍內的一切手段抵制英國侵佔任何土地或對任何領土行使政府管轄權的行為」。²⁵³並在國情諮文中暗示不惜為此對英國發動戰爭，隨後將美國海軍超過 2/3 的艦艇集中在加勒比海，讓局勢進一步加劇，而這一系列外交政策也贏得國內強硬派的熱烈支持，狄奧多·羅斯福曾表示：「我真希望我國人民的情緒不會有任何消退，我不在乎我們沿海城市是否會被轟炸，我們要將把加拿大拿下」。²⁵⁴

面對美國的步步進逼與德國的威脅，大部分英國的政治菁英都認為應該對美國妥協以全力對付德國，但此時的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卻有不同的看法，索爾茲伯里本來就沒有對美國抱持太多好感，在南北戰爭期間也更偏向於支持南方，並曾在書信中表達過對英國未能把握機會之窗，在南北戰爭期間發動預防性戰爭而感到惋惜：「說來難過，但美國勢將繼續前進，沒有什麼能夠恢復我們之間的平等，如果我們在美國內戰時支持南方邦聯，那麼我們就有可能將美國的力量降低到可控的比例。但是在一個國家崛起的歷程中，並沒有給過兩次這種機會」。²⁵⁵

²⁵¹ Donald E. Thompson, "The Partisan Politics That Led to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Master of Arts, Morgantown, Eberly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2008), 20–22.

²⁵² Thompson, 26–27.

²⁵³ Walter LaFeber, 《美國人對機會的尋求(1865-1913)》，頁 402。

²⁵⁴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51.

²⁵⁵ Margaret MacMillan,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The Road to 1914* (New York: Random House

雖然他認為美國的國力上升與敵意可能會在未來與英國爆發戰爭：「不是在今年，但是在不遠的將來，與美國爆發一場戰爭，已經不僅是一種可能性」。²⁵⁶他認為美國與德國現階段都缺乏與英國交戰的能力，美國現在僅僅是在虛張聲勢，他雖然無意與美國爆發衝突，但是也不願做出過度讓步，在答覆維多利亞女王的電報中，他表示如果英國保持平靜，美國國內情緒會穩定，他也不認為克里夫蘭總統的國情咨文代表他打算發動戰爭。²⁵⁷在門羅主義的適用性與國際仲裁方面，他雖然願意與美國開會進行討論，在一定程度上承認門羅主義的國際法地位，但是仍堅持門羅主義在委內瑞拉劃界上不具有任何適用性。²⁵⁸同時為了應對美國的軍事調動，他也下令將其他地區的軍艦前往中南美洲待命。

但是其他內閣成員與政治菁英對於多重威脅與美國作為崛起國的認知卻沒有首相這麼樂觀，殖民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在公開演講中表示：「我們不貪圖美洲的一英寸領土。兩國（英國和美國）之間發生戰爭不僅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而且是一種罪過」。他認為英美如果發生戰爭那等同「兄弟之間相互仇殺」，自由黨領袖哈科特（Sir William Harcourt）與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前英國首相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都持反對意見，下議院有354名議員在同意與美國進行仲裁的文件上簽名，還有1300名英國作家與公眾人物呼籲政府和平解決爭端。²⁵⁹英國政治菁英的擔憂也被美國駐英大使托馬斯·弗朗西斯·貝亞德（Thomas Francis Bayard）注意到：「英國目前正全力忙於應付世界上的其他地區，而合眾國是英國政府和人民最不願與之發生爭執的國家，關於這一點，我與他們的交往中每天都可得到新的證據，其他歐洲國家正像拳擊場上的對手那樣相互虎視眈眈」。他也在給國務卿奧尼爾的書信中說：「英國與美國和與德國衝突的可能性，有著一個令人高興、顯而易見的差別」。²⁶⁰

Trade Paperbacks, 2014), 38.


²⁵⁶ Kenneth 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 1815-1908*, 339.

²⁵⁷ 章騫，《不列顛太陽下的美國海權之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頁223。

²⁵⁸ J. A. S. Grenville,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64-69.

²⁵⁹ Campbell,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182-83.

²⁶⁰ Samuel Flagg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amuel Flagg Bemis* (New York: Henry Holt, 1936), 418-421.



最終雙方以美國政治菁英堅持強硬外交政策，而英國政治菁英主動做出妥協告終。英國高層意識到儘管他們對於自己的海軍實力具有高度的自信，但是並無把握能同時處理兩個崛起國的挑戰，同時期土耳其還爆發嚴重針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事件，面對多重威脅，英國政治菁英認為必須做出戰略緊縮，並在美國與德國之間中作出選擇，這也讓英國的政治菁英們在 1896 年年初的內閣會議中對首相施壓，最終首相被迫在不滿中妥協。英國政府迅速調整方針並在 1896 年 1 月做出讓步並接受了美國的要求，將整片爭議地區全部移送仲裁，以仲裁的形式處理委內瑞拉衝突，最終在 1899 年的仲裁判決中，委內瑞拉雖然成功取得具有重大軍事戰略價值的奧里諾科流域，但是委內瑞拉只獲得爭議領土的 1/10，其他地方皆分配給英國。

雖然單從仲裁結果而言，英國成功確保大部分的利益，但英國在這一衝突中被迫承認門羅主義的國際法效力，美國可以合法干預中南美洲局勢，這也彰顯英國放棄與美國在中南美洲進行排他性競爭，接受美國在美洲的特權地位。

美國在英國接受仲裁後也並未再提出進一步要求，英美戰爭風險的增加使外資大量撤離，進一步重傷原本就低迷的國內經濟，對於英國的戰爭狂熱也未能如強硬派所期望的延燒。民主黨對委內瑞拉的介入雖然贏得強硬派政治菁英的支持，但是依然無法阻止民主黨在總統選舉敗給共和黨，而勝選的共和黨也很快就將目光轉向西班牙控制的古巴。美國在這次衝突中雖然未獲得實際物質利益，但是成功讓門羅主義為英國承認，並大幅提高美國在中南美洲的地位。

從這一次委內瑞拉危機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國高層截然不同的態度所產生的影響，美國政治菁英在國力大幅提升並開始對外投射國力的背景下，開始對現狀不滿，認為自己的國力已經足以在美洲挑戰英國，要求政府調整既有的孤立主義路線，這也讓美國對英國採取相當強硬的外交政策，而與此同時，在多重威脅的國際環境下，英國政治菁英意識到戰略撤守的必要性，並在美德之間做出抉擇，決定優先對美國做出妥協，這也成為兩國外交互動的轉捩點。

表十五：委內瑞拉邊界衝突中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英國	美國
溫和派	殖民大臣張伯倫 自由黨領袖哈科特 前首相威廉·格萊斯頓	
強硬派	首相索爾茲伯里	克里夫蘭總統 國務卿奧尼爾
實力對比	溫和派勝利	強硬派勝利
理論預期	若兩國政治菁英一方由溫和派主導，另一方由強硬派主導，則由溫和派主導的國家會對另一方的要求 做出妥協	
結果	單方妥協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898 年美西戰爭

美西戰爭被視為美國正式成為美洲區域霸權與結束孤立主義的重要事件，但這場戰爭的走向與歐洲局勢的變化密不可分。德國試圖從這一次戰爭中分一杯羹，其他歐洲國家也對美國的崛起感到擔憂並意圖干涉。然而，此時的英國政治精英卻選擇幫助美國，不僅阻止歐洲列強干涉美西戰爭，還動用海軍在太平洋支援美軍對抗德國海軍的襲擾，摧毀德國意圖藉機奪取菲律賓的野心。這一事件也成為英美關係轉向的重要指標，美國的政治菁英對英國的印象就此產生巨大反轉，並開啟兩國長期的友好關係。

美國在美西戰爭的背景

古巴地處加勒比海同時僅距離佛羅里達州約 90 英里，並從西元十六世紀開



始就由西班牙控制。古巴的重要戰略地位很早就被美國政治菁英所注意，美國建國元勳湯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早在 1809 年就有意併吞古巴，並曾表示：「這個島會帶給我們對墨西哥灣與它周圍國家和地峽的控制權，如果讓他成為美國的一部分將可以最大幅提高美國的利益。」歷任總統都有提出對古巴的論述，其中以美國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論述最為出名，他曾表示：「如果一個蘋果被暴風雨從它的原生樹上割下來，就只能落在地上，那麼，古巴被迫脫離了它與西班牙不自然的聯繫，沒有能力自立，就只能向美國靠攏，而根據同樣的自然法則，美國不能把她從它的懷抱中趕走」。²⁶¹除了政治菁英的公開表態外，實際上美國政府也長期以不同策略試圖獲取對古巴的實質控制權。美國先是在 1848 年嘗試軍事佔領古巴，但是遭到其他歐洲大國的強力反對而失敗。隨後調整策略，改由嘗試從西班牙手上直接收購古巴，但是最終多次嘗試都未能成功。由上述內容可以看出，美國有強烈的意圖控制古巴，並一直嘗試以各種手段完成這一目標。到了 19 世紀末，美國國力大幅提升，擴張主義的興起，古巴也再次成為美國的首要目標。

與美國介入英委邊境衝突幾乎同一時間，古巴在 1895 年 2 月對西班牙發起第二次獨立戰爭後，西班牙派出軍隊強力鎮壓。這不僅影響了美國在古巴的商業投資，古巴人民的遭遇也受到來自美國國內廣泛的同情。起初民主黨執政的克利夫蘭政府對於古巴情況維持不干涉主義的原則，無意介入這一衝突。但是，在國會共和黨和擴張主義者的強力要求下，政府必須在古巴議題上維持強硬的態度和政策。在強大壓力下，美國政府向西班牙發出照會，要求對古巴實行改革，並表示美國可以出面斡旋。

這一要求並未為西班牙所接受。雖然西班牙承諾在鎮壓古巴獨立勢力後實行改革，但卻不願意接受美國的斡旋。隨著戰爭的擴大，古巴當地不僅死傷慘重，也大幅衝擊美國投資者的經濟利益。美國國內對於進一步干預西班牙血腥

²⁶¹ Albert J. Beveridge, "Cuba and Congress,"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2, no. 533 (1901): 535–37.

鎮壓的意見也逐漸升溫。這時，新任共和黨籍美國總統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公開譴責西班牙的作為是對於古巴滅絕而非文明的戰爭。他主張承認古巴叛亂勢力的獨立地位，並讓雙方互相妥協來結束戰爭。這一提案最後也獲得國會同意，美國民間也開始積極援助古巴，甚至有大量美國國民自願前往古巴支援革命軍。國內輿論普遍支持美國應該干涉古巴的局勢發展。美國在1897年6月又進一步對西班牙發出照會，認為西班牙的政策侵犯美國在古巴的利益。如果西班牙未能及時鎮壓叛亂，美國就會直接進行干涉。西班牙雖然做出妥協同意古巴自治，但未能解決事態持續升級。

1898年，美國派遣援助僑民的緬因號軍艦在古巴爆炸，則讓國內輿論徹底導向開戰。羅斯福就曾表示：「當緬因號在哈瓦那爆炸的那個時刻，戰爭已經變得不可避免了」。²⁶²大量美國人志願參與戰爭，除了在野的民主黨國會議員，也有近一百名共和黨議員支持對西班牙開戰。²⁶³共和黨眾議員大衛-G-科爾森（David G. Colson）就警告他的同事：「如果我們不終止這場（在古巴）的邪惡戰爭，我希望看到下一屆眾議院有許多我們今天在這裡看不到的面孔」。民主黨眾議員亞伯特 S.貝裡（Albert S. Berry）也表示，如果共和黨不能解放古巴，他們將受到選民的懲罰：「我認為共和黨人正在逃跑...牆上的字跡表明，在下次選舉中，他們將發現自己在這個國家屬於少數派」。在國內激進的輿論壓力下，即使西班牙願意做出大幅讓步，美國政府依然斷然拒絕並對西班牙宣戰。

英國在美西戰爭的背景

英美關係在委內瑞拉危機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當美國代表團在1897年高調參加了維多利亞女王的鑽禧活動並接受了英國贈送的五月花號成員名冊。五月花號是當年第一批從英國到美洲建立殖民地的船隻，這次贈送也象

²⁶² 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212.

²⁶³ Schake, *Safe Passage*, 189.

徵著英美關係在歷史上的聯繫，並進一步提高了雙方關係的水準。²⁶⁴

但實際上英國在國際環境的情況並未獲得好轉，德國帶來的戰略競爭壓力正在持續增強，在這一時期，德國不僅持續提升自己的海軍實力，還開始積極加入爭奪海外殖民地的行列，正如同德國格奧爾格·亞歷山大·馮·穆勒（Georg Alexander von Müller）海軍上將在 1896 年的備忘錄所提到的，德國輿論決心打破「英國的世界統治」，以便為需要擴張的中歐國家提供必要的殖民地。²⁶⁵德國先是在 1895 年甲午戰爭後拉攏法國與俄國要求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並在 1897 年年底以德國聖言會傳教士遭殺害為由出兵占領膠州灣，大幅提升德國在東亞的影響力。隨著美國與西班牙關係惡化，德國也開始對介入兩國衝突展現出高度興趣，並希望藉此獲得更多海外殖民地。²⁶⁶從德國外交部長在 1898 年 7 月 1 日寫給德國駐華盛頓大使的信中就可以得到佐證：「皇帝陛下認為德國的主要政策目標是不要放過任何可能從美西戰爭中產生的機會，以便在東亞獲得德國海軍的支點」。²⁶⁷

德國積極擴張的野心引發英國的高度警戒，雖然英國也希望藉由與德國的結盟制衡法國與俄羅斯，但是自從克魯格電報事件發生後，英國開始提高對德國的警戒，並開始尋找其他可能的盟友來彌補光榮孤立所帶來的孤立無援。這也讓美國成為英國考慮的選項，英國認為雙方在東亞政策上利益一致，並在讓中國保持門戶開放上看法一致，提高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也可以遏制德國與俄國的崛起。²⁶⁸

²⁶⁴ Schake, 196.

²⁶⁵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221.

²⁶⁶ Kennedy, 236-37; J. A. S. Grenville,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201.

²⁶⁷ Samuel Flagg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amuel Flagg Bemis*, 465.

²⁶⁸ Samuel Flagg Bemis, 466.

兩國的強硬派溫和派對比與最終結果

美國在宣佈對西班牙宣戰後，在國際輿論上受到史無前例大規模的指責，在歐陸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同情西班牙，認為美國在道義上站不住腳，這對於美國而言，這不僅是建國以來少有的體驗，也讓美國面臨遭全體歐洲國家制裁與譴責的風險。此時歐洲主要國家中，只有英國對美國釋出大量善意，正如美國駐英大使所言：「幾乎所有倫敦有影響的雜誌今早都刊登了美西關係的報導，他們中的大多數都站在我們這邊」²⁶⁹、「我不知道你是否特別重視這個國家（英國）的友誼和同情，我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它是重要且可取得，因為它是唯一一個沒有公開反對我們的歐洲國家...當所有的王室相關人員都攔著我，與我握手並說些客氣話時，西班牙大使在我後面只有被鞠躬歡迎而已」。²⁷⁰

開戰初期，美國立即對駐紮菲律賓的西班牙艦隊發動襲擊，並以極低的損失在馬尼拉灣擊敗西班牙艦隊，但在同一時間，德國也已保護僑民與經濟利益為由派遣軍艦抵達菲律賓，試圖藉機在美國登陸前搶先奪取菲律賓的實際控制權，德國海軍不僅違反美軍的封鎖要求，為擱淺的西班牙軍艦提供補給，並意圖阻止美軍對馬尼拉的進攻，德國當時在菲律賓的海軍規模與美國相當並在噸位上略大於美國，同時乘載超過 1400 名士兵，眼看美國無力對抗德國並陷入危機時，英國海軍卻在此時選擇介入，為美軍提供支援。

英國在美國攻打菲律賓的過程中雖然表面維持中立，但實際上早已提供各種幫助，包含租借登陸艇、提供海底電纜供美軍聯絡華盛頓、允許美軍在菲律賓向英國海軍購買燃料與船隻等等。當德國阻撓美國的軍事行動時，英國的艦隊指揮官直接將艦隊部署到美國與德國艦隊中間，確保德國在不敢對英國實施戰爭行為的前提下無法對美軍開火，英國的艦隊指揮官甚至對德軍宣稱他奉命支援美國。在英國的介入下，德國的野心最終被破壞，美國成功奪取菲律賓，

²⁶⁹ Louis Martin Sears, "John Hay in London, 1897-1898," *Ohio History Journal* 65 (1956): 356-75.

²⁷⁰ William Roscoe Thayer,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5), 165-66.

英軍的行動也成為扭轉美國政治菁英觀點的轉折點，如同《紐約時報》的社論：「我們正在為英國在古巴打仗，就像英國正在為我們在東方打仗一樣」。²⁷¹

英國政治菁英在美西戰爭中，幾乎全員都主張對美國採取友善的外交政策，英國作為既存強權面對復數崛起國的多重威脅，包含俄羅斯與德國在東亞的擴張、法國在非洲引發的法紹達事件都對英國造成不小的負擔。面對這些挑戰者，即使英國海軍的預算不停上升，但卻已經無力在所有區域維持海軍優勢地位。同時英國的經濟增長率也一直低於其他崛起國，進一步讓政治菁英擔心英國的工業能力還能否在外國競爭壓力下維持競爭力。

隨著軍事與經濟的相對衰退，英國政治菁英感到極度焦慮，除了持續執行戰略撤守和進行內部改革，他們也主張更加謹慎地考慮對外干預的風險和成本。正如前首相羅斯伯里（The Earl of Rosebery）所言：「如果我們沒有嚴格限制干涉原則，我們應該總是同時進行四十幾場戰爭」。²⁷²降低高成本低回報的干涉成為英國政治菁英們的共識，並影響到英國對美西戰爭的態度。

西班牙在衝突升溫時，曾尋求歐洲各國的協助，而德國、奧匈、法國、俄國與義大利等幾乎所有主要的歐洲國家都選擇支持西班牙，甚至教宗也想介入此事防止戰爭爆發，呼籲讓美西雙方和平達成協議。但即使成員眾多，實際能真正影響美國的只有海上強權英國，英國在明面上也有充分理由支持西班牙，英國王室與西班牙攝政女王的姻親關係也讓維多利亞女王向政府表示希望英國支持西班牙，另外若是美國控制古巴、菲律賓等西班牙殖民地，可能構成對英國航運安全的潛在威脅。

但是英國的政治菁英們並不希望破壞捲入新一輪高風險的干涉行動並破壞自英委衝突後破冰的英美關係，首相索爾茲伯里接見美國駐倫敦大使時就曾表示：「這一衝突與我們無關；我們對西班牙相當友好，看到它受到羞辱應該會感到遺憾，但無論美國打算決定採取何種政策，我們對此事不予置評。」當時掌

²⁷¹ Schake, *Safe Passage*, 200–201.

²⁷²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229.

管英國外交部的亞瑟·貝爾福還特地向美國駐英大使保證：「不管在哪裡，英國政府不會提出美國政府不能接受的辦法。」殖民大臣張伯倫也表示讓美國上一堂道德課程毫無意義，任何對美國的外交提議只會引起美國的反感。²⁷³英國下議院甚至就英國政府在美西衝突中，主張維持和平談判的立場是否冒犯了美國進行了辯論。²⁷⁴由此可以看出，英國政府極力避免破壞既有的英美關係，英國為維持既定的戰略撤守不願意干涉美國，以避免英國在美洲分散更多國力，基於此，英國並未選擇與其他歐洲各國步調一致，而以維持中立為由一直拒絕和歐洲共同干涉美西衝突。

然而英國不僅僅是在美西戰爭中維持中立，實際上始終在這一系系列衝突中暗中支援美國，這就牽涉到英國政治菁英對如何緩解英國國際環境惡化的看法，英國的政治菁英認為與其中一個強勢崛起國美國結盟可以解決多重威脅的困境，並將東亞一部分的戰略壓力卸責給美國。為貫徹英國的戰略撤守，首相索爾茲伯里認為美國在東亞的擴張反而對英國有利，如果菲律賓會落入其他國家手中他寧可交給美國。²⁷⁵事實上，德國曾派外交大臣試探過英國的態度，確認英國如何看待菲律賓並詢問是否有意瓜分菲律賓，德國認為若是英國反對美國，美國實際上並無力控制菲律賓全境的能力，但英國回復德國：「麥金利政府不會歡迎任何外國的關於群島的未來建議」。²⁷⁶並在之後動用英國海軍艦隊協助美國在菲律賓抵禦德國艦隊，之後又向美國政府保證對菲律賓絕無領土野心。²⁷⁷除此之外，英國的政治菁英也支持美國直接佔據關島、夏威夷、菲律賓等地以維持英國提倡的國際制度與制衡其他競爭者²⁷⁸，他們認為美國若是與英國採取一樣的擴張政策會促使美國調整自己國內的政治信條，在行為與利益上更與英國一致。²⁷⁹正如《倫敦時報》對於美國佔領菲律賓的評論：「以平靜的心態，

²⁷³ J. A. S. Grenville,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202–3.

²⁷⁴ Schake, *Safe Passage*, 197.

²⁷⁵ J. A. S. Grenville,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215–16.

²⁷⁶ John A. Corry, *1898: Prelude to a Centur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98), 132.

²⁷⁷ Louis Martin Sears, "John Hay in London, 1897-1898."

²⁷⁸ Schake, *Safe Passage*, 196.

²⁷⁹ Schake, 210.

實際上是以滿意的態度。我們只能說，雖然我們歡迎在菲律賓的美國人作為親戚和盟友，通過最強大的共同利益紐帶與我們在遠東結合在一起，但我們對任何其他國家獲得該群島的看法應該是非常不同的」。²⁸⁰

在美西戰爭中美國幾乎受到所有西方國家的反對，只有英國持續支持美國，甚至願意主動幫助美國在菲律賓抵禦德國，美國傳統的「恐英症」(Anti-English sentiment) 也得到化解，亨利亞當斯在 1903 年信中就曾提到：「看到我們民族感情的忽然變化，我無比驚奇，直到 1898 年為止英國都是我們最討厭的國家，如今我們好少或甚至根本不關注英國了，我們似乎把它看成我們的財產，但是我們對德國的態度卻荒唐可笑，認為像德國那樣沒有海岸線、沒有殖民地、沒有煤礦的叢爾小國會攻擊我們，這種觀點在我看來荒謬絕倫無庸多慮，但是參議員洛奇卡伯特、西奧多羅斯福以及參議院...卻對此念念不忘，而且我們正花費大量的美金以防此患」。以羅斯福為首的強硬派政治菁英也對於英國在東亞與美洲的讓步感到滿意，開始將目光轉向日益擴張的德國，轉而將英國視為能提供的戰略利益的合作夥伴。²⁸¹他們認為在對抗其他崛起國與維護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等議題上可以從英國身上獲取戰略利益，如果在英國受到打擊時甚至願意出手相助，這也讓美國政治菁英不僅在 1899 爆發血腥的第二次布爾戰爭中選擇支持英國甚至與英國合作，阻止德國對薩摩爾島的介入。²⁸²

英國雖然並未能利用這一事件讓英美成為直接的同盟關係，但卻成功讓其他歐洲國家認知到英美雙方的友好關係，並讓他們懷疑兩國存在秘密同盟。雖然在過程中英國為了支援美國而與西班牙的外交關係惡化，進而導致事後西班牙與英國在直布羅陀發生一場規模不小的外交危機。²⁸³但就結果而言，英美關係至此正式轉為和平共存，英國為了對抗其他挑戰者而選擇放棄在美洲與美國競爭領導權，甚至在美西戰爭中為美國在美洲的霸權與西太平洋的擴張提供幫

²⁸⁰ Schake, 195.

²⁸¹ Walter LaFeber, 《美國人對機會的尋求(1865-1913)》，頁 474-475。

²⁸² Schake, *Safe Passage*, 210.

²⁸³ J. A. S. Grenville,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216-17.

助並不惜放棄與其他歐洲國家的友誼。英國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正如殖民大臣張伯倫在演講中提倡的，英國應該與美國建立和保持永久和睦關係：「我不知道我們可能會有什麼安排，但我知道並感覺到，在兩國人民的同意下，這些安排越密切、越親切、越充分、越明確，對雙方和世界越有利...星條旗和英國國旗應該一起在盎格魯-撒克遜同盟下揮舞」。²⁸⁴透過美西戰爭中對美國的援助，英國得以在多重威脅下改善與美國的關係，並將多餘的國力集中制衡其他崛起國。

表十六：美西戰爭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英國	美國
溫和派	首相索爾茲伯里 殖民大臣張伯倫 外交大臣亞瑟·貝爾福	駐英大使海伊
強硬派		
實力對比	溫和派勝利	溫和派勝利
理論預期	若兩國皆由溫和派政治菁英主導，兩國會和平共存。	
結果	和平共存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1903 年阿拉斯加邊境劃界爭議

這次爭議源自於 1825 年英俄兩國簽署的《聖彼得堡條約》，該條約規定了兩國在阿拉斯加狹地的領土劃界，但是條約內容中對海岸線一帶的所有權並未做出明確的界定。英俄兩國在簽定條約的當下對於海岸線一帶實際控制能力的缺失讓爭議並未立即浮現，但隨著美國在 1867 年從俄羅斯手中購買阿拉斯加並

²⁸⁴ Schake, *Safe Passage*, 208–9.

將人口移入此地進行大規模開發，兩國就開始不時為此地的管轄權發生爭執。當地在 19 世紀末發現金礦資源後，這一衝突也越演越烈，最終讓英國政府與美國政府開始針對該地的劃界進行協商。

在這一事件中，美國與加拿大再次因邊境劃界而產生爭執。英國的政治菁英秉持與美國保持友好的大原則，因此一開始提議將此爭議提交仲裁，但是在遭到美國的拒絕後，英國再次按照美國的偏好做出讓步，並組建特別庭處理此案。在特別庭的關鍵投票中，英國偏袒美國以犧牲加拿大的利益換取美國對現狀的滿意。雖然此事件並未造成英美兩國嚴重的衝突，但是英國再次主動退讓，以犧牲加拿大的利益換取美國的好感。這種主動退讓的情況在這一時期英美外交互動中一再出現，例如在中美洲運河與北大西洋捕魚權爭議中也可以發現類似的情況。而美國菁英在滿足要求後也無意擴大衝突，最終讓雙方得以在美洲和平共存。

美國在阿拉斯加邊境劃界爭議的背景

美國在第二次英美戰爭中曾派遣軍隊入侵加拿大，最後被英國與加拿大的民兵所擊潰，英美雙方在 1814 年簽署《根特條約》互相交還雙方在戰爭中奪取的領土，之後陸續在 1818 年與 1842 年達成《1818 年條約》與《韋伯斯特—阿什伯頓條約》雖然這些條約有效降低雙方軍事衝突的風險，確立兩國在兩湖地區的非軍事化，但是也讓兩國的美加邊境劃界爭議層出不窮，包含在奧勒岡州與聖胡安群島雙方都曾爆發激烈衝突，甚至在 1860 年代美國還曾主動挑起加拿大位於美加邊境的分離主義運動與愛爾蘭分離主義者的軍事入侵，而隨著阿拉斯加地峽的開發與 1896 年發現的金礦資源，兩國的邊境爭議再次浮上水面。

美國自美西戰爭後，開始積極擴張與對外干涉，在亞洲美國加入八國聯軍並繼承英國原有的外交政策在中國提倡門戶開放，同時與英國合作奪取薩摩爾群島的部分控制權，在中南美洲美國不只在 1901 與英國簽訂《海伊-龐塞福特

條約》獲得建造與控制橫跨中美洲地峽運河的權利，又在 1902 年再次以門羅主義為由介入委內瑞拉與其他國家的衝突，命令艦隊在委內瑞拉海域一帶巡邏制衡其他國家對委內瑞拉的海上封鎖，從美國積極與強硬的外交風格中可以看出美國外交政策的大幅轉向，這也影響到美國與英國的外交關係。

英國在阿拉斯加邊境劃界爭議的背景

英國此時剛經歷代價慘痛的第二次布爾戰爭，英國投入 50 萬的大軍到南非戰場最終以慘烈的代價贏得勝利，國力也因而嚴重耗損，而在戰爭中英軍的糟糕表現與集中營嚴重死傷的問題也讓英國在歐洲被嚴厲與指責，在英國因為戰爭被孤立且國力下降的背景下，歐洲各國在這一時期組建的軍事同盟讓英國的戰略處境進一步惡化，德國、奧匈及義大利組成的「三國同盟」與法國俄羅斯組成的「法俄同盟」都成為英國的心腹大患，正如英國海軍在 1901 年針對英日同盟所提出的：「對我們來說 9 艘主力艦（法國與俄國）對上 4 艘主力艦力量過於懸殊，我們最終不得不在中國海域增加部署主力艦，這麼做會產生雙重結果，這只會使我們在英吉利海峽與地中海取得勉強的力量均等，而帝國心臟位置的力量均等是一次危險的冒險，它還極大的增加海軍系統面臨的壓力，增加我們海軍運行的支出...如果我們能與日本結盟，情況將大不相同...我們可以減少在那個海域巡洋艦的數量，從而增派到其他急迫需要的駐地，我們遠東貿易與殖民地也將免除威脅」。²⁸⁵這最終也讓英國放棄傳統的光榮孤立，不僅加速戰略撤守的執行，也在 1902 年與日本組建「英日同盟」制衡法俄同盟在亞洲地區的積極擴張。

面對美國在美洲的步步進逼，英國的政治菁英將維持與美國的友誼視為首要目標，曾擔任英國海軍大臣的威廉·帕爾默（William Palmer）就認為比起維護帝國，與美國的友好關係更為重要，並表示：「與美國的戰爭是可能降臨到大

²⁸⁵ Paul Michael Kennedy, 《英國海上主導權的興衰》，頁 229-230。

英帝國的最大災難」。²⁸⁶這也讓英國對於美國在美洲的各種要求幾乎都迅速做出退讓，同時英國也積極在尋求與美國在海外合作的機會制衡其他崛起國，美國成為英國除了已經結盟的日本以外最積極結交的崛起國，而這一情境也讓英國再次在這次美加劃界爭議中偏袒美國。

兩國的強硬派溫和派對比與最終結果

美國政治菁英在這一事件中並沒有打算做出任何讓步，雖然美國政治菁英無意挑起與英國的大規模衝突，但始終堅持堅持偏袒本國利益的方案，要求英國與加拿大讓步。但與此同時，美國政治菁英雖然在這一事件上維持強硬，但是卻願意以相對溫和的方式解決爭議，在協商的框架內和平進行談判。

美國的堅持很大程度來自於國內壓力，美國移民已經在該地建立一座移民城市，而這一座城市正好坐落在爭議領土範圍內。在英美談判過程中，傳出美國政府可能放棄這座城市的管轄權的風聲，這直接讓美國西部各州與擔心競爭的貨運貿易從業者對此群起反對，對政府形成強大壓力，在輿論壓力下，美國的政治菁英拒絕將本案提交仲裁，除非英國能保證不論仲裁結果，都讓美國可以繼續保有城市的管轄權。

雖然受制於國內輿論的壓力，但美國的政治菁英對英國的態度已經與委內瑞拉危機時大不相同，美國主張對外擴張的外交強硬派已經英國視為友邦，其中羅斯福總統最具代表性，他本人篤信達爾文理論，認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共同體的說法，隨著英國相對國力的持續下滑，美國正在盎格魯-撒克遜夥伴關係中佔據主導地位。而對他而言英國對美國具有高度戰略價值，可以合作對抗俄國與德國的擴張。²⁸⁷這也讓他選擇在布爾戰爭聲援英國，成為少數在戰爭中支持英國的西方國家。從中可以看出美國政治菁英的認知已經與委內瑞拉危機的情況不同，雖然仍然在追求對周邊的擴張，但是在自己對英國的要求都能獲得

²⁸⁶ Schake, *Safe Passage*, 209.

²⁸⁷ Walter LaFeber, 《美國人對機會的尋求(1865-1913)》，頁 473-474。

滿足與認知英國戰略價值的前提下，已經無意主動與英國的軍事衝突，讓美國願意與英國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

與英委衝突與美西戰爭不同，英國政治菁英在第一時間就向美國提議進行仲裁，最大程度避免與美國爆發衝突。但這次英國政府卻需要承受來自加拿大的強烈壓力，加拿大在這次領土爭端中對美國維持強硬的態度，認為英國應該為加拿大的權益維護這片領土，首先英國在前幾年前才在中美洲運河議題上對美國做出巨大讓步，加拿大認為不需要再次對美國做出妥協讓利。另一點是加拿大認為自己在布爾戰爭中為英國母國做出巨大貢獻，這些犧牲應該獲得回報。英國政府在布爾戰爭期間曾因為陷入苦戰而號召殖民地人民共同參戰，加拿大對此民意分歧嚴重，但是最終還是決定參戰，動員超過 7000 人投入南非戰場。²⁸⁸ 以上種種都讓加拿大認為自己理應獲得英國的支持作為報償。

但是英國高層認為不可以為這一事件破壞英美的外交關係，雖然他們也的確曾將英國在運河的讓步視為加拿大邊境衝突的談判籌碼。²⁸⁹ 但是這一方針在英國維繫英美友好關係政策主軸下並未被堅持。英國駐美大使龐斯福特 (Julian Pauncefote) 就曾表示：「這個問題 (運河) 關係到全世界的利益，似乎不值得把它與加拿大的談判問題聯繫起來，因為加拿大的談判純粹是地方性的...美國現在似乎是我們唯一的朋友，與他爭吵是不可以的」。英國的政治菁英不希望因為阿拉斯加的邊境劃界問題影響到英美正在進行、影響全球局勢的中美洲運河談判，並造成英美友好關係的破裂。²⁹⁰ 這也讓英國決定比起加拿大的訴求，維繫英美關係更重要。

英國政治菁英首先參考委內瑞拉的經驗，認為將爭議以仲裁的方式進行最為妥當，首相就曾在信中對官員下達細緻的指示，可以看出英國積極推動仲裁

288 Margaret Conrad 著，王士宇、林星宇譯，《劍橋加拿大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9），頁 185-187。

289 Kenneth Bourne,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 1815-1908*, 347.

290 Charles Soutter Campbell, *Anglo-American Understanding, 1898-1903*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7), 190-91.

的程式：「你應該向美國政府提議，根據 1825 年的條約成立由三名專員組成的委員會，兩個專員由雙方政府任命、最後一個由獨立的權力機構任命。一旦問題交給委員會，就可迎刃而解...如果在委員會解決之前能友好地安排一個臨時辦法，那將是令人滿意的」。²⁹¹但是在發現美國對提交仲裁存在疑慮後，又配合美國的要求，制定臨時分界線。可以發現英國政治菁英為避免多重威脅與維持既定的戰略撤守在邊界仲裁上展現出與過去在 19 世紀截然不同的態度。

最終英美雙方在劃定臨時界線時，英國先是要求加拿大退讓，犧牲加拿大的部分利益來完成與美國的交涉。同時在運河談判中，放棄以此換取美國在加拿大邊境爭議的讓步，並最終在 1903 年的特別法庭中，英國的代表選擇與美國站在同一邊，先是對美國派出的非法律專業代表不提出任何抗議，又在關鍵投票中讓英方的代表倒戈支持美國，讓加拿大被迫損失大片領土。

加拿大對於英國的背叛相當憤怒，境內也因此興起大規模反英運動，主張就是因為加拿大缺乏外交自主權，必須服從英國政府才導致這一情況的發生。這一事件也成為加拿大在日後爭取進一步獨立自主的催化劑。加拿大政府也在隔年開始調整政策，要求加拿大民兵指揮官的任命脫離英國掌控，由加拿大自己任命。²⁹²英國選擇以犧牲加拿大的利益並再次成功獲取美國的好感，但是卻也受到來自加拿大的反彈，並為此付出一定的代價。

這一事件中英美高層都無意擴大衝突，尤其是英國政治菁英在處理與美國衝突的風險時顯得格外小心，在事件爆發初期就積極選擇和平解決爭端，並選用美國過去在類似事件中要求的機制來處理這一爭議。雖然在過程中犧牲加拿大的利益並造成反彈，但英國依然做出大幅讓步以避免衝突，正如歷史學家所言，英國持續通過一系列不可回復的讓步，默認了美國在委內瑞拉到阿拉斯加的西半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²⁹³，以高昂的代價換取與美國的友誼。

²⁹¹ 王敏，《英國索爾茲伯裡政府對美外交政策研究（1895-1902）》（浙江師範大學 2019 年碩士學位論文），頁 41-42。

²⁹² Margaret Conrad，《劍橋加拿大史》，頁 185-186。

²⁹³ Anne Orde, *The Eclipse of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ish Imperial Decline, 1895-*

美國雖然始終維持強硬的態度，但最終成功在不擴大爭端的前提下再次獲得大片領土的所有權，雖然這一事件英美雙方並未產生明顯衝突，但是卻依然意義重大，首先是英國先後在南美洲、中美洲都對美國做出讓步並成功改善兩國外交關係，但是與中南美洲相比，加拿大作為英國在美洲最重要的殖民地在經濟與戰略價值上都遠勝前者，即便如此英國依然選擇維持同樣的外交政策。這也證明在英國的外交政策排序上，與美國的友誼被英國政治菁英強烈重視。其次是這一模式成為日後英國與美國在美洲事務上互動的範本，在之後的北大西洋捕魚權爭議中也可以發現類似的情況。英國菁英對於美國願意做出讓步，而美國菁英在滿足要求後也無意擴大衝突，雙方最終得以在美洲和平共存，並讓美國得以和平地從英國手上接掌美洲的權力，成為西半球的霸權。

表十七：阿拉斯加邊境劃界爭議兩國溫和派強硬派實力對比與結果

	英國	美國
溫和派	首相索爾茲伯里 英國駐美大使龐斯福特	
強硬派		羅斯福總統
實力對比	溫和派勝利	強硬派勝利
理論預期	若兩國政治菁英一方由溫和派主導，另一方由強硬派主導，則由溫和派主導的國家會對另一方的要求做出妥協。	
結果	單方妥協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四節 小結



在英美兩國 40 年的互動過程中，英美之間的重要事件主要集中在美國國力開始對英國造成威脅的南北戰爭前後與美國經濟實力超越英國、開始在美洲挑戰英國的兩個時間段，其中多重威脅都對英美政治菁英的判斷造成巨大的影響，美國的北方政府在南北戰爭期間為了避免腹背受敵，在戰爭期間多次對英國做出妥協，但是隨內戰結束，多重威脅的風險消失後，美國的政治菁英就不再願意對英國做出讓步。英國政治菁英則在南北戰爭後期德國崛起後，就一直將多重威脅視為英美關係的核心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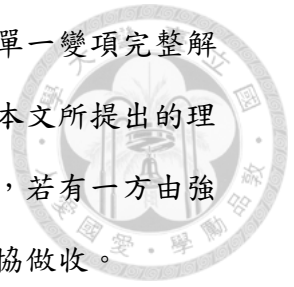
除去多重威脅外，對於權力轉移的認知也同時影響兩國政治菁英的判斷，英國強硬派將 1861 年特倫特號郵輪事件視為發動預防性戰爭的時機，而美國國內強硬派則在南北戰爭結束後認為挑戰英國的機會之窗已經成熟，主張向北侵略加拿大。

除去上述同時影響英美兩國的變項外，地位、對於現狀的滿意程度、戰略利益與政治菁英國內政治利益成為美國政治菁英的重要判斷基準，美國政治菁英一直將門羅主義視為對美國地位核心訴求，並一直在美國強硬派政治菁英的論述中浮現。在美國經濟陷入嚴重危機的 1890 年代，美國政治菁英將挑戰英國視為實現國內政治利益的手段。但是當英國持續以主動退讓來滿足美國提出的要求，並開始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時，美國國內的對英強硬派也逐漸轉變為溫和派，最終讓英美得以友好相處。

英國政治菁英則是在英美互動中，深受權力轉移認知這一變項的影響，作為既存強權，英國被迫同時處理來自各地區的威脅，並為了避免捲入衝突，長時間對美國實踐戰略撤守，在多次衝突中都優先對美國做出妥協讓步，選擇將美洲的兵力集中到其他地區。

根據上述內容，可以發現與日美關係相比，幾乎所有變項在這一案例中都

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釋力，但是與日美關係一樣，仍然無法透過單一變項完整解釋權力轉移的戰爭機制。同時透過本章節的案例可以再次驗證本文所提出的理論框，當兩國國內都是溫和派主導政局，兩國就得以和平共存，若有一方由強硬主導而另一方仍然是溫和派主導則會以溫和派主導的國家妥協做收。



第四章 結論



在國際關係領域中探討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的文獻數量眾多繁雜，但是各學說之間卻一直缺乏有效的整合平臺，並且在權力轉移的探討中，對於崛起國與既存強權國內政治菁英一直缺乏充分的討論，政治菁英作為國內主要的行為者，他們的言行反應出在當時時空背景下，有哪一些因素影響決策，換言之，政治菁英的言行可以被視為檢驗不同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理論的主要載體，而政治菁英的偏好也會影響國家在權力轉移中對於另一方的決策。為此，本篇論文希望建立一套以政治菁英偏好為核心架構的整合性框架，比較不同理論在不同情境下的適用性。本文無意推出新的自變項挑戰目前學界的各類學說，而是希望透過不同情境的比較讓理論間彼此對話，並進一步釐清個別理論在哪一些情境中具有更強的解釋力。

第一節 案例中不同戰爭機制變項出現頻率統計

本文將崛起國與既存強權的政治菁英偏好類型化，分為由強硬派主導國內政局與由溫和派主導政局的兩種可能，並根據崛起國與既存強權的排列組合分為兩國皆由溫和派政治菁英主導、兩國皆由強硬派政治菁英主導、崛起國與既存強權任一方為強硬派政治菁英主導，另一方為溫和派政治菁英主導等三種情境。根據本文所採納的日美戰間期與美英在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初的兩個案例中，在戰間期，日本作為崛起國與美國作為既存強權同時經歷以上三種情境。而在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初的英美，美國作為崛起國、英國作為既存強權則經歷了兩國由相反政治偏好的政治菁英主導與兩國皆由溫和派政治菁英主導的兩種情境。

上述兩個歷史案例中的情境已經包括所有取值可能，並且透過兩個最終結局迥異的權力轉移案例，也可以更好的檢驗本文的理論假設與測試不同權力轉

移戰爭機制學說，為方便呈現檢驗結果，以下將十二個事件中政治菁英偏好組合與結果、不同權力轉移戰爭機制變項出現頻率與不同權力轉移戰爭機制變項在三種情境的出現頻率整理為以下表格：



表十八：兩個案例十二個事件中不同政治菁英偏好組合與結果

	崛起國政治菁英偏好	既存強權政治菁英偏好	結果
華盛頓海軍會議	溫和	溫和	和平共存
美國排日運動	溫和	強硬	單方妥協
倫敦海軍會議	溫和	溫和	和平共存
九一八事件到日本退出國際聯盟	強硬	溫和	單方妥協
第二次倫敦海軍公約	強硬	強硬	高強度競爭
帕奈號事件	溫和	溫和	和平共存
日軍南進與美國石油禁運	強硬	強硬	高強度競爭
特倫特號郵輪事件	溫和	強硬	單方妥協
阿拉巴馬號仲裁案	強硬	溫和	單方妥協
委內瑞拉邊界衝突	強硬	溫和	單方妥協
美西戰爭	溫和	溫和	和平共存
阿拉斯加邊境劃界爭議	強硬	溫和	單方妥協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十九：不同權力轉移戰爭機制變項在案例中出現頻率

	對於權力轉移認知	地位	對於現狀滿意程度	戰略利益	多重威脅	轉移性外交政策
華盛頓海軍會議	✓	✓	✓			
美國排日運動		✓				✓
倫敦海軍會議	✓	✓	✓			
九一八事件到日本退出國際聯盟	✓	✓	✓	✓		
第二次倫敦海軍公約	✓	✓	✓			
帕奈號事件	✓		✓		✓	
日軍南進與美國石油禁運	✓	✓	✓		✓	
特倫特號郵輪事件	✓		✓		✓	
阿拉巴馬號仲裁案	✓	✓	✓		✓	
委內瑞拉邊界衝突	✓	✓	✓		✓	✓
美西戰爭	✓	✓	✓	✓	✓	✓
阿拉斯加邊境劃界爭議	✓		✓	✓	✓	✓
總計出現次數	11	9	11	3	7	4
總計出現占比	11/12	9/12	11/12	3/12	7/12	4/12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二十：不同權力轉移戰爭機制變項在三種情境的出現頻率

	和平共存	單方妥協	高強度競爭
對於權力轉移認知	100%	83.3%	100%
地位	75%	66.7%	100%
對於現狀滿意程度	100%	83.3%	100%
戰略利益	25%	33.3%	0%
多重威脅	50%	66.7%	50%
轉移性外交政策	25%	50%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根據以上表十八，本文列出兩個案例中十二個事件，從中可以發現，當兩國主政的政治菁英都偏好溫和的外交政策，兩國在權力轉移過程中可以和平共存。若是任一方，不論是崛起國抑或是既存強權主政的政治菁英偏好強硬的外交政策，另一國主政的政治菁英仍主張維持溫和的外交政策，後者會在衝突中對前者的強硬要求做出妥協，避免衝突持續擴大，在強硬派的要求得到滿足後，雙方仍能避免進入高度競爭性。但是若兩國的政治菁英都主張對另一國採取強硬外交政策，則兩國會因此進入高強度競爭，並讓戰爭爆發機率大幅提升。以上結果也證明，本文所提出的戰略框架在案例中具有適用性，政治菁英的偏好會直接影響權力轉移的戰爭機制，不同政策偏好的政治菁英在國內的力量差異會直接影響權力轉移中崛起國與既存強權的戰與和。

在檢驗政治菁英與戰爭機制的因果連結後，透過表十九，本文整理出六種變項在兩個案例中十二個事件所出現的次數與頻率，可以觀察到「對於權力轉移認知」、「地位」、「對於現狀滿意程度」最常在政治菁英言行中被觀察到，在傳統權力轉移學說中討論較少的「多重威脅」也有在超過半數的事件中被政治菁英視為決策時的重要因素，最後與「政治菁英政治利益」與「戰略利益」被觀察到的次數最少，前者初出現四次，後者僅出現過三次，甚至其中一次還與

原本學說的假定不同，是在既存強權的政治菁英言行中觀察到的。

首先，「對於權力轉移認知」、「地位」、「對於現狀滿意程度」這三個變項的頻繁出現，代表他們的適用前提條件相較於其他變項可能更為寬鬆，代表在任何關於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的討論中，以上三個變項都不應該被輕易忽視。第二點，在權力轉移相關理論中不常被提及的「多重威脅」有超過半數的事件中被政治菁英們所提及，代表這一變項在未來關於權力轉移戰爭與和平的研究中更被重視與討論。第三點，雖然「轉移性外交政策」²⁹⁴這一變項僅在十二個事件中出現四次，但是全部都是在美國的政治菁英言行中觀察到，這是否代表這一變項對於美國或是對民主政體有更高的適用性值得進一步研究。第四點，「戰略利益」這一變項在本文挑選的兩個案例中出現頻率最低，在十二個事件中僅出現過三次，代表它比其他理論可能存在更嚴苛的適用前提，需要學界針對「戰略利益」這個變項在權力轉移的適用性與適用範圍做出更多釐清。最後，就算是「對於權力轉移認知」、「地位」、「對於現狀滿意程度」三個重要變項，他們依然都無法同時含括兩個案例中的所有事件，這不僅代表這些理論仍具有侷限性，無法解釋現況，同時也代表本文所提供的對話空間有其重要性，構建此些理論的溝通橋梁。

最後，透過表二十，可以進一步觀察三種情境中不同機制被觀察到的頻率，「戰略利益」與「轉移性外交政策」在高強度競爭情境中完全沒有被觀察到，也印證前文所提到的這兩個變項應該都存在更嚴苛的前提適用條件。

根據上述討論，我們可以觀察到政治菁英的政策偏好組合的確會直接影響崛起國與既存強權間的戰略互動，同時以政治菁英偏好為基礎構建的理論框架不僅可以解釋權力轉移中國家間的戰爭與和平，也能作為讓不同權力轉移戰爭機制理論對話溝通的平臺，進而確認現有學說的適用範圍與限制，以更好的推動未來的相關研究。

²⁹⁴ 「轉移性外交政策」的相關內容請參考本文 12 頁到 13 頁的介紹。

第二節 理論框架在中美(2008-2023)的適用性

透過以上內容的討論與檢驗，可以確認本文所提出的理論框架不僅能有效解釋美英在 19 世紀後半到 20 世紀初與日美的戰間期戰略互動結果，也能用於檢驗現有權力轉移戰爭與和平相關理論的適用性，為權力轉移的討論做出貢獻。但是作為探討權力轉移戰爭與和平的理論框架，與其他權力轉移理論一樣，都無法迴避當今國際間最重要、影響也最廣的中美權力轉移，中國作為崛起國在鄧小平經濟改革後在短短 30 年間國力快速增長，迅速逼近作為既存強權的美國，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如同其他歷史案例，中美並非單純如修昔底德陷阱所言，只能命定式的走向戰爭，相反的，中美兩國在過去 10 多年權力轉移的過程中，戰略互動模式就已經多次發生變化，這一事實雖然能讓身處中美對抗最前線的台灣不至於對未來抱有宿命論式的悲觀想像，但是也代表現今的台灣需要投入更多關注在這一重要議題上。

為此，本文希望在最後以本文所提出以「當政政治菁英偏好」所建構的政治框架分析中美過去數十年的歷史發展，並概論中美未來可能的走向，以下內容將以美國總統任期為分界，分為歐巴馬時期（2008-2016）、川普時期（2016-2020）與拜登時期（2020 後至今）三個時期簡要探討中美兩國的戰略互動。使用美國領導人而非中國領導人作為分界主要是基於相對於資訊封鎖的中國，美國雖然仍有大量檔與資料未解密，但是在仍然更容易觀察不同時期政治菁英偏好的變化。

歐巴馬時期（2008-2016）

歐巴馬剛上任時，美國正遭逢金融海嘯的嚴重衝擊，國力大幅受創，而中國則在此時迅速拉近與美國之間的國力差距，不僅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在 2009 年到 2016 年間時從原本僅占美國 GDP 總量的 35.2% 一路飆升

至 59.5%。²⁹⁵但是權力轉移的加劇並沒有導致兩國關係直接惡化，相反的，中國與美國的政治菁英都仍然主張與對方溫和的外交政策，並最終讓兩國在這一時期仍得以和平共存。

與身受金融海嘯所苦的美國不同，中國在短時間就走出陰霾並在 2008 年成功舉辦北京奧運，彰顯自己作為大國的強烈存在感。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政治菁英開始認知到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正在加速，認為世界不僅正在從單極化走向多極化²⁹⁶，中國也將在未來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就曾在 2011 年預測中國的經濟規模將在 20 年後超越美國。²⁹⁷以上種種也讓中國當政的政治菁英開始調整原本韜光養晦策略外交政策，開始尋求國際地位的進一步提升。韜光養晦政策自鄧小平時期開始被中國官方提倡，目的是降低中國呈現的威脅性，避免遭到包圍。在中美國力對比懸殊的情況下。降低與美國及鄰國發生衝突的風險，並限縮中國受到的外壓壓力、擴大中國的謀略空間。²⁹⁸可以看出韜光養晦政策是中國政治精英在認知中美權力差距巨大才實行的策略，這也代表當中國降低韜光養晦政策的比重時，政治菁英認為中美兩國國力已經足夠接近，不需要對美國繼續採取正當性策略。也因此，中國政治菁英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後開始提倡放棄韜光養晦政策。²⁹⁹當中國從 2010 年開始宣傳中美之間的「新型大國關係」時，實際也暗示中國政治菁英認為兩國國力已經足夠接近，並開始追求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國際地位。³⁰⁰同時，中國的政治菁英對爭議領土的態度也開始轉為強硬，更積極地修正對於現狀的不滿，在釣魚台與南海領土爭議中都不吝於動用軍隊維護自己

²⁹⁵ 葉曉迪，〈論中美戰略競爭態勢變化的原因〉，《戰略決策研究》2021 年第 1 期（2021），頁 17-18。

²⁹⁶ 丁樹範，〈北京奧運會後的中國外交政策特色〉，《戰略安全研析》第 53 期（2009），頁 28。

²⁹⁷ BBC News 中文，2011，〈林毅夫：中國經濟 20 年後達美國兩倍〉，BBC News 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2011/03/110323_world_bank_china，2023/05/18。

²⁹⁸ Rush Doshi 著，李寧怡譯，《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臺北，八旗文化，2022）頁 110-116。

²⁹⁹ Doshi Rush，《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頁 282-288。

³⁰⁰ 蔡東杰，《中國外交戰略：傳統及其變遷》（臺北，五南，2013），頁 191。

的主張，同時也在各國的抗議聲中持續推進對南海島礁的軍事化，加劇與周圍國家的緊張關係。

但是中國的政治菁英雖然支持中國調整外交政策，並認為已經足以挑戰周邊國家，但是當面對美國時，中國的政治菁英仍主張應該維持雙邊關係的和平穩定，作為劉少奇的兒子，同時也是習近平信任的高階將領劉源就曾在環球時報直接發表評論要求主戰派噤聲，他主張：「中國的經濟發展過去已經兩度因對日戰爭而粉碎...絕不能再因為某些意外而中斷」。³⁰¹中國的政治菁英此時仍相當重視中國的「戰略機遇期」，認為現階段中國無力與美國和其軍事盟友發生軍事衝突，應該在機會之窗未到來時謀求與美國的和平共存。³⁰²

歐巴馬時期被學者認為是「擁抱熊貓派」的對中溫和派影響力最強的時期，也直接主導這一時期美國的外交政策。主政政治菁英雖然已經開始認知到中國的戰略競爭壓力，但是仍然將與中國維持和平放在首位考量，並希望與中國的合作繼續從經濟深化至戰略層次。³⁰³歐巴馬在第一任期時面對美國國力的衰退，並沒有選擇對中國採取預防性戰爭，而是優先採取戰略撤守，降低在國際制度與組織的投入以改革國內的經濟，在第一任競選期間，歐巴馬就曾在《外交事務》上表示，美國將同時與中國在不同議題上競爭與合作，並進一步在2011年的中美聯合聲明中強調美方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³⁰⁴與此同時，歐巴馬也為了擺脫金融危機而在國際建制中對中國讓利，其中包括提高中國在二十國集團的影響力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等等。³⁰⁵

雖然受到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與亞洲權力平衡改變的影響，歐巴馬第二任

³⁰¹ Hayton Bill 著，林添貴譯，《南海：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臺北，麥田出版，2015），頁312-313。

³⁰² Hayton Bill，《南海：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頁313-316。

³⁰³ 何清漣，《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臺北，八旗文化出版，2019），頁216-218。

³⁰⁴ BBC News 中文，2011，〈中美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全文〉，BBC News 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1/01/110120_uschina，2023/05/18

³⁰⁵ 葉曉迪，《論中美戰略競爭態勢變化的原因》，頁18。

任期受到來自國內對中強硬派的壓力，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加速將美國戰略重心移回亞洲，強化與菲律賓、日本與南韓等傳統盟友的同盟關係。同時也在國際制度上，推動排他式的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夥伴協議與中國的一帶一路與亞洲投資銀行等國際建制對抗。但是即使美國對中友好政策已經開始鬆動並做出調整，我們依然可以發現除了在南海為航行自由權與中國軍方有較嚴重的摩擦外，美國此時主政的政治菁英仍然堅持與中國維持和平，歐巴馬在對中政策上依舊主張：「對世界而言，一個衰退的中國比一個強大的中國更可怕」。³⁰⁶而不願意與中國進行全面競爭，這一情況直到川普時期才出現大幅轉變。

川普時期（2016-2020）

川普時期中美的政治菁英都改由強硬派主導政局，兩國至此陷入嚴重的高強度戰略競爭，雙方不僅在經濟上爆發嚴重的貿易戰，也在學術領域、東亞地緣政治、人權議題上陷入新一輪的衝突。

中國的政治菁英在川普上任後，開始進一步提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 2009 年的中國官方智庫，暗示著中國相信美國已明顯式微，全球唯一超級強權的地位也受到質疑。但直到在 2017 年開始受到官方大肆宣揚，先是楊潔篪公開表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也在 2018 年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當前，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全國政協委員張宇燕也表示：「百年變局中最為關鍵的變量在於世界上主要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高祖貴則宣稱：「美國獨自掌控地區和國際局勢的意願、決心和能力明顯下降」。³⁰⁷可以看出中國政治菁英認為在川普上任後，「東昇西降」已成定局，兩國的國力差距不僅更為接近，中國國力將在外來超越美國的這一趨勢也已經達到難以逆轉。

³⁰⁶ 何清漣，《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頁 216-218。

³⁰⁷ Doshi Rush，《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頁 421-422。

同時在地位的追求上，中國政治菁英也並未放緩腳步，習近平先是在 2017 年的十九大上強調要在二十一世紀中葉達成民族復興，並給出歷代領導人當中最明確的定義。強調中國要：「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國家」，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同時「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並「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³⁰⁸這也讓他進一步在 2019 年對台政策上提出「習五點」，定調九二共識為「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³⁰⁹。試圖收緊在中國地位論述中佔據核心位置的台灣的控制。同時也趁川普政府在國際實行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的同時加速推動自己的國際建制，擴大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的影響力，提高自己在國際的地位。

而面對美國政策轉變所帶來的競爭壓力，中國在經濟與其他政策上出現明顯差異，在軍事方面，中國從 2016 年開始加強對周邊爭議領土的軍事行動，除了以軍機襲擾台灣周邊、派遣軍艦到釣魚台周邊等等強硬政策外，也在 2020 年與印度爆發嚴重的邊境衝突。另外，中國也積極擴大海軍規模，加速自己的造艦計畫，擁有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海軍的龐大海上艦隊，並多次與美國海軍在南海產生激烈的摩擦。

同時，中國也開始將自己對於現狀的不滿以戰狼外交的形式呈現，習近平曾親自下令，要求外交官在面對中美關係惡化等國際挑戰，必須對外展現「鬥爭精神」維持強硬的外交態度。這也讓中國外交部屢屢發表強硬言論，進而影響與其他國家的關係。³¹⁰

³⁰⁸ Doshi Rush, 《長期博弈: 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頁 72-73。

³⁰⁹ 習近平, 2019, 〈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國務院公報,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58673.htm, 2023/05/26。

³¹⁰ 小山, 2020, 〈再提習近平寫條子力挺 中國戰狼外交發言 港媒撰指不利北京國際形象〉,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00413-%E5%86%8D%E6%8F%90%E7%BF%92%E8%BF%91%E5%B9%B3%E5%AF%AB%E6%A2%9D%E5%AD%90%E5%8A%9B%E6%8C%BA-%E4%B8%AD%E5%9C%8B%E6%88%B0%E7%8B%BC%E5%A4%96%E4%BA%A4%E7%99%BC%E8%A8%80->

但是在經濟政策上，面對雙方競爭最激烈的貿易戰，中國雖然也針對美國進口農產品上做出回擊。不過相對於其他領域，在貿易戰上中國並不願意與美國陷入全面競爭，習近平就曾對美國高層表示貿易戰：「不是我們挑起的，我們不願打、不想打，然而我們並不害怕，必要時我們會進行反擊，但是我們始終積極爭取著不打」。³¹¹可以看出中國雖然不願意輕易做出妥協，但是也不願意繼續擴大衝突，傷害對於中共國內政權合法性至關重要的經濟發展。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政治菁英依然認知到中美權力差距與中美競爭升級的高昂成本，認為不應在機會之窗到達前擴大與美國的經濟衝突。

由上述內容可以明顯察覺到中國對美政策的調整，中國的政治菁英已經認知到兩國國力的進一步拉近，並且在不同領域上不再畏懼與美國與其盟友產生摩擦。面對美國的競爭壓力，主張對美強硬派的反美言論逐漸成為國家的主流論述。可以看出在強硬派政治菁英的帶領下，中國的確加速與美國的戰略競爭。但是與此同時，中國政治菁英也有認知到機會之窗仍未達到，中國不應該在對中國至關重要的經濟領域擴大衝突，與美國進行全面競爭。

美國主政的政治菁英隨著川普上任出現大換血，在外交政策上改由對中政策的強硬派主導。³¹²先是在 2017 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指出美國處於一個「充滿競爭」的世界，需要回應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各類威脅。並指出中國與俄羅斯兩個大國對美國的國家利益造成最直接的挑戰，直接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榮，因而美國需要重新思考過去二十多年對競爭對手採取接觸戰略的成效。³¹³這也讓美國加速對亞太地區的軍事投入，並從 2017 年開始倡導原本由日本提出的印太戰略以制衡中國日益升高的威脅。同時，副總統彭斯也在

%E6%B8%AF%E5%AA%92%E6%92%B0%E6%8C%87%E4%B8%8D%E5%88%A9%E5%8C%97%E4%BA%AC%E5%9C%8B%E9%9A%9B%E5%BD%A2%E8%B1%A1, 2023/05/19。

³¹¹ 國際中心，2019，〈「願在公平基礎下談初步協議」習近平罕見表態：中國不想打貿易戰，但必要時不害怕反擊〉，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1979042>，2023/05/19。

³¹² 何清漣，《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頁 210–212。

³¹³ 葉曉迪，〈從接觸到遏制？美國後冷戰時期對華戰略轉變的邏輯探析〉，《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1 年第 1 期（2021），頁 24–25。

2018年在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中強調中國試圖改變現行國際秩序，並表示美國將會做出強力回應。美國政府也在同年發起對中國的貿易戰，利用高關稅與出入口限制要求中國在智慧財產權與對美貿易逆差上做出修正。可以看出美國政治菁英不僅認知到兩國權力差距的拉近，並開始對不滿意的現狀進行修正。

川普時期中美兩國的政治菁英都開始對對方的態度轉為強硬，這也直接讓兩國陷入高強度競爭中，但是仍可以觀察到，雖然中國的政治菁英已經出現轉向，並開始主張修改現有國際秩序，但是在貿易戰上卻又不願意與美國陷入全面競爭，中國雖然已經由強硬派政治菁英主導對美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們仍然受制於與美國的國力差距而不願擴大衝突。

拜登時期（2020-2023）

2020年大規模爆發的全球新冠疫情直接重傷全世界的經濟，在2022年疫情趨緩時，俄羅斯又發動軍事行動入侵烏克蘭，造成地緣政治與經濟的再一次衝擊。中美兩國雖然在這一系列變故中都受到嚴重衝擊，但在雙方都由強硬派政治菁英主導的前提下，中美兩國仍然維持高強度競爭。

中國雖然在初期成功以高壓手段控制疫情對經濟的傷害，但是隨病毒變異與高壓管理帶來的嚴重外部成本，中國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並且在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與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時承受巨大的外交挑戰。在歐美強大的外交壓力下，中國在俄烏戰爭中雖然偏袒俄國，但是並不願意公開支援俄羅斯，僅透過購買能源等間接方式幫助俄羅斯，而在佩洛西訪臺上，中國則事後在台海周邊發動高強度軍事演習以作為報復。

雖然美國在阿富汗的撤離行動中表現得極為失敗，甚至被視為美國國力衰退的有力證據。但是隨俄烏戰爭中，烏克蘭憑藉美援武器重傷俄羅斯軍隊與美國經濟逐漸走出疫情的陰霾，美國的影響力不減反增，透過重新深化與印太地區盟友的合作，美國持續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在中美競爭中最為重要的台海

議題上，更是多次做出強硬的論述與表態，包含更多的軍售案與友台法案的出爐，並讓美國高級官員與軍官開始頻繁出入台灣，在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時也派出航母在台海周邊待命，嚇阻中國意味濃厚，並且在俄國發動俄烏戰爭的多重威脅中，仍然堅持將重心放在東亞，可見即使改由民主黨拜登政府主政，美國的對中政策仍然承繼川普時期的路線，由對中強硬派繼續主導政局。

小結

由上述內容可以推斷在兩國主導外交政策政治菁英的政策偏好不發生大幅轉變的前提下，中美兩國的高強度競爭仍會持續下去，即使再次發生類似於俄羅斯發起入侵行動的突發事件，美國依然高機率會繼續維持對中國的強硬政策。而中國方面在習近平權力穩固，主導外交政策的人事未出現大幅變動的前提下，強硬派政治菁英仍會繼續維持既定的政策，對美國保持強硬的態度。總言之，在中美兩國國內政治菁英皆由強硬派主導的前提下，兩國不必然會爆發戰爭，但是兩國會繼續維持高強度競爭狀態，從而提高了戰爭發生的可能性。

從中美自歐巴馬時期到拜登時期的這 15 年發展，我們可以發現本文所提出的框架仍具有高度適用性，並且依然可以透過本文提出的理論框架觀測其他權力轉移戰爭與和平相關理論的適用性，雖然受制於第一手文獻取得困難與中國作為專制政權內政黑箱的特性而受到一定限制，但是仍然可以明顯看出中美之間的戰略互動明顯受到國內政治菁英的制約，崛起國與既存強權的互動絕非能單純透過體系就做出推斷，而必須引入其他國內變項才能做出完整解釋與預測。

第三節 理論與經驗意涵



本文所提出之理論框架，利用政治菁英偏好的組合解釋國家之間的戰略互動，在本文所探討的兩個案例與美中之間都有相當解釋力，將傳統結現實主義黑箱化的國內政治引入轉移戰爭與和平的討論中，並利用不同情境檢驗各類理論的適用範圍，我們可以發現既使在最終爆發戰爭的日美案例中，兩國的戰爭也絕非宿命論，而是兩國國內政治菁英在權力轉移競爭下互動的結果。

而本文之理論框架仍有一些部分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其中本文將主政政治菁英分為強硬派主政與溫和派主政，但是其實還可能存在主張強硬與主張溫和外交政策的菁英勢均力敵，難以達成共識的情境，美國衛斯理學院教授斯塔西·戈達德（Stacie Goddard）的著作 *When Right Makes Might: How Prussia Overturned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就曾針對既存強權內部分裂，導致既存強權無法就如何應對崛起國一事上達成共識進行討論。本文所探討的案例中例如日本在發動珍珠港事件前的國內爭論或是日本在決定是否簽署倫敦海軍條約等事例中就曾出現類似情境，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當我們將視線拉回到台灣，作為夾在中美兩國兩大強權競爭之間中小型國家，由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對崛起國中國與既存強權美國主政政治菁英外交偏好的研究變得至關重要，在目前中美皆由強硬派政治菁英主政的現在，可以預期兩國的高強度競爭將會持續影響台灣，兩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經貿戰與在東亞展開的軍備競賽都讓台灣承受嚴重的外部成本。但是兩強的高強度競爭不僅限外部成本，也為台灣帶來了外部效益，包含在與美國更直接公開的支持與國際能見度的提升。基於此，如何降低兩強競爭的外部成本並提高外部效益與持續追蹤兩強國內政治菁英的偏好變化是台灣在這詭譎多端的中美權力轉移中最關鍵的課題。

參考文獻



一、中文資料

- George W. Baer 著，吳征宇譯，2014，《美國海權百年：1890-1990 年的美國海軍》第 1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 Barry Buzan 著，劉永濤譯，2007，《美國和諸大國：21 世紀的世界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Winston S. Churchill 著，劉會梁譯，《英語民族史》（新北市，左岸文化，2004）
- Rush Doshi 著，李寧怡譯，2022，《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台北，八旗文化。
- Edward J. Drea 著，顧全譯，2015，《日本陸軍興亡史 1853-1945》，北京，新華出版社。
- Bill Hayton 著，林添貴譯，2015，《南海：21 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第 2 冊初版，台北，麥田出版：。
- Toland John 著，吳潤璿譯，2015，《帝國落日：大日本帝國的衰亡一九三六-一九四五》，台北，八旗文化。
- Robert Kagan 著，袁勝育、郭學堂、葛騰飛譯，2011，《危險的國家：美國從起源到 20 世紀初的世界地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Paul Michael Kennedy 著，沈志雄譯，2014，《英國海上主導權的興衰》，北京，人民出版社。
- Walter LaFeber 著，史方正譯，2021，《創造新日本：1853 年以來的美日關係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Walter LaFeber 著，劉飛濤、石斌譯，2004，《美國人對機會的尋求(1865-1913)》，北京，新華出版社。
- Conrad Margaret、Margaret Conrad 著，王士宇、林星宇譯，2019，《劍橋加拿大

- 史》，北京，新星出版社。
- John J. Mearsheimer 著，王義桅、唐小松譯，2021，《大國政治的悲劇》，台北，麥田出版。
- Helen V. Milner 著，曲博譯，2010，《利益、制度與資訊：國內政治與國際關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Bradford Perkins 著，楊光梅、周桂銀譯，2004，《共和制帝國的創建(1776-1865)》，北京，新華出版社。
- Thucydides 著，謝德風譯，2000，《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雅典斯巴達戰爭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丁樹範，2009，「北京奧運會後的中國外交政策特色」，《戰略安全研析》，第 53 期：28-31。
- 入江昭著，李響譯，2016，《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入江昭著，施茵、張振江譯，2004，《美國的全球化進程(1913-1945)》，北京，新華出版社。
- 中西輝政著，王敬翔譯，2017，《大英帝國衰亡史》，臺北，廣場出版。
- 五百旗頭真著，周永生譯，2012，《日美關係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戶部良一著，孫維珍、韋平和譯，2016，《日本陸軍史：近代化的異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王敏，2019，《英國索爾茲伯裡政府對美外交政策研究（1895-1902）》，浙江師範大學 2019 年碩士學位論文。
- 王黎、王梓元，2013，「論析帕麥斯頓時期英美平等關係的確立」，《史學集刊》，2013（3）：103-109。
- 加藤陽子著，黃美蓉譯，2016，《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臺北，廣場出版。
- 由井正臣著，初曉波譯，2020，《岩波日本史·第八卷：帝國時期》，北京，新星



- 出版社。
- 石井寬治著，周見、周亮亮譯，2018，《日本的對外戰略(1853-1937年): 帝國主義思想的演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吉田茂著，陳鵬仁譯，2006，《決定日本的一百年》，臺北，致良。
- 寺崎英成著，陳鵬仁譯，2021，《昭和天皇回憶錄》，臺北，蘭臺出版社。
- 朱鋒，2006，「權力轉移理論:霸權性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研究》，2006 (3): 24-42。
- 何清漣，2019，《紅色滲透: 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臺北，八旗文化出版。
- 余志森、王春來主編，2001，《崛起和擴張的年代. 1898-1929》第4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 吳玉山、傅澤民，2023，「霸權與挑戰：國際關係理論的詮釋」，《問題與研究》，62 (1): 1-45。
- 吳玉山，2011，《權力轉移理論：悲劇預言?》，收藏於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出版社。
- 吳昆財，2020，「1937年美國《時代》雜誌對中國的報導」，《嘉大應用歷史學報》，2020 (5): 197-258。
- 岡崎久彥著，章澤儀譯，2009，《日本外交史話》，臺北，玉山社。
- 東中志光、森島守人主編，陳鵬仁譯，2021，《鐵蹄底下的亡魂、陰謀、暗殺、軍刀合輯》，臺北，蘭臺出版社。
- 美國國務院主編，張瑋瑛、張友雲、杜繼東譯，1998，《美國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年選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重光葵著，陳鵬仁譯，2021，《昭和之動亂》，臺北，蘭臺出版社。
- 唐豪駿，2019，「多重威脅結構下的國家行為邏輯：中國戰國時期之同盟策略分析」，《中國大陸研究》，62 (2): 109-140。

陳欣之，2014，「歧異解讀霸權衰落的美中戰略互動－單極體系中權位轉換的認知因素」，《遠景基金會季刊》，15（1）：89-140。

章騫，2016，《不列顛太陽下的美國海權之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

傅澤民，2021，「國際關係理論與美中的戰略互動」，《全球政治評論》，（73）：25-30。

葉曉迪，2021，「從接觸到遏制？美國後冷戰時期對華戰略轉變的邏輯探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1（1）：1-28。

葉曉迪，2021，「論中美戰略競爭態勢變化的原因」，《戰略決策研究》，2021（1）：3-22。

趙學功，2003，「第一次委內瑞拉危機與美英關係」，《歷史教學》，2003（7）：19-23。

劉笑盈，2002，《眺望珍珠港：美日從合作走向戰爭的歷史透視》，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滕建群，1996，「美國歷史上的"亞拉巴馬"號賠償案」，《軍事歷史》，1996（5）：60-61。

蔡東傑，2013，《中國外交戰略：傳統及其變遷 =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臺北，五南。

韓拓、賈慶國，2019，韓拓，「美國崛起時是如何規避“修昔底德陷阱”的？」，《國際觀察》，2019（2）：45-71。

二、英文資料

Graham T. Allison.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Sadao Asada. 1993. "From Washington to London: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politics of naval limitation, 1921-1930," *Diplomacy & Statecraft* 4(3): 147-

191.

Sadao Asada. 2007. *Culture Shock and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Historical Essays*, Columbia, Missouri: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Sadao Asada. 2012.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napolis, Md: U.S. Naval Institute Press.

Derek Beach and Rasmus Brun Pedersen. 2013. *Process-Tracing Methods: 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lbert J. Beveridge. 1901. "Cuba and Congress,"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72(533): 535–550.

Albert Jeremiah Beveridge. 1908. *The meaning of the times, and other speeches*, Indianapolis : Bobbs-Merrill Company.

Kenneth cn Bourne. 1967. *Britai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North America, 1815-190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rles S. Campbell. 1974. *From revolution to rapproch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1783-1900*,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Charles Soutter Campbell. 1957. *Anglo-American understanding, 1898-1903*,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Victor H. Cohen. 1956 "Charles Sumner and the Trent Affair"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22(2): 205–10.


Schuyler Colfax and John O'Neill. 1866. *Speeches of Hon. Schuyler Colfax, and General J. O'Neill, (who whipped the Queen's Own in Canada.) delivered at the great Fenian pic nic, Chicago, Aug. 15.1866.*


Dale C. Copeland. 2001.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ohn A. Corry. 1998. *1898 : prelude to a century*, New York : J.A. Corry ; Bronx, New York : Distributed b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David M. Edelstein. 2020. *Over the horizon: time,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Stephen E. Gent. 2009. "Scapegoating Strategically: Reselection, Strategic Interaction, and the 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5(1): 1–29.
- John Gerring. 2007.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 Gilpin.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acie E. Goddard. 2018. *When right makes might: rising powers and world ord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 Elias Götz. 2021. "Status Matter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3(1): 228–247.
- Howard K. Beale. 1984.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J. A. S. Grenville. 1964.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Athlone Press.
- Brian Jenkins. 1969. *Fenian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Reconstruc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 Jervis. 2017.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th a new preface by the autho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r. John McV. Haight. 1962. "Roosevelt and the Aftermath of the Quarantine Speech," *The Review of Politics* 24(2): 233–259.
- Kilic Kanat. 2014. "Diversionary Foreign Policy in Authoritarian States: The Use of Multiple Diversionary Strategies by Saddam Hussein during the Gulf War"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7(1): 16-32.
- Paul M. Kennedy. 1980.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 Boston : Allen & Unwin.

- 
- Joshua D. Kertzer et al. 2022. “Hawkish Biases and Group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6(3): 513–548.
- Baris Kesgin. 2020. “Features of foreign policy birds: Israeli prime ministers as
hawks and dov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55(1): 107–126.
- Jacek Kugler, Ronald L. Tammen and Siddharth Swaminathan. 2001. “Power
Transitions and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Asian Perspective* 25(3): 5-29.
-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kseï Shevchenko. 2019. *Quest for status: Chinese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2010.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4): 63–95.
- Henry Cabot Lodge. 1895. “England, Venezuela, and the Monroe Doctrine” ,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60(463): 651-658
- Lord Newton. 1913. *Lord Lyons; A Record of British Diplomacy*, London: Edward
Arnold.
-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2018. *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argaret MacMillan. 2014. *The war that ended peace : the road to 1914*,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 Dean B. Mahin. 1999. *One war at a time :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Washington, D.C. : Brassey’s.
- Louis Martin Sears. 1956. “John Hay in London, 1897-1898 ” *Ohio History Journal*
65: 356-375.
- John McLean. 2010. *Competing fenianisms: British, Irish, and American responses to
a transatlantic movement*, Ph.D. Dissertation, United States --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 Guillermo A.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86. *Transitions from*

- authoritarian rule*,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Anne Orde. 1996. *The Eclipse of Grea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ish Imperial Decline, 1895-1956*,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 Thazha Varkey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urti Wohlforth. 2014.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 F. Remer. 1968.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New York: H. Fertig.
- Daniel Kahneman and Jonathan Renshon. 2007. “Why Hawks Win,” *Foreign Policy* 158: 34–38.
- Jonathan Renshon. 2017.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nathan Renshon and Daniel Kahneman. 2017. “Hawkish Biases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onflict Decision-Making” *Advancing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51–81.
- Jasper Godwin Ridley. 1971. *Lord Palmerston*, New York : Dutton.
- Christina Romer. 1986. “Spurious Volatility in Historical Unemployment Dat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1): 1–37.
- Emily S. Rosenberg and Eric Foner. 1982. *Spreading the American Dream : America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pansion, 1890-1945*, New York : Hill and Wang.
- Samuel Flagg Bemis. 1936.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amuel Flagg Bemis*, New York: Henry Holt.
- Carl Sandburg. 1974. *Abraham Lincoln; the prairie years and the war yea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Kori N. Schake. 2017. *Safe passage: the transition from British to American hegemon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Joshua Shiffrin. 2018.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Fear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1(4): 65–83.
- Joshua R. Itzkowitz Shiffrin. 2019. *Rising Titans, Falling Giants: How Great Powers Exploit Power Shif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lastair Smith. 1996. "Diversionary Foreign Policy in Democratic Syst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0(1): 133–153.
- Steven Ward. 2017.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nald E. Thompson. 2008. The partisan politics that led to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Master of Arts. Department of History, Eberly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Morgantown.
- Stephen Van Evera. 1999. *Causes of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tephen Van Evera. 1997.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 Venezuela. 1898. *Venezuela-British Guiana boundary arbitration : the printed argument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Venezuela before the tribunal of arbitration*, New York: Evening Post Job Printing House.
- Edward Weisband. 1973. *The ideolog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paradigm of Lockian liberalism*,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William Roscoe Thayer. 1915.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Robin W. Winks. 1998. *The Civil War years :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三、日文資料

井上光貞等編，1997，《第一次世界大戰と政黨内閣》，東京，山川出版社。

本橋正，2006，《太平洋戦争をめぐる日米外交と戦後の米ソ対立》，東京，學術出版會。

佐藤國雄，1990，《東郷平八郎元帥の晩年》，東京，朝日新聞社。

岡田啓介，2015，《岡田啓介回顧録》，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阿川弘之，1986，《井上成美》，東京，新潮社。

齋藤充功，2004，《昭和史発掘開戦通告はなぜ遅れたか》，東京，新潮社。

麻田貞雄，1993，《两大戦間の日米関係：海軍と政策決定過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景南阪井，1979，《英傑加藤寛治：景南回想記》，東京，ノーベル書房。

新名丈夫，2022，《海軍戦争検討會議記録：太平洋戦争開戦の経緯》，東京，角川。

読売新聞戦争責任検証委員会，2006，《検証戦争責任 I》，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読売新聞戦争責任検証委員会，2006，《検証戦争責任 II》，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四、網路資料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937. "Quarantine Speech (October 5, 1937). Miller Center. in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509132052/http://millercenter.org/president/speeches/detail/3310>. Latest update 22 December 2022.

Lord Salisbury. 1895. "Lord Salisbury to Sir Julian Pauncefo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in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895p1/d529> , Latest update 26 December 2022.

BBC News 中文, 2011, 〈中美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全文〉, BBC News 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1/01/110120_uschina, 2023/05/18。

BBC News 中文, 2011, 〈林毅夫：中國經濟 20 年後達美國兩倍〉, BBC News 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business/2011/03/110323_world_bank_china, 2023/05/18。

石原莞爾, 1940, 〈最終戰爭論〉, 青空文庫, 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0230/files/1154_23278.html, 2022/11/29。

近衛文麿, 1937, 〈東亞新秩序の建設〉, 史料日本史, http://chushingura.biz/p_nihonsi/siryu/1201_1250/1220.htm, 2023/06/12。

小山, 2020, 〈再提習近平寫條子力挺 中國戰狼外交發言 港媒撰指不利北京國際形象〉,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00413-%E5%86%8D%E6%8F%90%E7%BF%92%E8%BF%91%E5%B9%B3%E5%AF%AB%E6%A2%9D%E5%AD%90%E5%8A%9B%E6%8C%BA-%E4%B8%AD%E5%9C%8B%E6%88%B0%E7%8B%BC%E5%A4%96%E4%BA%A4%E7%99%BC%E8%A8%80-%E6%B8%AF%E5%AA%92%E6%92%B0%E6%8C%87%E4%B8%8D%E5%88%A9%E5%8C%97%E4%BA%AC%E5%9C%8B%E9%9A%9B%E5%BD%A2%E8%B1%A1>, 2023/05/19。

習近平, 2019, 〈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國務院公報,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

58673.htm，2023/05/26。

國際中心，2019，〈「願在公平基礎下談初步協議」習近平罕見表態：

中國不想打貿易戰，但必要時不害怕反擊〉，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1979042>，2023/05/19。

